图版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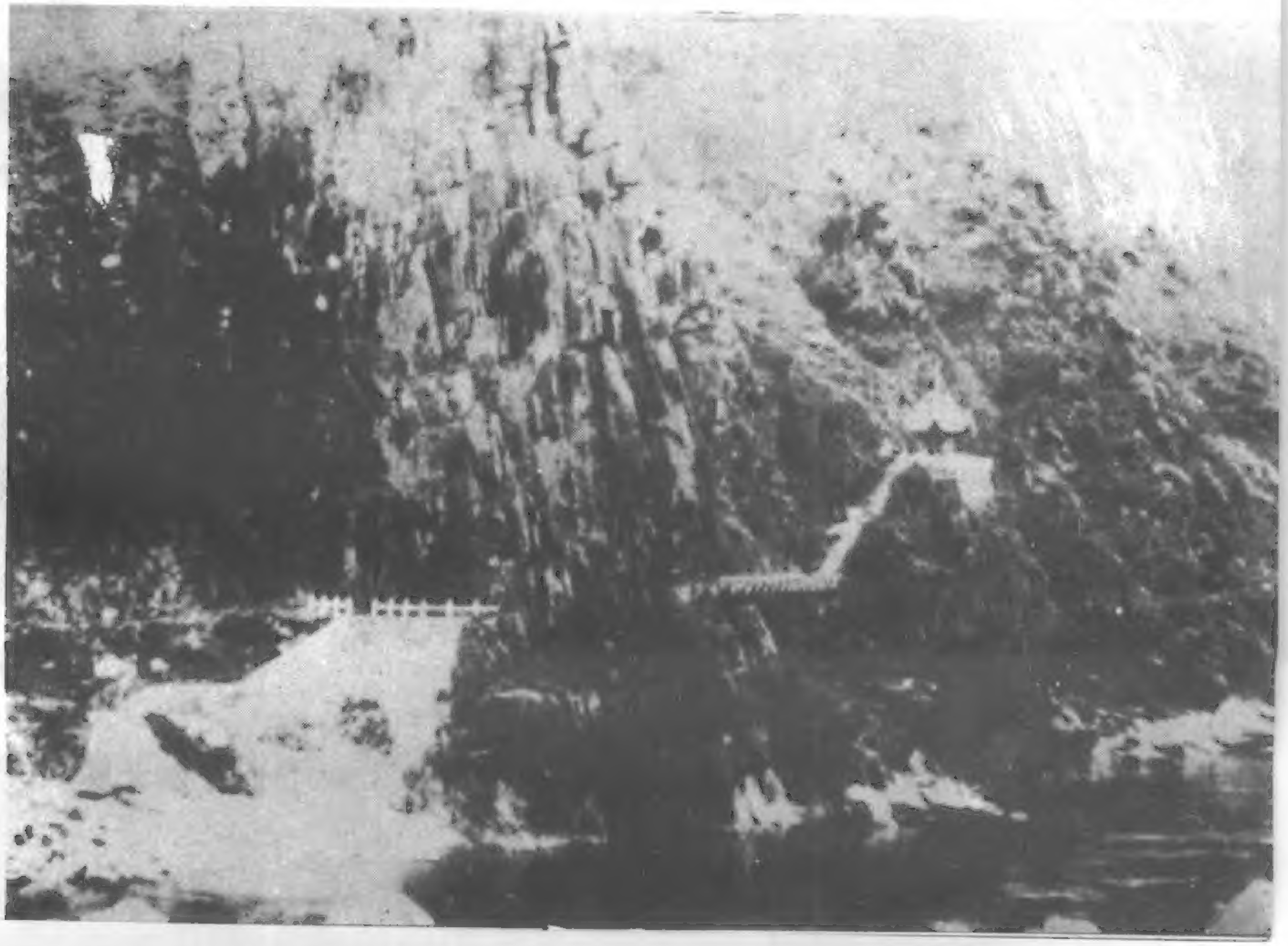
1 褒谷口景色
2 鸡头关
3 石门栈阁
4 石门云栈
5 翠云屏
6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7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
8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
9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
10 《石门颂》刻石
11 《石门颂》拓片
12 《李君通阁道摩崖》拓片
13 《杨淮·杨弼表记》拓片
14 郑子真垂钓处
15 《石虎》拓片
16 “浮浪玉盆”景色
17 《玉盆》拓片
18 “银涛滚雪”景色
19 《衮雪》拓片
20 《石门》拓片
21 《李苞通阁道题名》拓片
22 《石门铭》拓片
23 《石门铭》拓片局部
24 《石门铭小记》拓片
25 《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拓片
26 《山河堰落成记》刻石
27 《山河堰落成记》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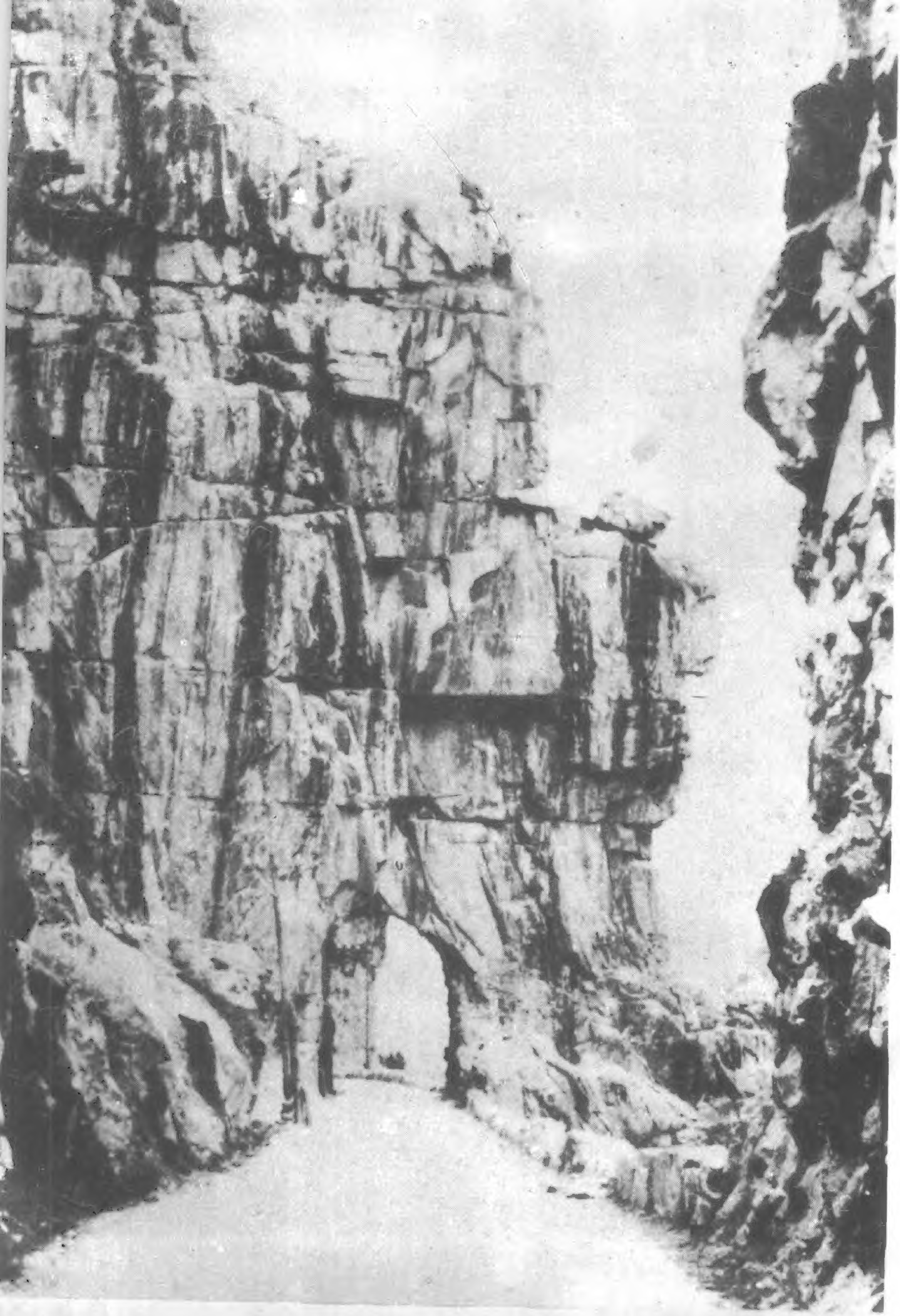
1 褒谷口景色

2 鸡头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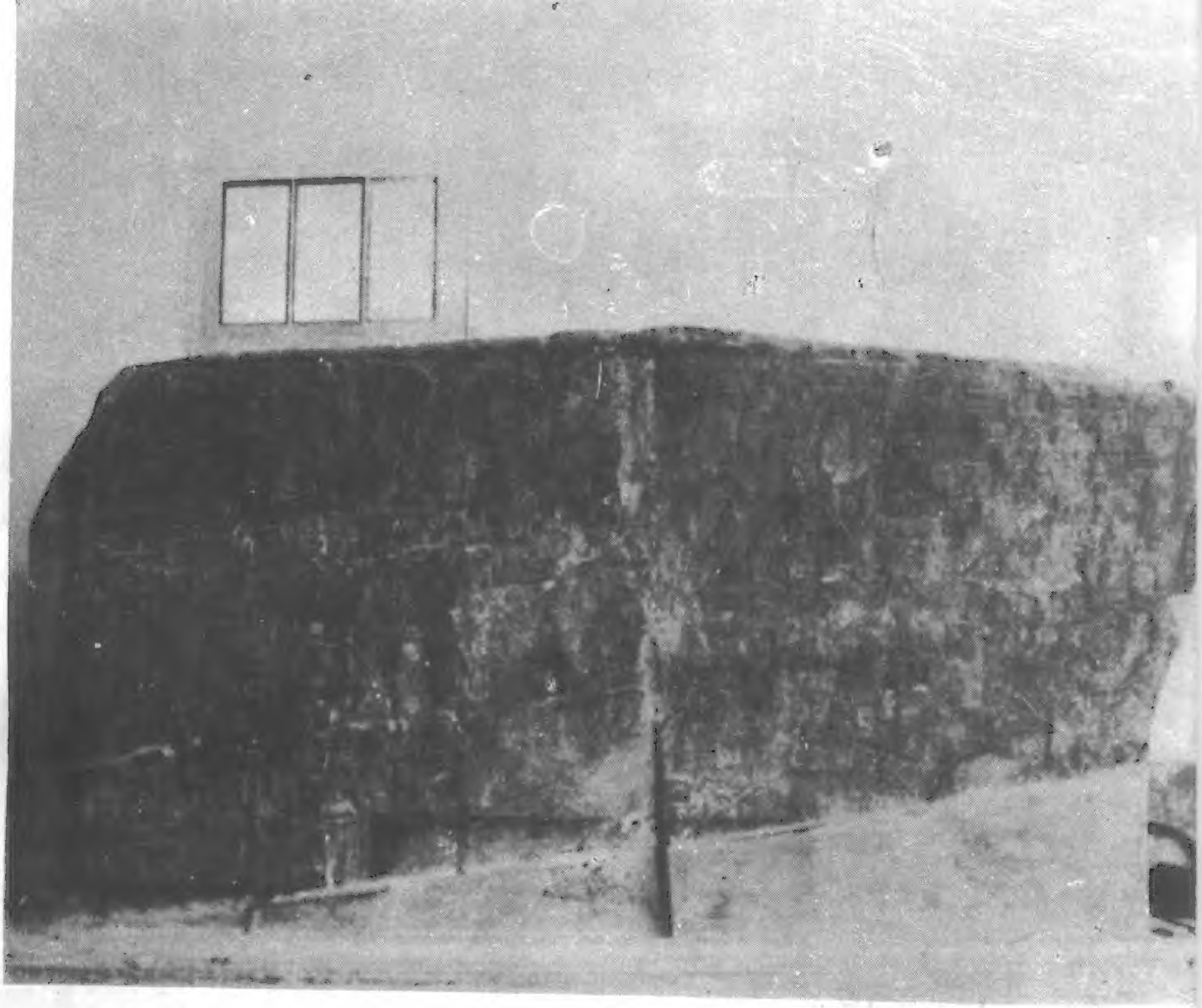
3　石门栈阁

4　石门云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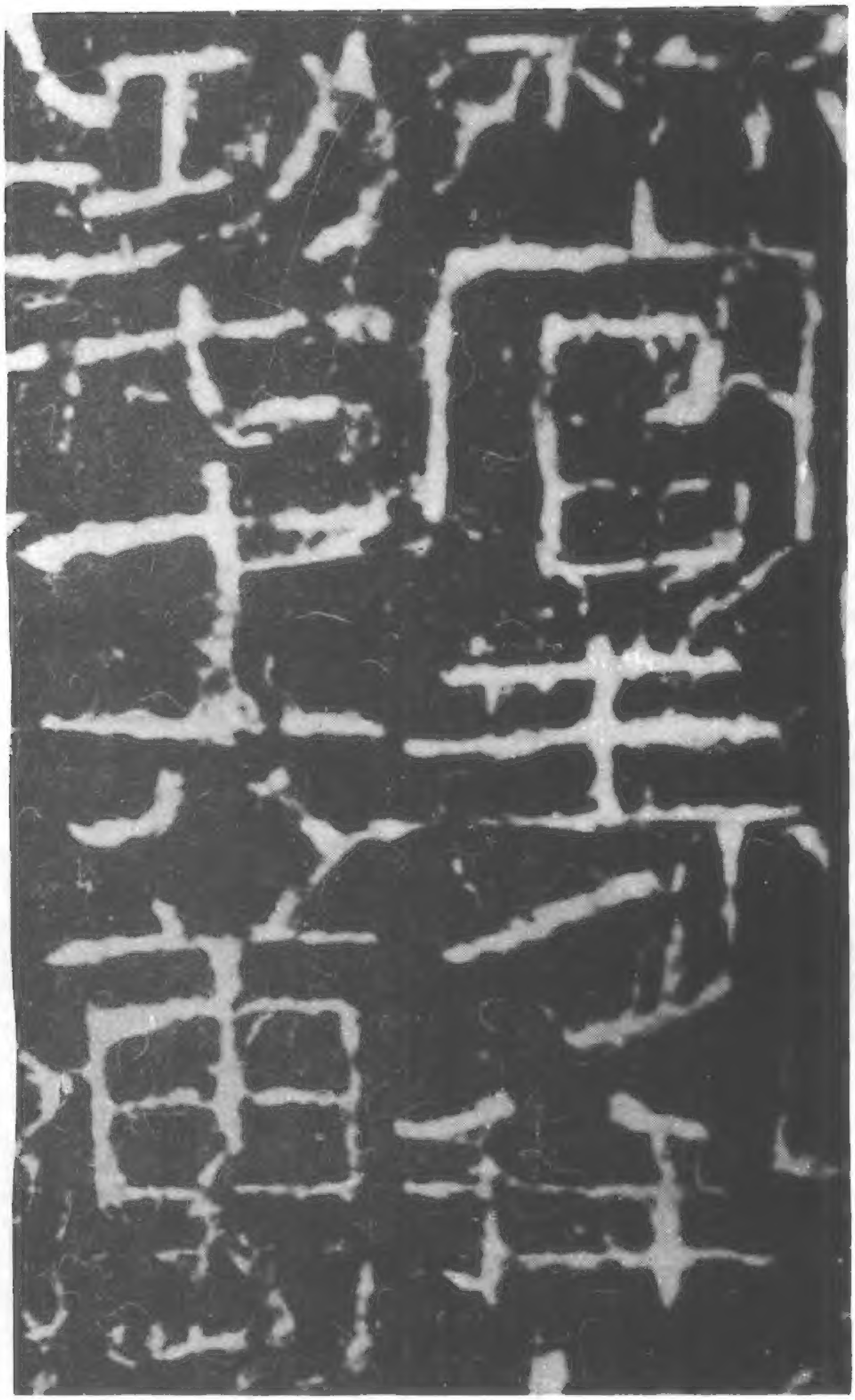


5 翠云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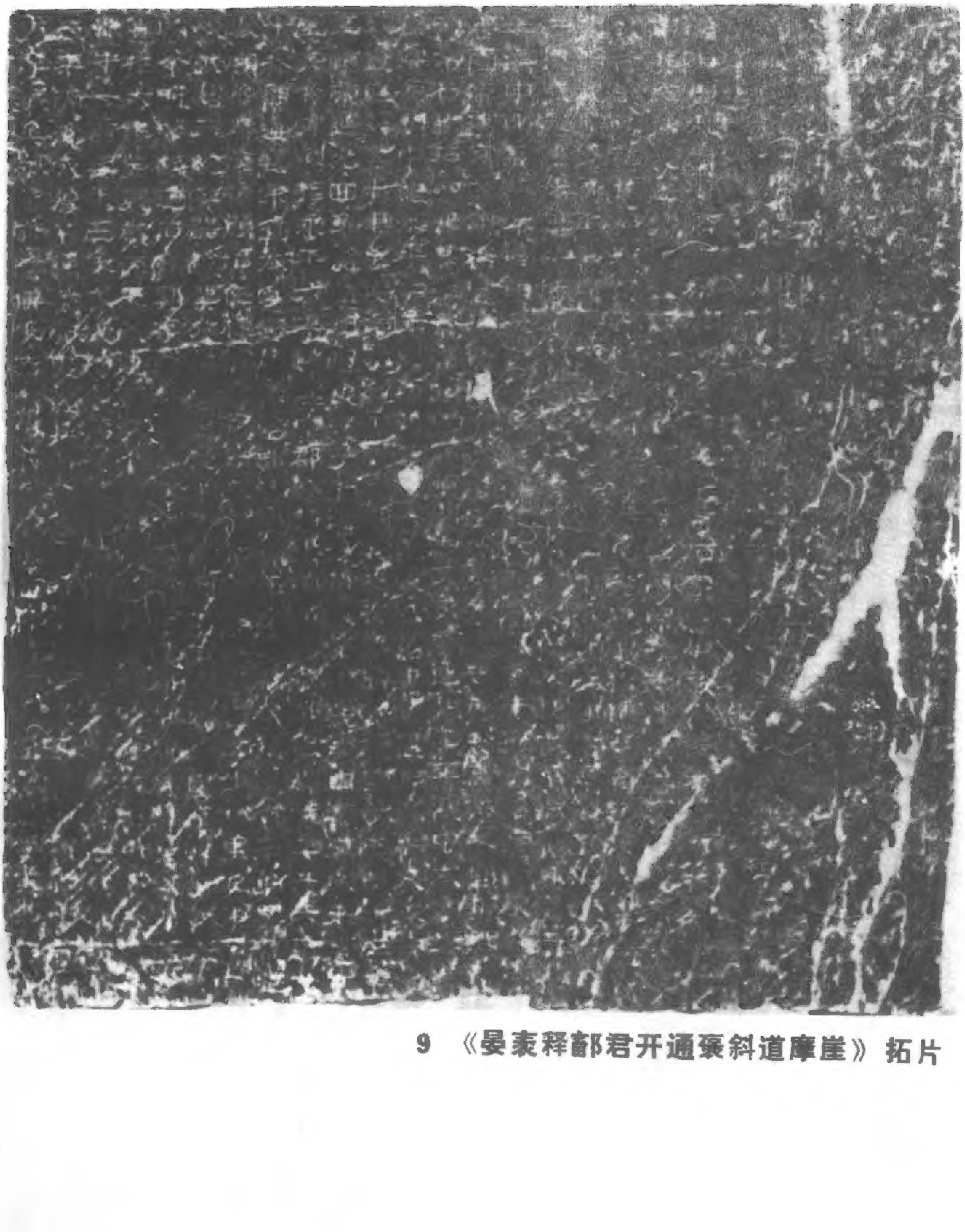


6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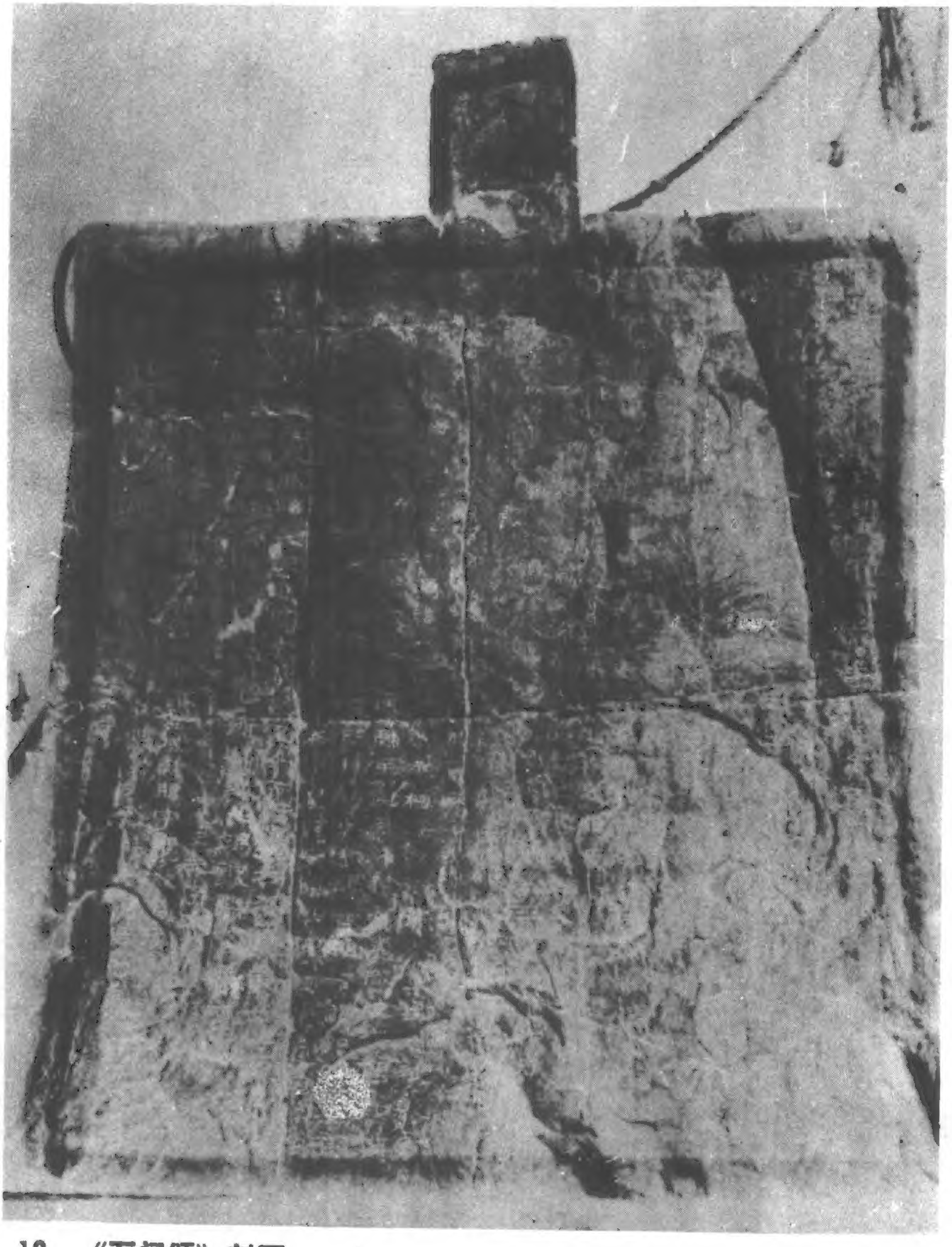
7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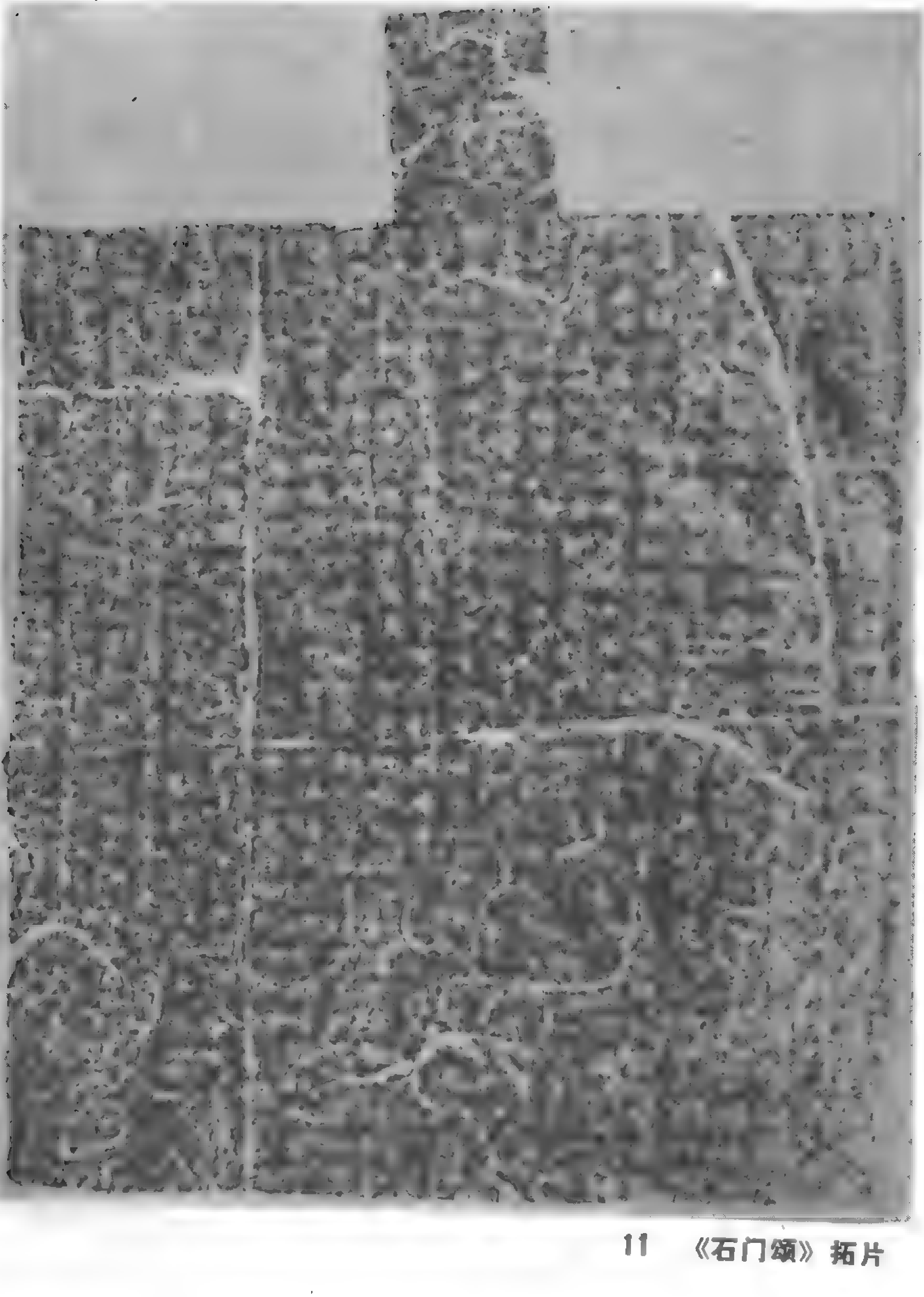
8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局部



9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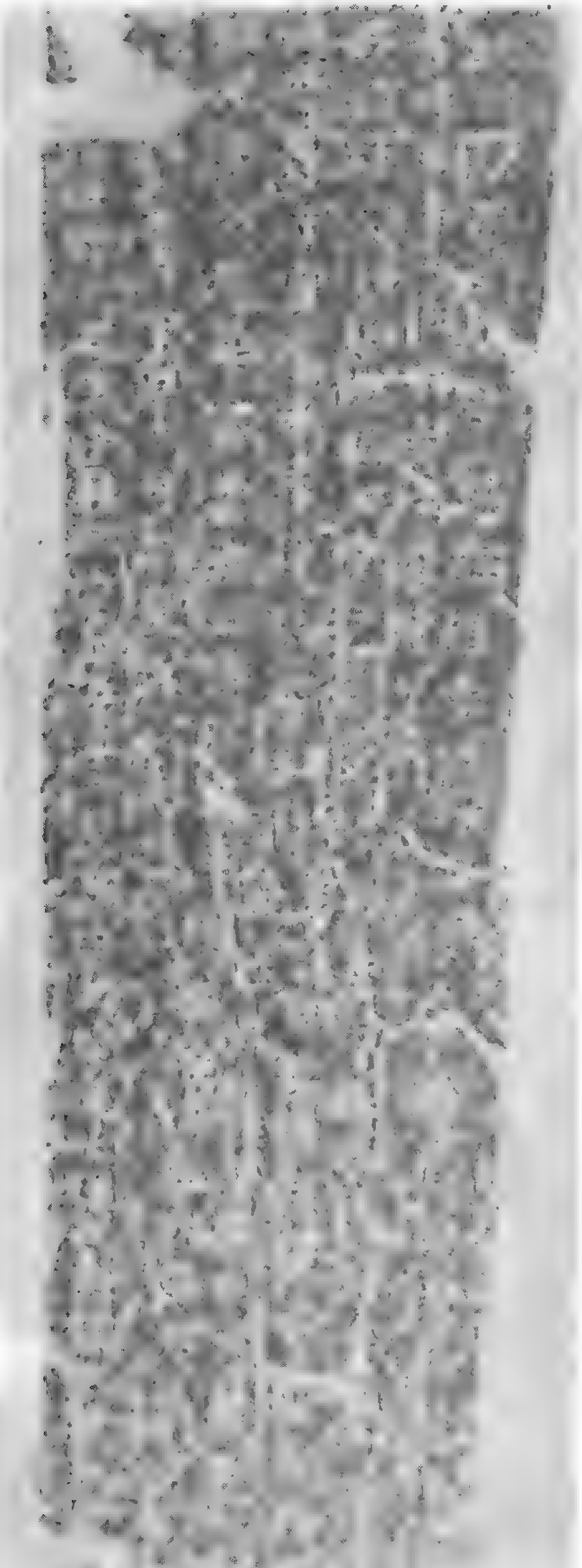


10　《石门颂》刻石



11 《石门颂》拓片

12　《李君通閣道摩崖》拓片



13 《杨淮·杨弼表记》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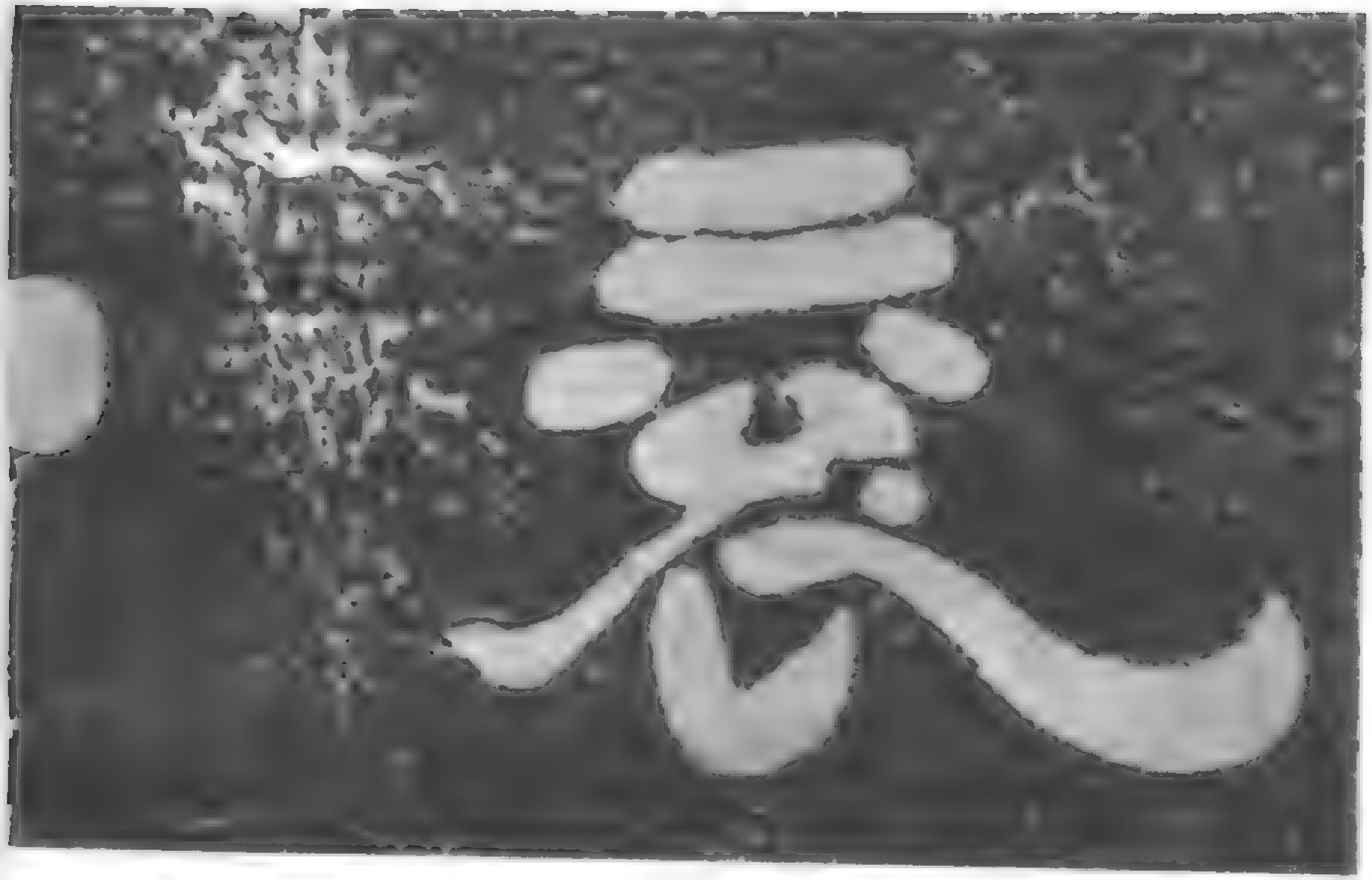
14 郑子真垂钓处

15　《石虎》拓片

16　“浮浪玉盆”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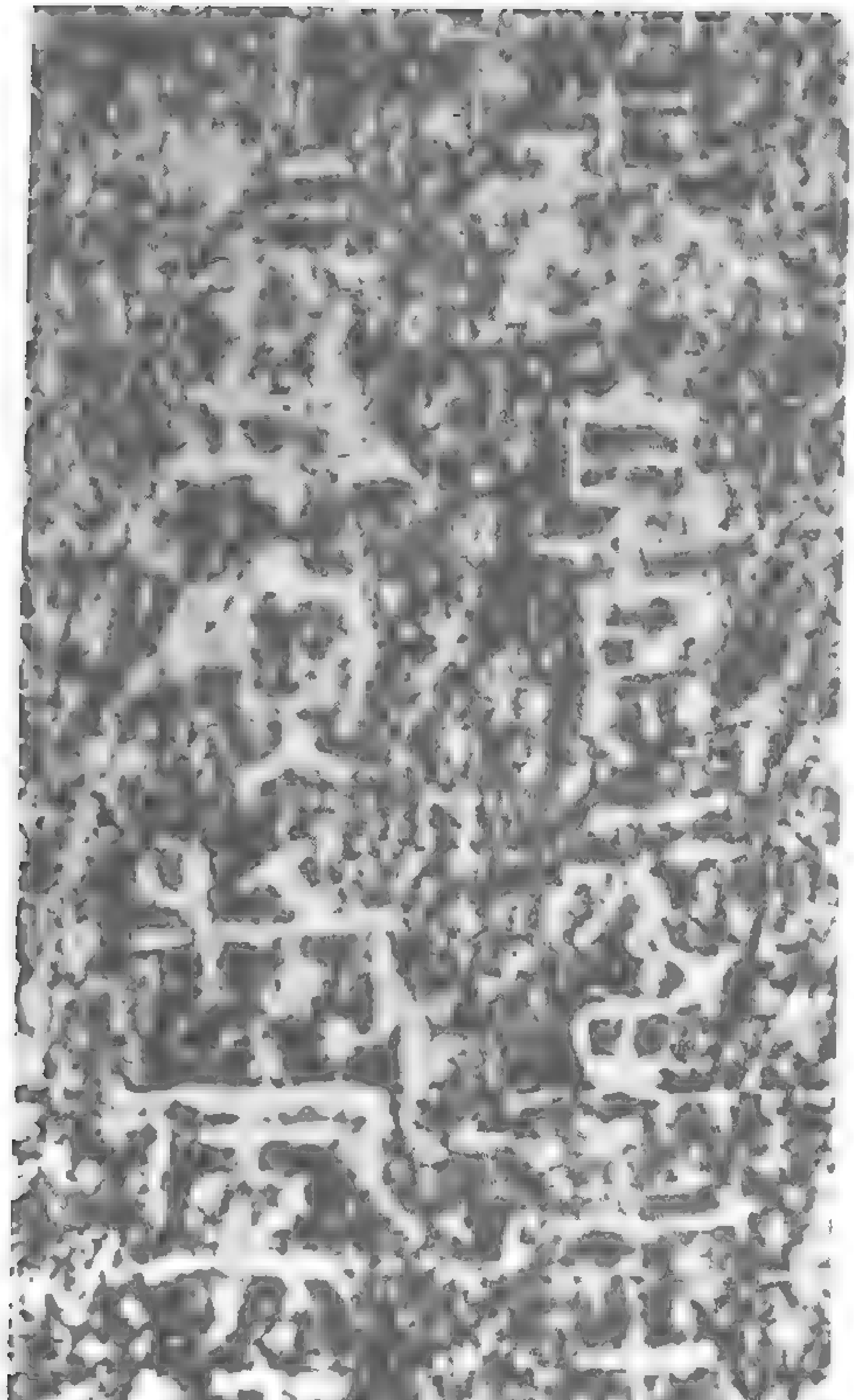
17 《玉盆》拓片

18 “银涛滚雪”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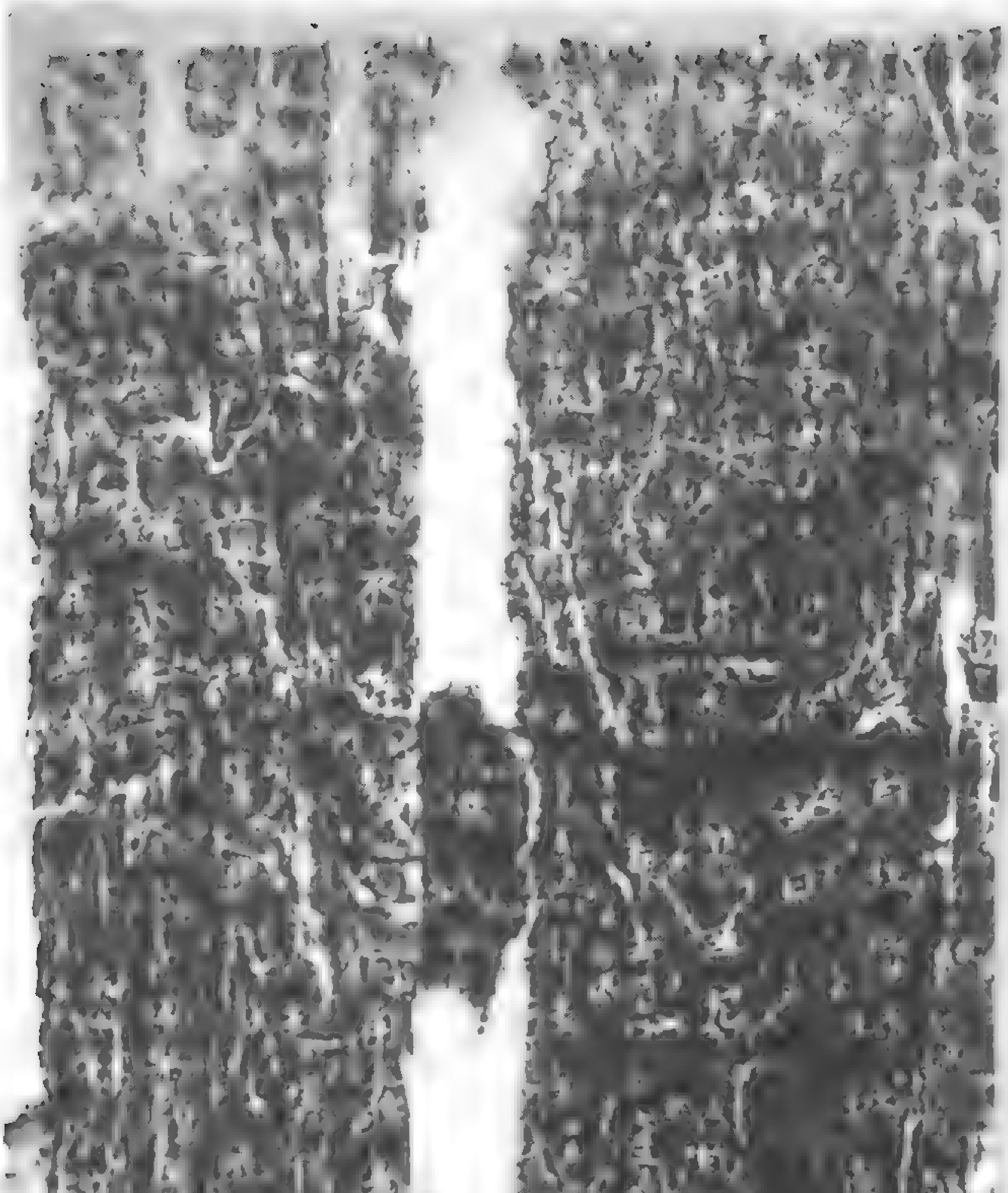


19　《衮雪》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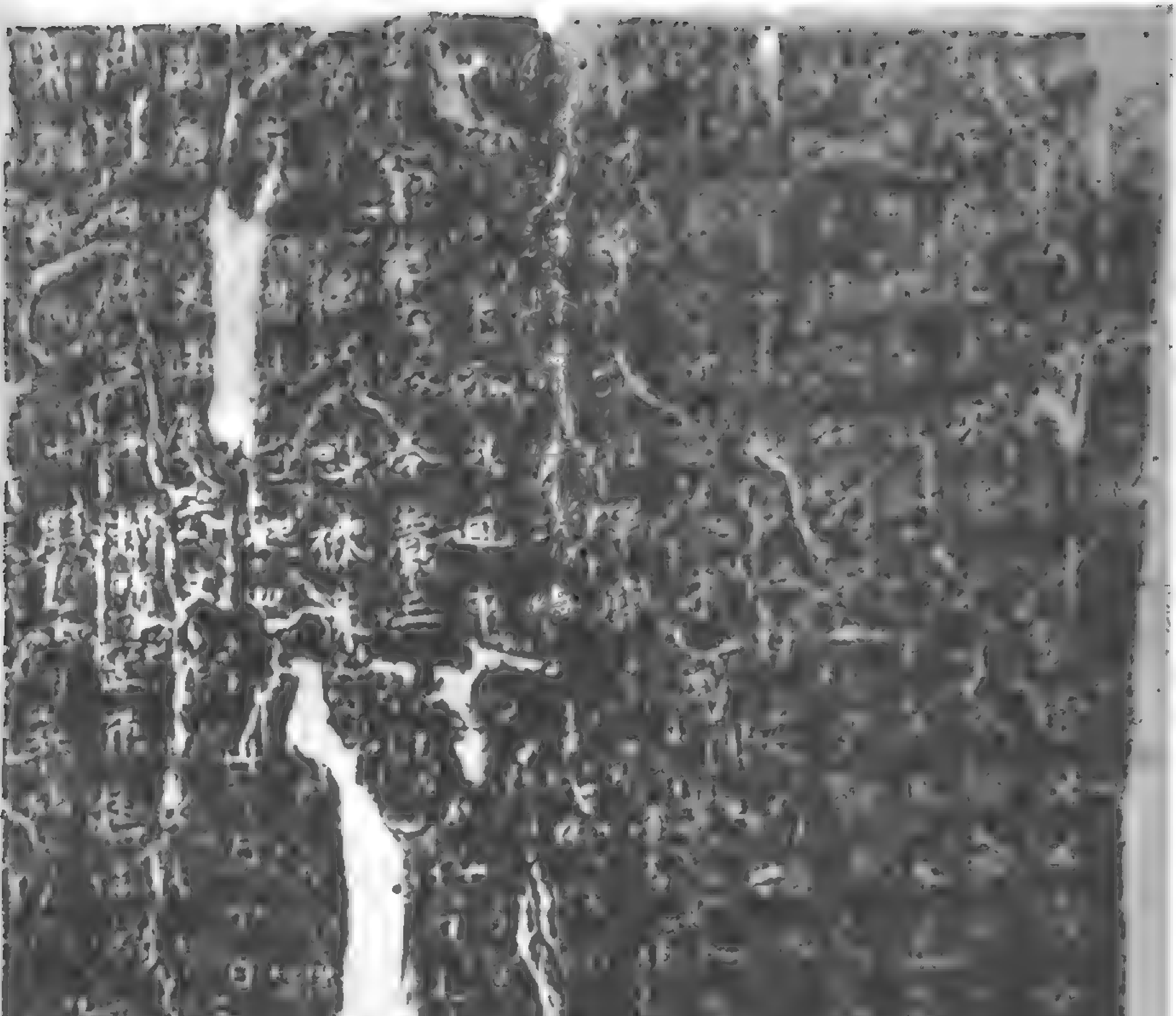
20　《石门》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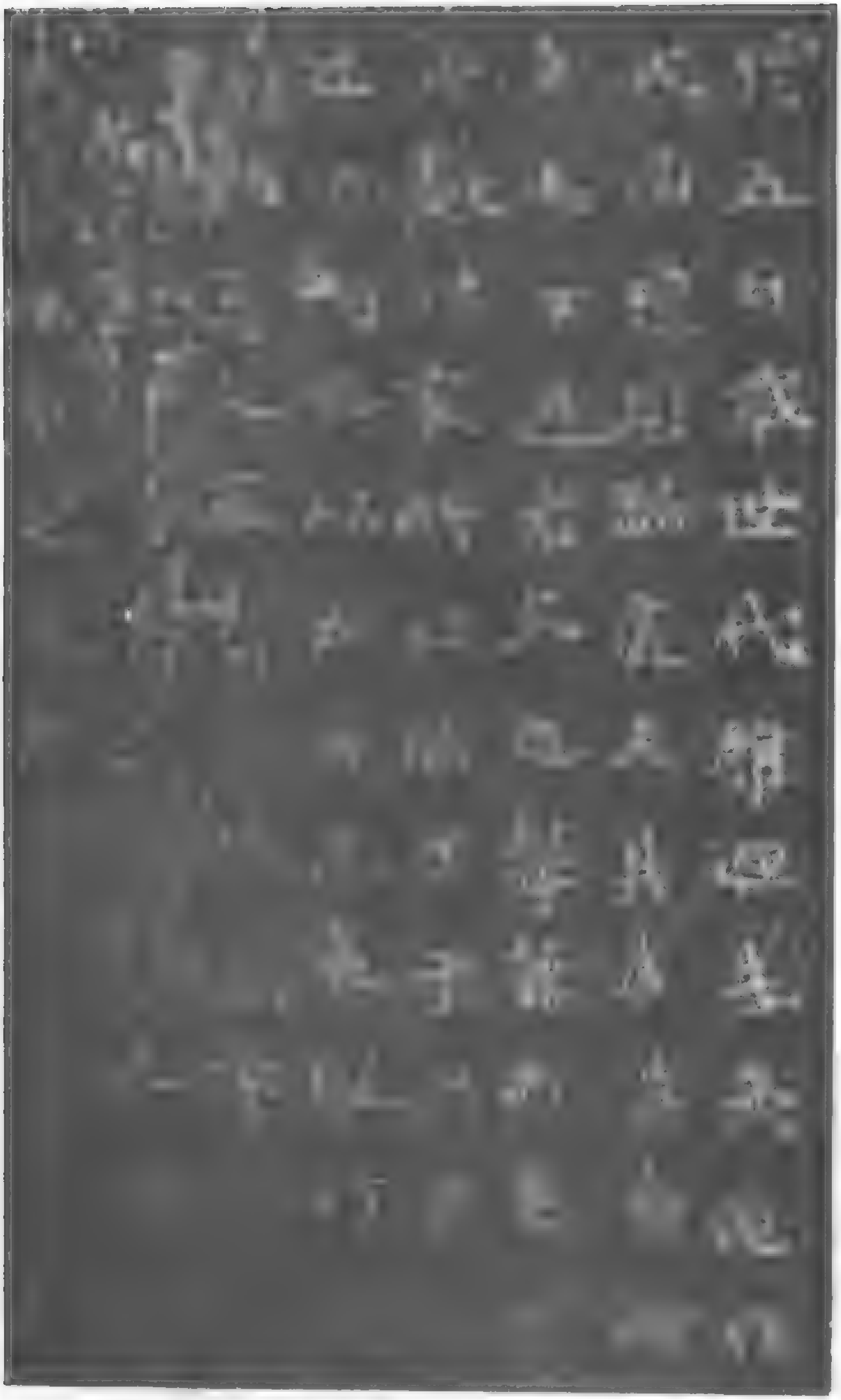


21 《李苞通阁道题名》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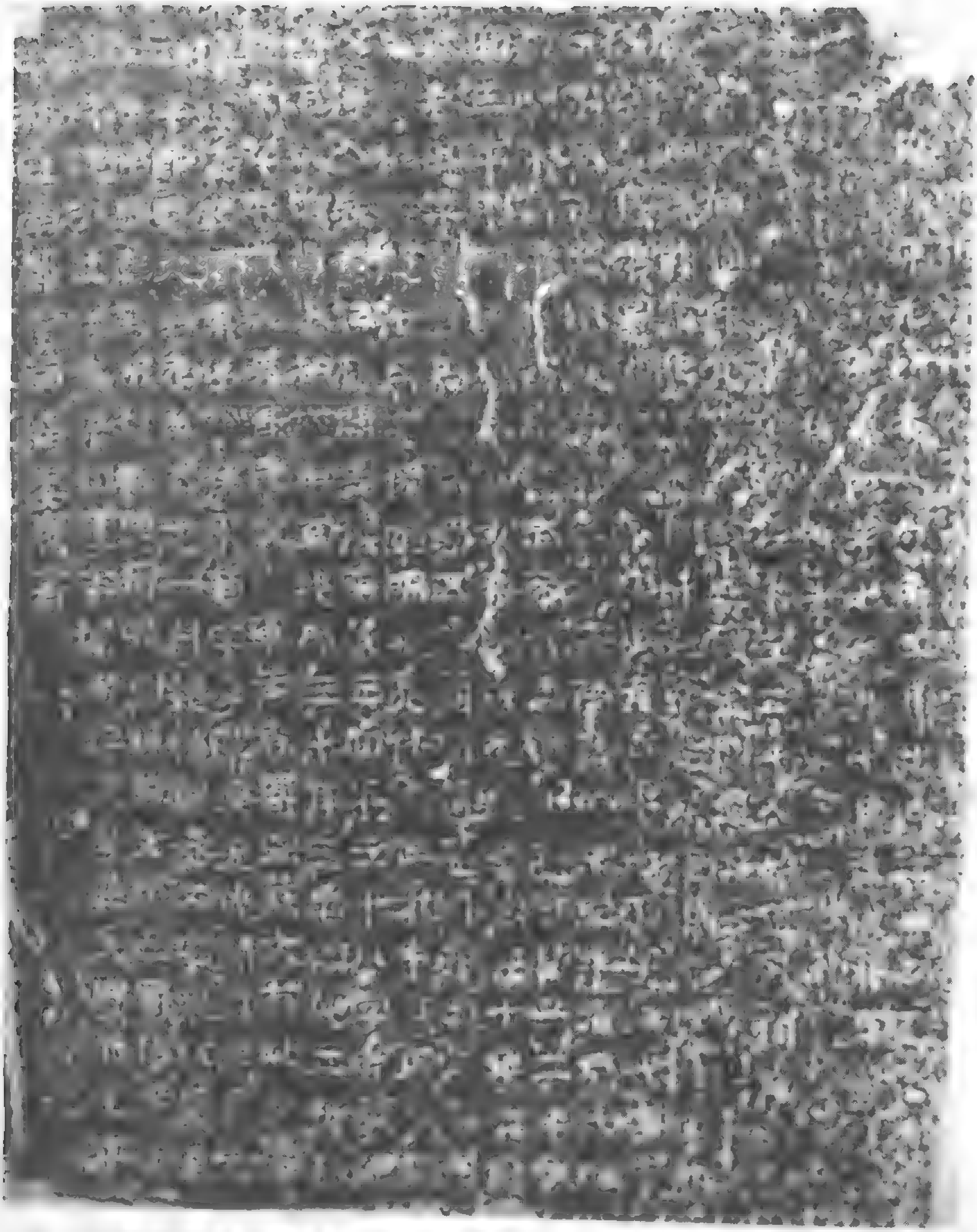
22 《石门铭》拓片





23　《石门铭》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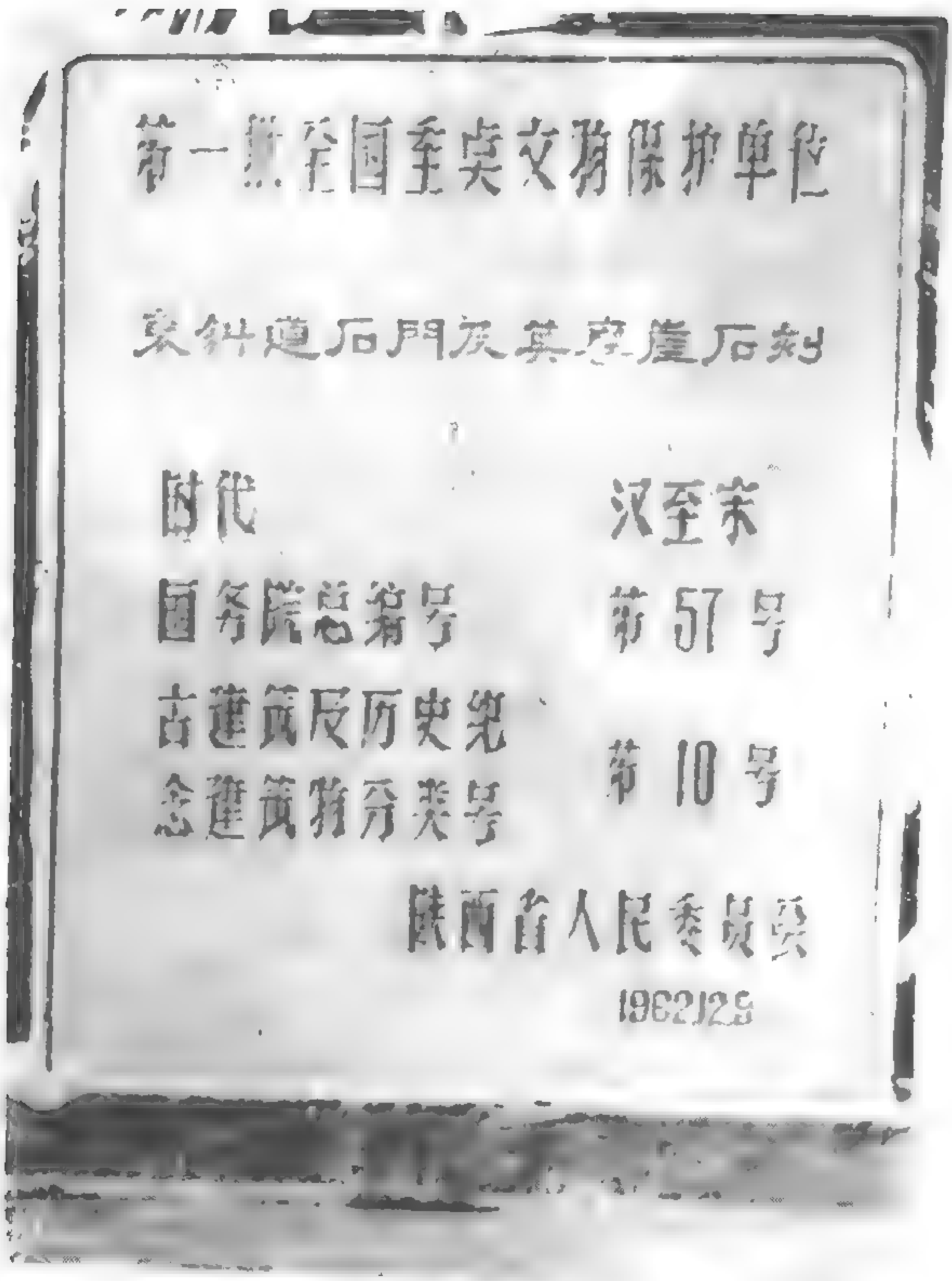
24 《石门铭小记》拓片



25 《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拓片

26 《山河堰落成记》刻石

27 《山河堰落成记》拓片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褒斜道石門及其摩崖石刻
时代 汉至宋
国务院总编号 第57号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分类号 第10号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1962.12.5

序

在陕西省汉中市以北的褒谷中，有古代摩崖石刻百余品，其中《石门十三品》尤为著称。所谓“石门十三品”，是指分布于褒谷石门内外，以汉魏刻石为主体的十三种崖摩石刻。兹依时代顺序列后：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

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

汉《杨淮、杨弼表记摩崖》

汉隶大字《“石虎”摩崖》

汉隶大字《“石门”摩崖》

汉隶大字《“玉盆”摩崖》

汉隶大字《“衮雪”摩崖》

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

北魏《石门铭》

南宋晏袤《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

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

南宋《山河堰落成记》

石门摩崖甚多，而前人唯独有“石门十三品”之说，也是说之有因的：

第一、石门十三品中，计汉刻有八，曹魏和北魏刻石各一，宋刻有三。其时代之久远，特别是汉刻之如此集中，又幸存至今，是珍奇而罕见的；

第二、石门十三品的文字内容，是研究我国最早的古栈

道——褒斜道和西汉水利设施——山河堰的珍贵资料，可据此校正史籍之错讹，亦可补充史籍之阙漏；

第三、石门十三品是我国汉魏到唐宋的书法真迹，对研究我国文字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特别是研究汉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以上原因，"石门十三品"一经诸家著录和赏识，就在百余种石门摩崖中显得出类拔萃了。它很早就为我国金石界和后来的考古界以及书法界所推崇，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十三品原在远离闹市的幽谷之中，与古栈道、古石门隧道是融为一体的。因其有深涧绝壁之障，故为历代兵燹祸乱所未及。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决定兴建拦截褒水之大坝，兴工之时正逢十年浩劫之始，工程单位单纯为了便于施工，乃在石门所在地开工建坝。数千年的古物因而濒临灭绝之危。经省、地、县各级文物部门奔走呼吁，中共陕西省委对此予以关顾，责成工程部门，将"石门十三品"及其它珍贵摩崖迁至汉中博物馆。担负迁移工程任务的文物工作者和工人同志们，连续奋战几个寒暑，废寝忘食，餐风宿露，经受千辛万苦，终于按预期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迁移任务。一九八一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付专款，兴建"石门十三品"专题陈列馆。如今，十三品原刻已陈列于新近落成的广厦明堂之中，既使古物得到妥善的保护，又便于游人得睹千古胜迹，可谓不幸中之有幸！

"石门十三品"与其余数以百计的褒谷摩崖，长时隐于深山僻野的幽谷之中，古今中外仰慕向往者虽有万千，但往往阻于重山之隔，有缘目睹其真面者寥寥无几；加之崖壁拓印艰难，或拓工拙劣；致使拓本模糊，无由辨识，或字迹漫漶残缺，难以卒读。在诸家著录中，常出现一些错讹或疏漏，殊为憾事。笔者因工作关系，有幸与之朝夕与共，又因责任所迫，不揣浅陋，为探其原委而竭尽微力，因对原刻反复摩挲，寻迹求声，顾文思义，逐一予以阐释，校字形之真伪，集古籍之精

粹，并钩深探赜，试陈拙见，藉补先辈的疏漏。历经数载之辛劳，乃成此书，以奉献于海内外广大好古之士，并求教于各界专家学者之前。

学海无涯，人生几何，况曾遭四害浩劫，蹉跎岁月，白白耗去了许多大好时光。今欣逢盛世，当奋起直追，倍加努力。余孜孜致力于斯之点滴所得，不过沧海中之一粟耳！若于今后之研究能稍有助益，则足偿夙望矣！

是为序。

郭荣章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序…………………………………………………………………（1）

石门摩崖刻石由来之概说……………………………………（1）
栈道之悠久与古堰之兴废同石门摩崖的关系………………（5）
古老的石门隧道与石门摩崖的关系…………………………（8）
褒谷风景及其名人轶闻与石门摩崖的关系…………………（11）

多彩的汉隶……………………………………………………（13）
书中仙品《石门铭》…………………………………………（20）
石门摩崖中的宋人法书………………………………………（21）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补正……………………………（23）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识评………………………（29）
汉《石门颂》新证……………………………………………（35）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浅识…………………………（46）
《杨淮、杨弼表记摩崖》补释………………………………（49）
《石虎》·钓台·郑子真……………………………………（58）
《玉盆》摩崖及其题刻浅识…………………………………（63）
《衮雪》摩崖与“魏武精神”………………………………（67）
《石门》摩崖刻字年代考辨…………………………………（70）
魏《李苞通阁道题名》与三国时的褒斜栈道………………（72）
考《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
——兼评晏袤释文……………………………………（82）

北魏《石门铭》考……………………………………………………(87)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与山河堰………………………………………(103)

后记…………………………………………………………………………(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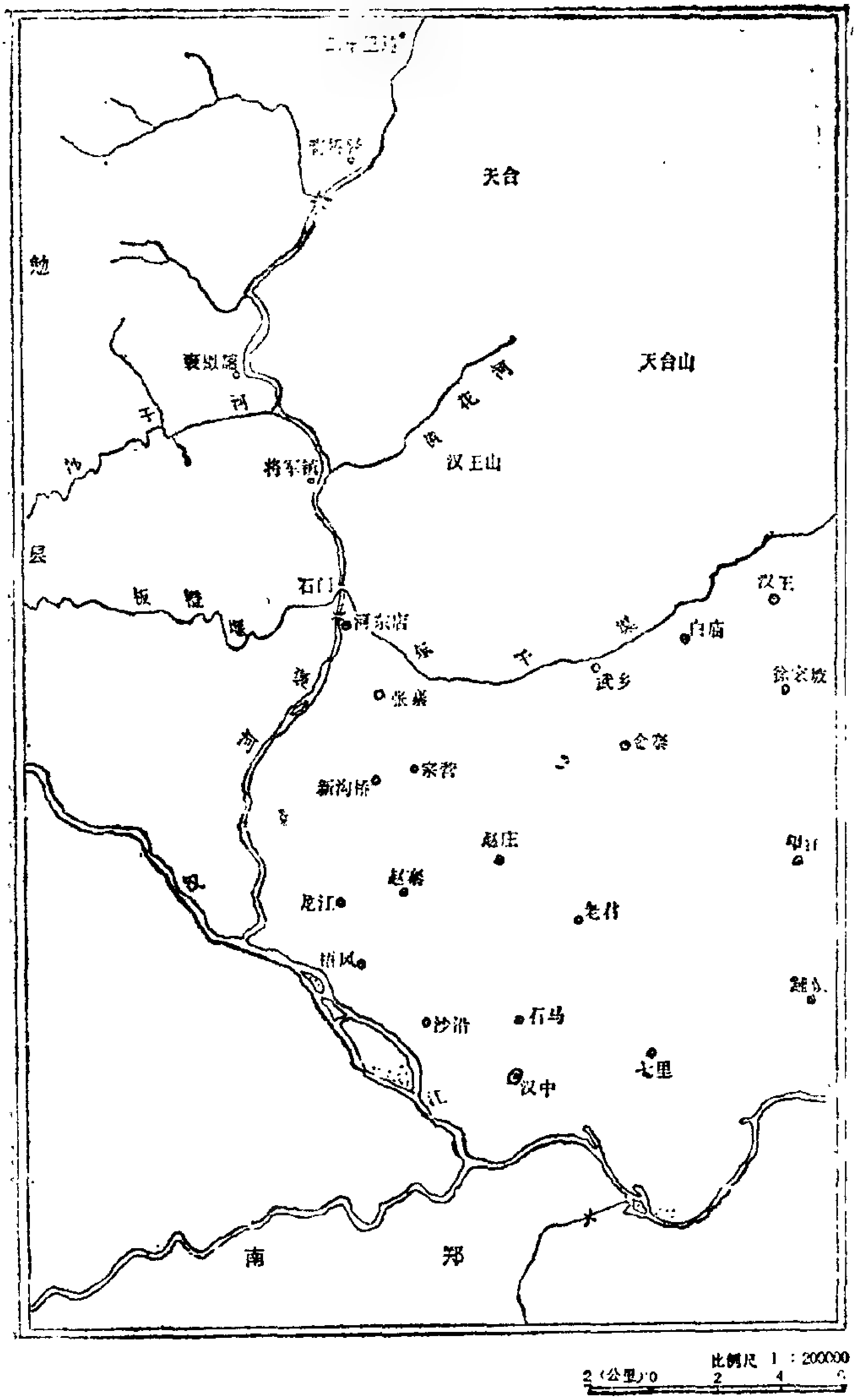
石门摩崖刻石由来之概说

古人纪事颂德，或镂于金，或刻于石，以求垂之长久也。然刻石在天地万物之间，其材巨形丰，性坚而稳，远非镂金所能匹敌。故自秦汉之后，刻石蔚然成风，而镂金渐次绝迹矣。

在刻石中，摩崖与山石混为一体，以其巍然巨制，非碑碣所可企及也，而追根溯源，循名核实，摩崖与碑碣则各自迥异。

这里先说碑碣。古时对碑有三种解释：其一，《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可见碑必在南，以示方位。其二，《礼记·祭义》载：“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这里碑又作系牲之用。其三，《释名释典艺》谓：“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盧（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此处的碑，作帝王安葬系绳下棺所用，且有追述死者功德之文字。迨至后世，碑石遍野，已失其本，致有龚自珍《说碑》曰：“庙有碑系牲拴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公德，此亦史之别子也。”今天可见到的历代石碑绝大多数是刻字的，人们对它视如珍宝，就因为它是“史之别子也。”至于现存的无字之碑，也不尽都是古碑。武则天陵墓上就有一通无字碑，据说这是武则天生前的巧意安排，以便后人评论她的功过，这自然另当别论。

褒谷石门位置


天台
天台山
汉王山
将军铺
石门
河东店
张寨
宗营
新沟桥
赵庄
赵寨
龙江
老君
沙沿
石马
汉中
七里
武乡
白庙
汉王
徐家坡
南
郑
比例尺 1：200000

碑和碣，也本义有别。碑，已如上述。碣者，其解有三：《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此其一也；柳宗元谓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此其二也。明郭宗昌《金石史》谓岐阳石鼓名"石碣"，舍此再无以石碣为名者。此其三也，但世俗皆以碑碣并称，且习以为常，亦无可如何。

再说摩崖。《金石索》谓："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盖在古时，事发于摩崖所在之处，乃就地镌石而记之。在今陕西汉中褒谷之石门，诚为摩崖荟萃之地。区区石门隧道之内壁，即有摩崖三十余种，连同石门南北峭壁之摩崖，竟数以百计。其如汉明帝永平中之《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桓帝建和二年之《石门颂》，桓帝永寿中之《李君开通阁道摩崖》，灵帝熹平二年之《杨淮、杨弼表记》，魏元帝景元四年之《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永平二年之《石门铭》，直至唐宋明清各代，延续不断，层出不穷，可谓摩崖之大观。

摩崖与碑同属刻石之纲，其本身之差别则属条目之异也。世俗也有以摩崖与碑并称者，如世称《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为《鄐君碑》，又称《李君开通阁道摩崖》为《李君碑》，其为数尚多，亦难尽述。然，推序本原，摩崖终归与碑不同。大凡摩崖者，皆缘其地利而始成。所谓地利者，有自然山石作为依托，此其一也；有史实、景物可凭吊者，此其二也。舍此是无从成为摩崖的。

浩翰的石门摩崖正是缘其地利而成的。

石门摩崖是以石门为中心的。石门是东汉永平中所开凿的一段隧道，褒斜道南出褒谷穿行于中。褒斜道又是由关中入蜀为时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最长的一条道路。为使这条道路上的车辆畅通，始有开石门之壮举。一条富有悠久历史的道路，加之石门之壮观，自然成为后人凭吊之胜迹。再者，石门所在地两山对峙，有"虎峰"、"熊山"之胜，有漫道雄关之险；

褒水又奔流于两山之中，时而激浪如飞雪翻滚，时而沉静如“浮浪玉盆”，有浅底细流，有深渊巨川，与两旁青山相辉映，虽非图画，胜似图画。行旅至此，耳目一新，能不寄情于褒谷山水吗？更有那引水溉田的古堰，肇自汉相萧、曹，世代人民深受其惠，历代文人墨客或视堰至褒谷，或鸠工修堰，感慨之余，又怎能不抒怀于临境呢？又怎能坐视褒谷胜景无动于衷呢？无怪乎在百余种石门摩崖中，记述栈道与石门之通塞，以及古堰之兴废，并藉以追怀古人之功德者屡见不鲜，另有描绘褒谷景物之胜者，亦有一般留名题记者。

综上所述，可见栈道之悠久历史，石门在交通隧道史上之声誉地位、古堰之兴废、山川之秀丽，以及褒谷之名人轶事等，皆为构成石门摩崖地利的因素。

栈道之悠久与古堰之兴废同石门摩崖的关系

据《华阳国志》所载："黄帝乘祇车出谷口，秦宓曰：'此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黄帝乘祇车出斜谷之传说，姑且不去管它，自武王伐纣至今也有三千余年了。

然而，褒斜道由普通之山道发展为栈道，只能是在普遍使用铁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战国策·秦策》记·范雎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范雎传》又记述蔡泽说范雎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这里的栈道指由秦入蜀所经过的褒斜道和金牛道。范雎相秦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到五十年期间，而蔡泽见范雎说这段话时是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这是栈道首见于史的记载。其实，栈道之形成，当在此之前了。至于《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的记载，则进一步说明褒斜栈道是由秦入蜀的唯一通道。经过这条通道，秦蜀两地即可"以所多易所鲜"了。

秦以后，由关中入蜀陆续增添了子午道、故道以及后来的傥骆道、米仓道等，而在各道中褒斜道同金牛道为其正道，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述："由关中以趋汉中，由汉中以趋蜀中者谓之栈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之金牛；而子午、傥骆以及米仓之道，用之者鲜矣！"《史记·河渠书》也说："入蜀从故道，故道多坂，回远，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正由于这个地理上的因素，再加上历史的原因，褒斜道向为各代朝廷所重。

继汉武帝"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后，到东汉明

帝永平中又诏遣汉中太守鄐君，“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并在这次开道过程中，凿通了石门这个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其后，褒斜道上车辆畅通，秦岭天险一变而为坦途。时人感于鄐君治道之功，乃为之记，镌于石门南半里许的崖壁上，诸家称此为《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从此为褒谷摩崖开了先例。

东汉后期，宦官擅权，朝政日衰，四民不安。至安帝永初元年，西方少数民族“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时称“元二之灾”（见《后汉书·安帝纪》）。在这次战争中，褒斜道遭到破坏，南北往来只好复循子午道，而子午道非常艰险，给往返行人造成极大的困难。于是司隶校尉杨孟文于顺帝延光四年，多次上疏请修褒斜道。对此朝廷争议不休，杨孟文据理力争，顺帝终于从其所请，“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见《后汉书·顺帝纪》）。桓帝建和二年，王升为汉中太守，至褒谷石门，追述杨孟文之功德，乃为之记，镌于石门西壁，是谓“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世称《石门颂》。此为石门内摩崖之首。

此后，或因战争破坏，或因自然摧残，褒斜栈道屡废屡修，通塞不恒。史书上的这类记载，多有阙漏，而摩崖堪为借鉴补遗。最著名的北魏永平二年的改道，而史所未书，王远《石门铭》却为之记。至于其它记述通、塞之类的摩崖，不胜枚举。可见褒斜栈道之悠久历史，是形成石门摩崖的首要因素。

此外，褒水源远流长，水量充沛，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支流。据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记，宋以前褒水一名山河水。水至谷口，踞高临下，古人因势利导，夙有引水溉田之法。汉相萧何又拟古创新，在谷口上源，固之以木，聚之以石，筑堰拦水；又随山濬川，使水流分注于南郑与褒城之野。此项水利设施名曰山河堰。

汉中素称鱼米之乡。世代黎民颇得古堰之惠，对古堰之兴

废，自然关心备至，但有官员鸠工修堰，辄召即应。历代修堰之事，屡见不鲜。每遇大修，常勒石以记其事。如《杨绛山河堰记略》、《山河堰落成记》，皆为记述南宋乾道和绍熙间修堰之摩崖。宋以后，这类摩崖颇多，恕不一一列举。

仅此数例，已足可说明古堰之兴废与石门摩崖间也存在着不解之缘。

古老的石门隧道与石门摩崖的关系

褒斜栈道，是古代蜀道上的一条交通要道，褒斜道南出褒谷，穿行于一段隧道之中，这段隧道就叫石门。《水经注》“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即此。左思《蜀都赋》“阻以石门”，斯之谓也。石门位于今汉中市境内的褒谷南端，距谷口约七里之遥，此处名曰七盘山。古人有“七盘蚁旋转，百折马行空”之咏。东汉永平中，为克服此处之路障，使行经栈道的车辆畅通，明帝刘庄乃下诏开通石门。

石门大体呈南北向，与褒谷谷道平行，其底部与栈道在同一水平线上，东西两壁长短不一，东壁长十六点五米，西壁长十五米；有南北二出口，南口高三点四五米，宽四点二米，北口高三点七五米，宽四点一米；南北高差三十～五十厘米；石门内岩石裸露，无斧凿痕迹，岩面修整平顺。何致如此？《褒谷古蹟辑略》中载清人贾复汉《栈道歌》有“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即加如腐削”之句，似已说明石门大约是以火烧水激之后加以开凿的。可见石门隧道的开凿方法是一重大创造。我国最早的隧道，《左传》中曾有“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记载，那是公元前七二二年的事，郑莊公与其母重逢于一段地道之中，是谓“隧而相见”。这段地道显然不同于石门这样的隧道。

据汉长安城地下发掘所示，汉时一轨之宽为今天的一点五米，足见车辆可在石门内并行无阻。石门的规模正是栈道通车的一个可靠证据。王远《石门铭》中有“穹窿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駟牡其騆。千载绝轨，百辆更新”之句，如实描绘了栈道上车辆畅通的盛况。

石门的开凿，标志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示了我们先辈的智慧和才能。

在世界隧道史上，褒谷石门也可说是一个创举。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C•奥森道尔夫所著《隧道建筑》一书所载，公元前六百〇五～五百六十二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er）执政期间，从皇宫到太阳神庙开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曾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床下通过。该书又载，在罗马的惠思葩西安（Vespasian）人，曾在阿皮令（Appenin）山中开筑人行隧道……。有一条饶有风趣的隧道建筑，那就是那不勒斯（Naples）地方的“婆西里勃洞”（Grotto of Posilipp）的隧道。《大英百科全书》称此隧道是在公元前三六年完成的，至今仍然畅通。

又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九月出版唐山铁道学院编著的《山岭隧道》一书所记：“第一个交通线上的隧道是纪元前二千一百八十～二千一百六十年在巴比伦城中幼发拉底河下修筑的人行隧道，该隧道长九百米……用砖衬砌。”

日本大塚本夫所著《トンネル工学》一书（一九七〇年六月出版），也说幼发拉底河河底隧道，是记载中最古老的大型隧道。大约在四千年前所修，是用明挖法施工的。全长九百米，其中河底长一百八十米，用砖砌成。它是为连接古代巴比仑的赛未拉米斯女王时代的王宫和丘比特寺院而修建的。

以上记载，说法不一。《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八卷《隧道工程》条记述：“公元前二千一百八十年～二千一百六十年，在幼发拉底河下修了一条约有三千呎的砖砌的人行隧道，连接皇宫和寺庙”。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隧道了。所不同的是用明挖法施工，以砖石衬砌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称为“婆西里勃洞”（Grotto of Posilipp）的那个类似石门这样的隧道，其开凿时间在公元前三六年，比石门仅早百年。而且，那条隧道仅能供人穿行，未能行驶车辆。

至于那用明挖法以砖砌成的隧道，同褒斜道石门这样的穿山隧道就难于类比了。因此，应该说，褒斜道石门是世界上用于通行车辆的最早的穿山隧道，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这个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石门隧道，历代过往行旅、游客，览此伟迹，无不情动于衷，争相于石门东西两壁镌文记事抒怀。自汉至明清，世代不绝，琳琅满目的石门摩崖刻石这一宝库，遂如此而告成。

壮哉，石门！

美哉，石门！

褒谷风景及其名人轶闻与石门摩崖的关系

褒谷风景在《褒谷古蹟辑略》中所记甚详，有二十四景之胜，诸如："堰口镇珠"、"银涛滚雪"、"虎石啸风"、"龙潭印月"、"隐士钓台"、"翠屏夕照"、"七盘古道"、"浮浪玉盆"、"关耸鸡头"等等，清人王晚香对每一景物皆曾赋诗志之，后为罗秀书所采录。游观者览此胜迹，情发于内，对景物之描述，常有独到之匠心。如"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皆属古人以物喻景之妙笔，不事雕饰，而贴切自然。在石门南口崖壁上又镌有"别有天"三个大字，系古人对石门的绝妙赞喻。世代更迭，人材辈出，眼高聪慧之识者，又岂寥寥乎？这也是石门摩崖得以延续不绝的原因之一。

褒谷中之名人轶闻，世代相传，不胜枚举，而多为志乘所未录。幸有摩崖文字可考，遂不负前贤之功德，亦堪补史籍之阙漏。东汉灵帝熹平二年所镌《杨淮、杨弼表记》摩崖，备述杨孟文之孙辈杨淮、杨弼之仕迹，并称羡杨孟文及其孙辈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之高风。北魏永平二年所镌之《石门铭》，记述贾三德治道之功绩，盛赞贾三德在工程技术上"精解冥会"，在事业上"忠公忘私"之美德。徵之于史，杨孟文、杨淮两人于《华阳国志》中略有所记，杨弼、贾三德其人皆史所未书。又有宋人所镌《游石门诗》云："凌晨走马过花村，先玩玉盆到石门。细想张良烧断处，崖前伫立欲销魂。"这首诗追忆了张良谏汉王刘邦烧栈道之往事，对众说纷纭的烧栈道之迹亦有所徵。至于西汉隐士郑子真，躬耕褒谷中，约身自守，累却王凤

之聘这段佳话，不仅载之于史，而且李白诗中亦有“谷口郑子真，躬耕在崖石”之句，可为其佐证。郑子真在褒谷垂钓的钓台，还有“石虎”两个汉隶大字刻石，传为郑子真之手迹，而史所未记。凡此，皆由摩崖以补之，足见摩崖与名人轶闻，亦有夙缘。

多彩的汉隶

"石门十三品"向为书家所称道，清代书法家罗秀书观石门汉刻而赞之曰："其古恒也，如龙蟠深壑而其鳞角杈枒，其飘逸也，如凤舞晴空而其羽毛鲜丽。"作为十三品之一的《石门铭》，实堪称魏书之精英，极负盛名。在十三品中，汉刻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宋刻隶书摩崖三品，多为千余年前古人之手笔。吾人浅陋，岂敢妄加品评，惟因工作关系，与之朝夕与共，俯仰久之，稍知皮毛，不揣浅陋，略述拙见。

十三品中，最早的汉隶《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系明帝永平中所镌。桓帝之后，相继有《石门颂》、《杨淮、杨弼表记》、《李君修阁道记》、《李苞修阁道记》及"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等汉隶大字摩崖，内中仅有《石门颂》摩崖注明书者，余皆佚名。盖在汉时，勒石只是为了记事、颂功，并不耿耿于书法。东汉末因儒家经籍，相互传抄，文字多谬，致有蔡邕等人于熹平中奉诏正《五经》文字，并镌碑立于太学门外，谓《熹平石经》，其目的乃在于校订经籍，并非表彰书法。汉刻中大多不言书者姓名，或有署某某书佐所书者，而书佐不过普通书吏耳，而非后世所谓的名家。书法作为上层文人的雅技，这是在汉以后的事了。

考之我国文字源流，记载中说，籀史大篆，李斯小篆，程邈始作隶书者云云。其实，我国文字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虽错综复杂，但亦有脉络可循。早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就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与后来的甲骨文极其相似，而甲骨文又与商周的金文大篆颇为类同。由于大篆使用不便，乃有小篆、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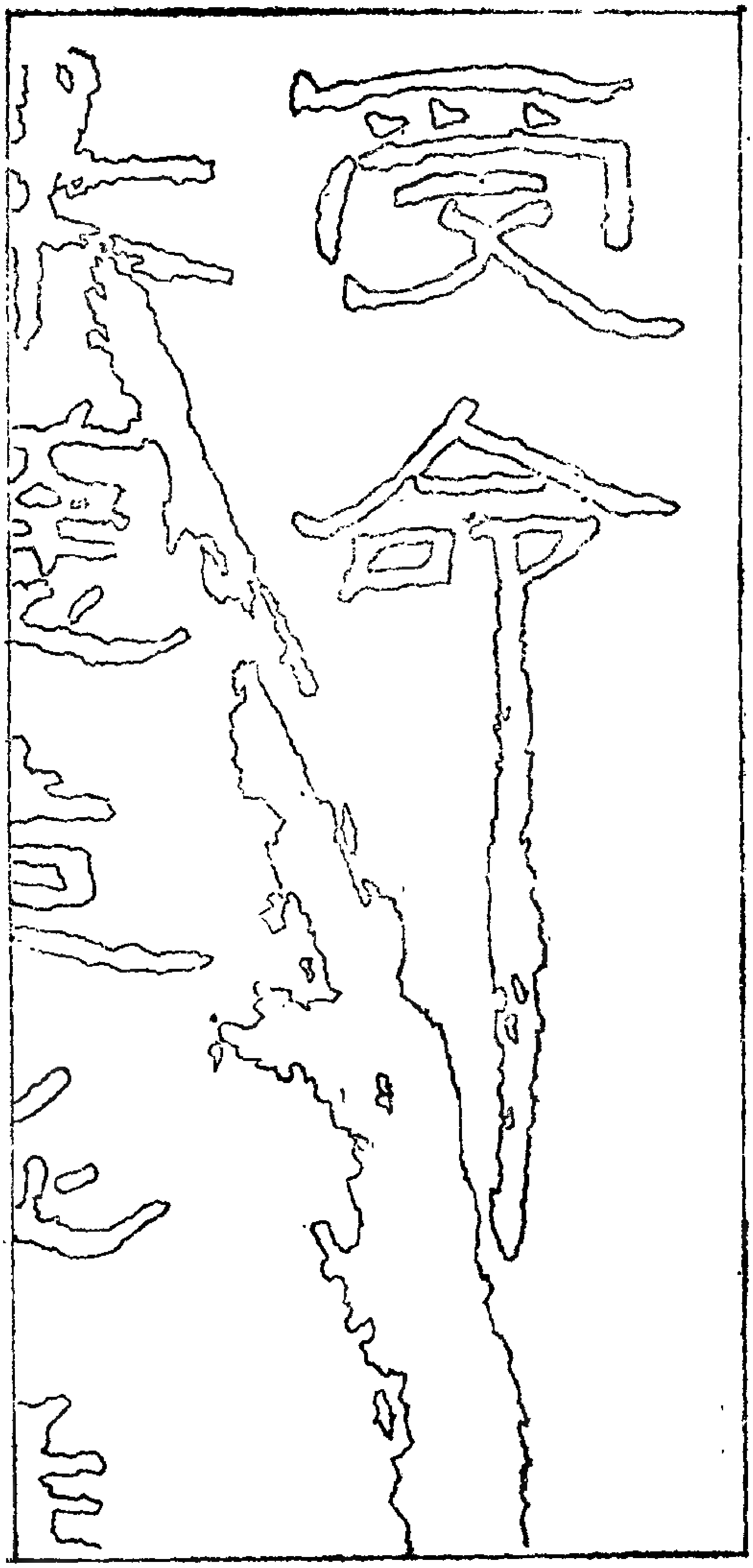
的出现，进而有便于书写的草书、行草，后来又产生了既便于书写，又容易辨认的楷书。无论是字形、笔划、音义的创造，或是书体的形成，都不是某个圣贤个人的功劳。文字随社会而前进，文字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国文字的发展，大体上经历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总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并未完结。文字是古今人类从事各项事业的重要工具，人类一面使用它，一面去研究它，改革它。由原始社会的文字符号，到复杂的金文大篆，这是在直观的基础上用形象文字表示事物的过程；由大篆到小篆、隶书、章草、行草、楷书，这是对原来的形象文字归纳、整理和改进的过程。这种改进的目的，乃在于解散原有文字的繁琐结构和革新原有文字的书写方法，以便使新的文字能够变得简单易行一些。这就是数千年来，文字进化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以自身创造性的工作，促进了这个潮流的，便成为各时代的名家；而这种名家是在广大群众不断革新创造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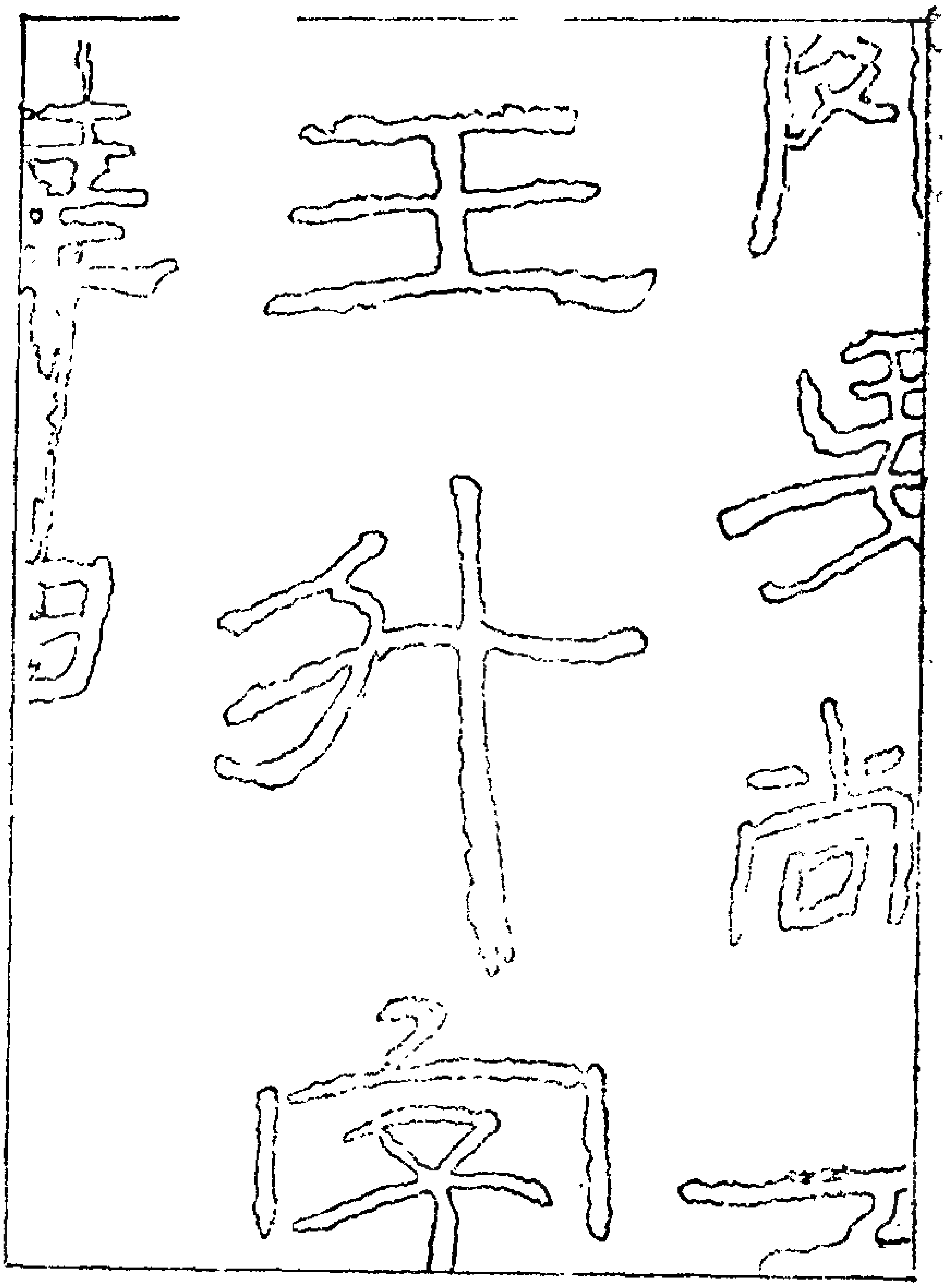
石门汉刻是我国文字由篆到隶时期的产物。《鄐君开通阁道摩崖》，具有早期隶书的特色。桓帝建和二年的《石门颂》及其后的各汉刻，皆为较成熟的汉隶，这是由早期隶发展而来的。早前的圆转笔，几乎全部变为宜于书写的方折笔，有了明显的波磔，横笔的起收如“蚕头雁尾”。

书写石门汉刻的虽非名家，但其神态各别。既有汉隶的时代特色，又有书者鲜明的个性。《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字形方整，笔画粗细长短参差不齐，无波磔，是由篆向隶过渡的书体，挥毫弛骋排宕，古朴苍劲，仍保留着西汉时期隶书艺术的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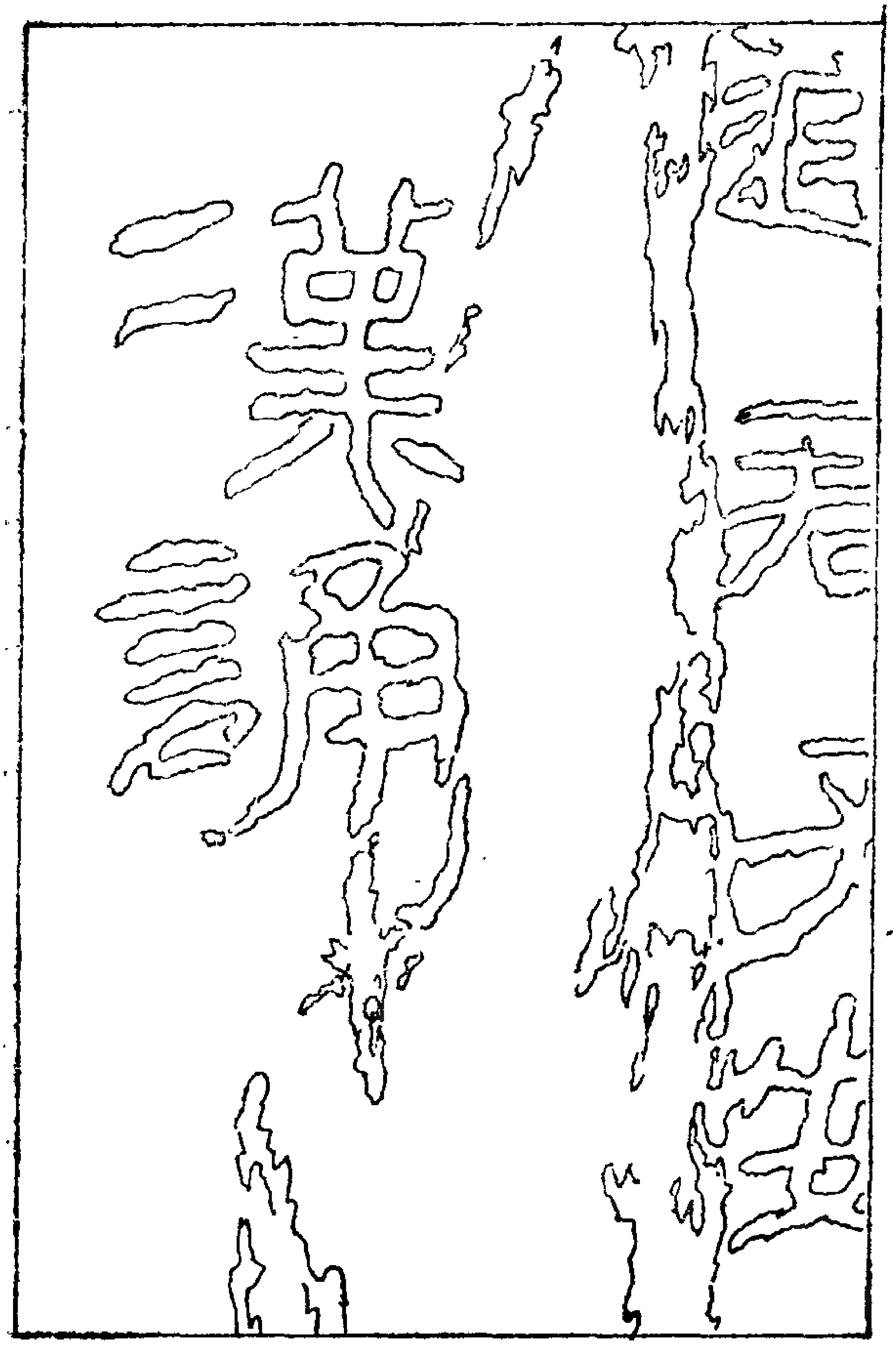
誉为汉隶代表作的《石门颂》，向为书坛所推崇，其用笔纵放，洒脱自然，挺劲多姿，堪为汉代隶书中具有鲜明个性的杰作。

《石门颂》中“高祖受命”的“命”字，“王升”的





“升”字，“世世叹诵”的“诵”字三字垂笔甚长，特别是命字长过一二字之多。这种打破汉隶常规的写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汉时人善颂亦善祷，往往随事喻指，颂祷结合。“命”字垂笔之长，象征汉王朝长久不息也；“诵”字垂笔之长，意谓长诵不已也；“升”字不仅垂笔略长，且横笔亦长，显系书者对其上司王升之崇敬耳。类似情形在其它汉刻中亦有所见，如《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的“年”字，也是垂笔颇长，究其原因，亦属此理。其二，《石门颂》摩崖通高2.61米，宽2.05米，在镌刻前先要用朱笔把文稿写在崖面上，叫做



“书丹”。这样大的摩崖，书丹时石质纹理和书者身躯的势态，对每一字的笔画都有直接影响。以“命”字而论，在此字之下两格许，石质竖裂，不可接书，书者将命字垂笔索性拉长至两格许，恰填其空。可谓因地制宜之妙笔。其三，这三字垂笔之长，也正合于书者那种纵放不羁的性格，可谓于祷、于颂，于书，三者皆得。通篇疏密相宜，势态宏伟，充分体现了

摩崖刻石特有的美，通常见到的碑是不能与之比拟的。

与《石门颂》书体相近的，如《杨淮、杨弼表记摩崖》，其挺拔之姿和野逸之势，似更有过之。次如桓帝永寿中所镌之《李君通阁道摩崖》，行字参差错落，似漫不经意而成，有自然不拘之情趣。

“石虎”、“石门”、“玉盆”、“衮雪”八个汉隶大字，既无书者姓名，又无勒石年月，何以知其为汉人手迹？其据有三：

（一）这八个大字都与一定的史实和人物相联系。“石虎”传为西汉隐士郑子真见褒谷中的石虎峰所书，而郑子真隐居褒谷，史有所载。“石门”源于明帝诏书：“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盖在汉时，尚无隧道之名，遂以石门而喻之。“石门”二字显然是为明帝永平中凿通的隧道而命名的。“玉盆”曾有人以为是张良过褒谷时所书，似难认定；然原石经流水冲蚀，磨泐殊甚，字迹隐隐可见，必为远久之物，宋人恐其泯灭，所摹临之“玉盆”二字，今尚清晰。“衮雪”则传为曹操手笔，虽众说纷纭，然颇为可信。“衮雪”亦另见宋人白巨济和清人张令所临摹者，褒谷中三石并存，而真赝分明。

（二）这八个大字相互之间皆有一定的承接关系。“石虎”既为西汉郑子真所书，当在最先。“石虎”摩崖之侧镌有“郑子真”三小字，有人疑为晏袤手笔，亦无从判定。然这三字笔力远逊“石虎”二字，显系后人所镌，原石并未署名。汉人质朴，不尚浮名，况时人并不以善书为荣，汉刻多不署名，郑子真自难例外。此后“石门”、“玉盆”、“衮雪”六个大字均无书者之名，当皆缘此例。

（三）在书法上，这八字分别出自四人之手，情态互别，各饶意趣。“石虎”二字，用笔圆浑，古拙苍劲；“石门”二字，温润古朴，门字东西两竖笔有“八”向分开之势，如援弓待发，气魄昂然；“玉盆”笔力浑厚，气势雄强；“衮雪”二

字，笔画圆润，运笔似流水行云，而又笔力遒劲，似“棉里包针”，柔中有刚。

石门摩崖汉隶中许多字今已不用，《说文》等书亦无所载。如以“楗”为犍，以“醳”为释，以“佘”为斜，以“珉”为氐等，或取音之相近，或取体之相似。又如“蘱、蘋、蘷”、“莚”，比之今字皆多草头；另有取大小篆之古体者，如以“巛”作坤，以“顯”作顯等诸如此类之字，见之于志乘者，多有错讹。寻踪求迹，谁赖金石。一览石门汉刻摩崖，古今字形衍变之踪迹，可由此窥其一斑。

书中仙品《石门铭》

王远《石门铭》记载了北魏永平中褒斜道改道和复通石门的经过，并表彰请求改道的羊祉和具体参与改道的贾三德两人的功勋。是一篇珍贵的史料。可知当时镌此摩崖的目的仍在于记事颂德，而非显扬书法。然而，在书法艺术上，《石门铭》却是垂之千古的出色创造，有严格的魏书法度，又具独特的风采。

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评论北碑说："北碑划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具备，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近代书法家康有为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又说北魏之碑"体裁俊伟，笔气深厚"。《石门铭》体态飞逸，被誉为"书中之仙品"，堪称北碑中之精萃。近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师法《石门铭》，卓然自成一家。他在《右任墨缘》中曾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就是极好的赞誉。

《石门铭》随崖面石势而分行布白，其"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

《石门铭》的书体，介乎隶楷之间，融隶楷为一炉。"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是我国文字由隶到楷过渡阶段的佳作。《石门铭》的书者王远，善文工书，其文如万倾波涛，层层叠嶂，其书似风棲绿茵，俊伟飞逸。

石门摩崖中的宋人法书

石门摩崖中，有“石门题名十八段”、“玉盆题名十二段”，皆宋人之手笔；加之石门南北山崖上亦有宋刻分布其间。宋刻为数之多甚为可观。其中唯南宋晏袤所书《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和《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释文》，以及《山河堰落成记摩崖》数刻，列入了著名的“石门十三品”，而其它宋刻摩崖却未获此盛名，何也？盖南宋晏袤所撰的释文，皆源于汉刻，此其一也；引褒水溉田的山河堰，又肇自汉相萧何，亦为汉时之遗迹，此其二也；加之这三方摩崖本身，既重于文，又长于书，可谓书文并茂，其它题名、题记之类的宋刻摩崖，就相形见绌了。此其三也。

晏袤是南宋绍熙年间的南郑县令，性嗜好古，尤工隶书，其书颇有汉隶之风范，加之分行布白，整齐可观，文字的结体方严、端正，大小均匀，笔势峻整，堪为宋代隶书中之佳品。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亦为南宋绍熙时所镌。未注书者姓名，观其笔意，似为晏袤手书。此摩崖的字径约十六厘米许，疏密匀称，较之晏袤所书的另两方摩崖，其书法技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且此摩崖的石质精良，至今字迹犹新，其造型丰美，妩媚多姿，当是晏袤的得意之作。人称其为隶中之“草书”，行笔爽利，仪态妖娆。

晏袤所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开通阁道摩崖》原刻，系工整之楷书，笔锋锐利，出入点画，皆为楷书之风范。在整个石门摩崖中，是独树一帜的。据清代罗秀书所考，此为隋唐人手笔，而晏袤释文中误认为是三国时魏人之书迹，竟至闹出了

一些笑话，颇为后人所讥。但，晏袤在书法艺术上的建树，是无可置疑的。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补正

汉明帝永平六年至九年（公元六三～六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时人为文记其事，镌于褒谷石门西南半里许的山崖间。有文无题，历代金石家皆以文义命名，或曰《开通褒斜道石刻》（《金石萃编》），或曰《开通褒斜道摩崖》（《关中金石记》），或曰《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开通褒斜道碑》（《褒谷古蹟辑略》），或曰《汉永平开通褒斜道石刻》（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张传玺《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一文），拙作称此刻为《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仍以体现文义为宗。此刻已于一九七一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其通高可分三段：前段八十厘米，中段一〇三厘米，后段一二五厘米，上沿宽二七二厘米，下沿宽二七六厘米；文十六行，行五至十一字不等，字径九～十六厘米；体介篆隶之间，甚平正而长短广狭不一。

此刻近拓隐约可见者尚有九十七字，兹备录如后：“永平六□□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弘、史荀茂、张宇□□□□□□，太□□□汉□颿□□□□，始作桥格□百□□□，大桥五，为道二百□□□□，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

据《金石萃编》引《两汉金石记》所载，南宋晏袤发现此刻时共159字。亦照录如后：“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通褒斜□，太守钜鹿鄐

君、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第典功作，太守丞□□杨顯将陨用，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

这段录文虽有个别错字，如王弘的弘作宏，但毕竟比较齐全，这对今人详识此刻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录文实有一百五十字，所云一百五十九字者，疑误。

关于此刻的发现，据南宋晏袤在对此刻的释文中声称，绍熙甲寅（公元一一九四年）三月甲子，他以堰事至褒谷，首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然而，早在婁机的《字源》中已记有此刻；《两汉金石记》也说：“晏题记之前，拓本尚隐隐有字”。看来晏袤并非此刻的首先发现者，此虽无大碍，亦应澄清。

此外，晏袤对此刻的释文有较多的疏漏和舛误，亦有必要予以补正。

一、关于刻石的时间

晏袤释文曰：“汉中郡太守鄐君修桥格碑一百五十九字，汉明帝永平六年刻于褒谷中”，这个时间就说错了。永平六年是鄐君承修褒斜道工程开始的一年，工程未了，何以刻石？以文义推之，应是永平九年四月完工之日或完工之后才刻石，否则石刻文字不会记述工程的全过程的。《两汉金石记》也曾指出：“晏既谓此文刻于永平六年，又云九年成就？……婁氏《字源》载此刻云永平九年立……或婁氏九年之说有所据依耳。”

二、关于开凿石门之事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全文无从知道。宋婁机和晏袤所录皆属残刻，其文并未述及开凿石门之事。然而，石门确是汉永平六年至九年期间汉中太守鄐君承修褒斜道过程中开凿

的。其主要依据如下：

1．汉建和二年《石门颂》中有“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之句，这与《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之句有承接关系，说明在永平四年明帝下诏开褒斜道并凿通石门，到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才奉诏而行动的。在早期的封建社会，这样大的工程，从下诏到行动有一个必经的过程，是不难理解的。

2．北魏永平二年王远《石门铭》中有“此门盖永平中所穿”之句，毕沅《关中金石记》谓此句即指鄐君事言之，所谓鄐君事即汉中太守鄐君承修褒斜道一事，毕沅也认为鄐君在承修褒斜道的过程中凿通了石门。

自石门开凿之后，两壁历代刻石几满，尤以东汉建和二年的《石门颂》和北魏永平二年的《石门铭》称著于世，其文字记载已为探索石门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至于《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何以未述及开凿石门之事？这可参照《石门铭》来加以说明。石门在北魏永平中曾予复通，是在贾三德改道过程中复通的，但在记载贾三德改道的《石门铭》中，亦未提及复通石门之事，在《石门铭》正文之后《贾三德题记》中，才对此略有所记。《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因其石质剥落，是否有类似的题记，已无从知晓，但鄐君凿通石门似无可疑。

南宋晏袤在《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中记述：“石门基于秦，开于高帝……永平四年司隶校尉杨孟文以诏书凿通石门，又从而广之”。并称“鄐君、杨君为民兴此阁道，三年而后成，曾不讳劳而史逸其名”。晏袤不仅认为杨孟文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而且在永平六年至九年的三年中，又同鄐君一道开通了褒斜道。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杨孟文于永平中开石门之说，最早源自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沔水》篇所云：

“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杨厥之所开。”杨厥这个名字就说错了，《石门颂》中有“杨君厥字孟文”之句，“厥”本为语助，郦氏误以为“厥”是杨孟文之名。杨孟文名涣，《华阳国志》有所载。至于杨孟文是否开过石门，这在《石门颂》中记载得很清楚，拙作“《石门颂》小考”（刊于一九八〇年《考古与文物》第四期）已陈述拙见。郦氏误之甚远，晏袤虽有缘亲睹《石门颂》原刻，但趋于郦氏的名望，承袭郦氏之谬说，足见晏袤其人并无真知灼见。

三、关于褒斜道在历史上的作用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末尾有“……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之句，既为晏袤所录，但在晏袤释文中却未曾涉及，其义在说明道路由益州通往京师之重要，这是不可忽略的。

桓帝建和二年《石门颂》中有“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之句，其中“斜谷之川”即指褒斜道而言。“其泽南隆”，是指这条道路向南发展，“益域为充”，“充”是充牣之充，拙作“《石门颂》小考”，原释充为衝不当。“益域”即指益州地区，说明褒斜道沟通南北，使益州为之充牣。《史记·河渠书》亦曾记述过汉武帝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事，其文中有“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之句，这又说明褒斜道是由京都入蜀的一条比较近便而平缓的道路。所以，历代朝廷整修褒斜道，不仅着眼于关中与汉中之间的交通，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入蜀的通道。

人们常说的蜀道，泛指一切入蜀之道，包括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自云南入蜀的僰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陕西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而在我国历代史书中所称的蜀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由京都长安或洛阳入蜀的道路。由于自京都入

蜀，必先到达汉中，因此，凡由京都到汉中的道路，诸如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等，皆称蜀道。褒斜道又是蜀道中的要道，向为历代朝廷所重视。汉明帝刘庄诏遣汉中太守鄐君开通褒斜道，也是基于此因的。

四、关于汉时褒斜栈道的设施。

在《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有“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这段文字，如实记述了汉时褒斜栈道上的一些基本设施，是研究我国栈道史的重要资料。晏袤释文亦未涉及于此，今予补之。

汉时褒斜道，由汉中褒谷到郿南之斜谷，全长四百七十里。鄐君所承修的仅二百五十八里，足见此非全程。这段被修的道路未详其所在，但由褒中县官寺可知其必在全道的南段。以里程推之，自褒谷上溯，经武关驿到江口、赤崖（即今红崖河）一带，计有二百数十里之遥，想必鄐君所修者即此。这段道路缘崖栈阁较多，平日增损不定，自汉武帝“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后，到明帝永平中近乎百年，又承鄐君奉命修葺，亦在情理之中。所云桥格者，即栈阁也。道路穿越险绝之处，旁山伴水，凿石架木，下撑以柱，上覆以板，是为栈阁，亦曰桥阁或板阁。如《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所述：“前赵子龙退军，烧柱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见《水经注·沔水》篇）。又《诸葛亮与兄瑾言大水赤崖阁道悉坏书》云：“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亦见《水经·沔水注》）。诸葛亮所描述的是三国期间赤崖南北栈阁被毁的情景，东汉初鄐君修道也正包括这部分栈阁在内。在计数时其相邻两横梁与立柱之间的栈阁为一间，所称六百二十三间者，即在二百五十八

里的道路中经重修的栈阁数。据《汉中府志》所载，三国时褒斜栈道上计有栈阁五千数百所。随着人类开山技能的提高，栈阁逐步为山塥路所代替，宋以后栈阁总数仅为二千八百余间。但在三国前的东汉，正是栈阁风行的盛世，其栈阁数不会少于三国的。

古人在修栈道过程中，凡遇溪涧或河流无从为栈阁时乃架设桥梁。其结构与栈阁不同，桥梁多由若干立柱，上覆横梁、木板所构成，选材宏大，跨度也比栈阁为长。所云大桥五者，详细地址已无从稽考，而这类桥的立柱砥孔，在考古调查中屡有发现。

至于“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历来释者歧见颇多，有人把“邮亭驿”作为一复合词，“置”作动词，“徒司空”作官吏名，是与原义不符的。以文义论，“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皆指兴工项目的名称，其各别涵义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北大张传玺《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一文中叙述较详，不再赘述。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识评

南宋光宗（赵惇）绍熙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南郑县令晏袤，因修堰事至褒谷，见石门南百步半崖间有《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乃录其全文并为之撰写释文，镌之于此摩崖下方，即晏袤自谓之碑阴。晏袤的录文及释文随同其它摩崖一并由山石中凿出，于一九七一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其通高二七〇厘米，宽二二〇厘米，四周有凸出的十厘米宽的边子，字的排列均匀而齐整，较之以先那种不事修饰的汉魏摩崖，可谓别开生面了。可惜此摩崖石质酥劣，据检验属云母片岩，抗蚀力很差。刻石至今，不足八百年，已大片剥落，残存的刻字几不成文，这在以汉魏为主体的石门摩崖中，似有未老先衰之状。此摩崖录文见于《金石萃编》和《褒谷古蹟辑略》。

《金石萃编》卷五中《开通褒斜道石刻》之后，冠以“宋晏袤释文及碑阴题记”之标题，现将全文照录于后：

汉鄐君修褒斜道碑字　　　南郑令晏袤释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通褒斜□，太守钜鹿鄐君、部椽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第典功作，太守丞□□杨显将陨用，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九

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

汉中郡太守鄐君修桥阁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汉明帝永平六年刻于褒余（即斜——笔者注）谷中，其纪号先巴官铁盆铭一岁。绍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以堰□□□至褒谷，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剥落，至是字画始见，□法奇劲，古意有馀，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昔高皇帝兴王汉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蘉路齿鳍，自秦取蜀之石牛道开通石门，史虽不书，灵帝建宁五年，衡官掾仇审颂太守李翕《郙阁碑》云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则石门虽基于秦而开于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镌碑石门中，纪永平四年司隶校尉杨孟文以诏书凿通石门，则又从而广之。通道几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復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顺帝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复通褒余，则此路自秦汉以来通塞屡矣。今碑刻于永平六年，载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弟典功作，大守丞广汉杨显，始作桥阁六百廿三，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纪工器钱粟之数于崖壁中，去石门不百步。惜乎崖倾碑断，字有亡阙，今所凿栈道石窍具存，乃知杨孟文治石门于四年辛酉岁，鄐君、杨君治阁道于六年癸亥岁，而王升建和二年纪石门之功，以不及此桥格事，今乃遇□壹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后，物之显晦，盖有定数。如此鄐君、杨君为民兴此阁道，三年而后成，曾不讳劳，而史逸其名。非苔蘚封护，至今必为风雨所剥，此名随滅摩滅矣！敬书碑阴，俾来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临淄晏袤。

《褒谷古蹟辑略》所载截然分两部分，其一称《汉鄐君开

通阁道碑》，其二称《鄐君碑释文》，无总题，文字与《金石萃编》略有小异。如《汉鄐君开通阁道碑》称"韩岑等典作"《金石萃编》系"韩岑第典功作"；又称"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用□"，《金石萃编》系"太守丞□□杨显将陨用"；还有以□示缺之字，二者差异较多。又如《鄐君碑释文》称"晏袤以事□至褒谷"；《金石萃编》系"晏袤以堰□□□ 褒 谷"；"字法奇劲"《金石萃编》系"□法奇劲"；"此君遐功亦磨灭矣"《金石萃编》系"此名随亦摩灭矣"。

为区分其是非。必须正本清源。但原刻残泐、脱落殊甚，经仔细验视原刻近拓，仅将隐隐可辨的残留刻字备录于后：

鄐君□□□阁道碑字」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
太守钜鹿鄐君部掾治级王弘史□茂」
杨显□陨用□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道
二百五」
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八
百馀人瓦卅六□九千八百四」（在每行末尾一字之后加符号」——笔者注）

汉中郡太守□君」桥阁」壹百五十有九字汉明帝永平六□□□□□□」中其记号□□官□□金□□□□□□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褒谷獲此刻于石门□南□□□□□□□□癸丑夏秋积雨苔藓剥落□□□」畫始见字法奇劲古意有□□□□□□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體□□」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畫简古□□□□□□□起敬不暇□高皇□□L王汉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因秦□蜀□石牛道开通石门史□□」书灵帝建宁五年□官□□□□□□□李翕□阁碑云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则石门□基于秦□□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镌碑石门中纪永平四年□□校尉□孟文以诏书□通石

门则又從□□」之通道几五十年至安帝□初元年□□□残桥梁□□复循子午凡十五□」至顺帝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复□□余则此路自秦汉以来□□」屡矣今碑刻于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太守钜□□君部掾□□王弘□荀茂张宇韩岑第典□□」太守丞广汉杨显始作桥□□□廿三大桥□□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就刻石纪工器钱粟成□□□壁中去石门不百□惜□崖□□断字□□」阙今所凿栈道石窍具存□□□孟文治石□□□□辛酉岁鄐君杨君□□」道于六年癸亥岁而王升建和二年□石□□□□□□此桥□事□乃□□」壹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后物之显□□□□□□□□□□□□为民兴此□□」三年而后成曾不讳劳而史逸其名□苔□□□□□必为□□□剥□□□」亦磨灭矣敬□碑阴俾来者有□取信□夏四月□有六日□□晏袤书」

就是这个残留的刻字录文，亦可部分校补《金石萃编》和《褒谷古蹟辑略》的一些错缺字，如《金石萃编》将“王弘”的“弘”误作“宏”；《褒谷古蹟辑略》将“韩岑第”的“第”误作“等”，“建和二年”的“二”误作“五”，“通道几五十年”的“道”字缺漏。此外，“就安稳”的“稳”字，《金石萃编》误作“隐”（原刻此字不存，不知是原刻之误，还是录文之误。）“桓帝”作“威帝”，为避宋卿宗赵桓之讳。“此名随灭磨灭矣”于文理不通，疑《金石萃编》录文有误。

晏袤称他所录“鄐君修桥阁碑一百五十有九字”，当包括“汉鄐君修褒斜道碑字”这个题在内，而原刻是无题的，剔除这九字，实为一百五十字，其中“开通”的“开”，“褒斜道”的“道”至今犹存，录文却以□示缺；原刻“□□杨显”，晏袤录文与此无误，而在后面的题记中却擅加“广汉”二字，变成“广汉杨显”。凡此，使人疑及晏袤所云的录文有诈；至少可以判断不是他亲自所录。

至于晏袤的《释文》，即《金石萃编》所云的《题记》，在文字内容上也有一些明显的失误：

1.晏袤称“鄐君修桥阁碑一百五十有九字，汉明帝永平六年刻于褒谷中。”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到永平九年四月完功。工程未了何以刻石?刻石的时间显然不会在永平六年。

2.晏袤称“昔高皇帝兴王汉中，出散入秦，道由子午，途路澁难，自秦取蜀之石牛道开通石门。”又称“石门虽基于秦而开于高帝明矣”。这段话涉及到石牛道和高帝开石门两个问题。

石牛道之名源于《水经注》，《水经注·沔水》篇：“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秦惠王伐蜀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这是确有其事的；但石牛道之说并不可靠。晋常璩《华阳国志》就曾记载：“蜀纪言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十六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以石牛始通，不然也。”看来石牛道之说，早在晋时已为常璩所批驳，郦道元《水经注》所因袭的正是被常璩所批驳的旧说，自然不足为据。况且，石牛道本系汉中勉县金堆铺经过宁强、广元，到四川剑阁的这条道路，与褒谷无涉，晏袤却把石牛道和穿过褒谷的褒斜道混为一谈了。既然石牛道与褒斜道相互有别，那么“自秦取蜀之石牛道开通石门”之说就难以成立。至于“石门虽基于秦而开于高帝”之说，只能是晏袤个人的臆说。石门这个名称，在全国为数较多，具体到褒谷中的这个石门，则是东汉永平中所穿，这在《石门颂》和《石门铭》中都有记载。本无须徵引，晏袤却画蛇添足，反而弄巧成拙。

3.晏袤谓“汉中太守王升镌碑石门中，纪永平四年司隶校

尉杨孟文以诏书凿通石门”。又云“杨孟文治石门于四年辛酉岁，鄐君、杨君治阁道于六年癸亥岁”，殊不知王升所纪从无永平四年凿通石门之意；杨孟文也不是永平四年的司隶校尉；鄐君、杨君并非同代之人，这在《石门颂》和《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拙作《石门颂新证》和《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补正》皆已陈拙见，并指出了晏袤疏于深考之误。

汉《石门颂》新证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镌刻在褒谷石门西壁的摩崖石刻。其原址在古褒斜栈道南端即今陕西省汉中市褒河公社境内的褒谷之中。一九六七年因国家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此摩崖从崖壁中凿出，于一九七一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现保存完好。通高二六一厘米、宽二〇五厘米；另有题额一段，高五十四厘米，宽三十五厘米。文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题额二行作十字，书体皆为汉隶。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素为历代名家所赏识，自北魏郦道元、宋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到清代王昶、冯云鹏等诸家，皆曾对此摩崖作过考释。通检诸家所考，诚有见地者不乏其人；而说来又十分出奇，在不少名家著录中，曲解原义，如"杨孟文开石门"之谬说，竟持续一千四百余年之久，至于其它疏漏或舛误，更累见不鲜。今试就此摩崖的内容及其文字等有关方面，重新作一番考证，以求廓清古物真面。

一、"杨孟文开石门"是一桩错案

"杨孟文开石门"之说，最早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沔水》篇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杨厥之所开"。杨厥这个名字就说错了。石刻文字中有"杨君厥字孟文"之句，郦氏误以为厥系杨君之名。至宋代的《集古录》和《金石录》，皆称《石门颂》为杨厥碑。宋洪适的《隶释》将"杨君厥字孟文"与杨淮碑中"杨君厥讳淮字伯邳"之句相对照，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并指出这是后辈颂前人之勋德，故尊其字而不称其

名。至此，厥字之误始得纠正。但杨孟文开石门之说，在其后的学者中仍予承袭，且流传甚广。南宋晏袤在《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释文》中写道："永平四年，杨孟文以诏书凿通石门"。清代冯氏二兄弟的《石索》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至于今人沿袭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无须一一列举。看来杨孟文开石门之说，自北魏延续至今，达一千四百余年。然而，这与《石门颂》石刻文字所记不符。

第一，《石门颂》中"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并未说明是谁凿通石门。二年之后，"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见《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这在早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传达政令、组织人力、筹办物资等事宜，要有一个过程，特别像开凿褒斜道这样浩大的工程，朝廷下诏后两年才行动并不奇怪。看来永平四年下诏和永平六年汉中郡受命开通褒斜道，这是一回事；而谓杨孟文在永平四年先凿通石门，《石门颂》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石门颂》中有"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这段话，是指在安帝永初元年和二年的时候，由于"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见《后汉书·安帝纪》）。在这次战争中，褒斜道遭到破坏，南北往来只好复循子午道。而子午道非常艰险，"空舆轻骑，滞碍弗前"，给往来行人造成极大的困难。正是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杨孟文才多次上书，奏请修复褒斜道，这无疑是在安帝永初二年之后了，其时石门当早已凿通。

第三，考之《后汉书·顺帝纪》，在"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这是"元二"之乱以后褒斜道首次得到修复，必为杨孟文上疏所致；且诏书内容也正合于石刻文字中"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

废子由斯（子是子午道，斯指褒斜道）”的记载。由此可知，杨孟文仅是向朝廷数上奏请，朝廷从其所请，才诏益州刺史具体承修褒斜道的。王升所赞扬的正是杨孟文数上奏请的精神。由明帝永平四年到顺帝延光四年，整整相差六十四年，虽然杨孟文生卒年月无考，但说他在永平四年开石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第四，由《石门颂》部分段落文字的训诂中，可以清楚地理出一条杨孟文奏请修复褒斜道的脉络，这是回答“杨孟文开石门”谬说的直接依据。

《石门颂》原文（以下简称原文）：“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

这一段是开头，是王升对于山河、道路的形成所作的一种幼稚而形象的解释。重要的是“斜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由此引伸到斜谷道(褒斜道最初称斜谷道)，向南发展，使益州为之充牣。

原文：“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隔尤艰。”

说汉高祖刘邦曾受命为汉王，由汉中发迹，一举而定道三秦，进而成就帝业，遂以汉为其王朝之名号。后来由于子午道难走，另开围谷道（即傥骆道），复通堂光道（即陈仓道），连同前述的斜谷道，共是四条道路，这四条道路都是很艰险的。

原文：“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

说（明帝）永平四年下诏开通褒斜道，并凿通褒斜道南端的一段穿山隧道——石门（这只是诏书内容，可是由谁去执行？何时执行？皆未详述）。

原文：“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

说复通后的褒斜道，遭“元二”之灾（安帝永初元年和二

年发生的一场民族战争），西方少数民族进犯汉中，桥梁被毁，道路也不通了，这时十分难走的子午道又成为南北之间的要道。

原文："上则悬峻，屈曲流颓，下则入冥，倾泻输渊。平阿淖泥，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临危枪碭，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恶虫㢴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残。终年不登，匮餧之患。卑者楚恶，尊者弗安。愁苦之难，焉可具言？

这一段全部是描写子午道艰险状况的。说那子午道，上面是绵延逶迤的悬崖，屈曲细流盘绕山巅；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幽谷，滔滔涧溪泻入深渊。即使在平缓的丘陵，也常常道路泥泞，阴雨缠绵。加之荆棘丛生，乱石塞道，行至险处，如履虎尾，使人心寒。空车快马，也因重重障碍而停滞不前。沿途又时常有猛兽毒蛇危及行旅安全。秋天未至，寒霜遍布，庄稼未熟，即遭夭残。终年歉收，仓廪空虚，无从度日，贫贱者苦楚难熬，尊贵者亦不得安闲。这愁苦的情况，虽千言万语怎能说完？

原文："于是明知故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

说前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孟文，鉴于子午道的艰险，遂以忠国忧民，刚直不阿的气慨，数次向朝廷上疏，请复修褒斜道，曾遭到那些不理政事又占具高位的官员的阻拦和驳斥，而杨孟文据理力争，终于博得了多数官员的赞同，这时年幼的顺帝刘宝才采纳了杨孟文的建议，乃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后面一句："得其度经"说明了褒斜道的再度重修，仰赖于杨孟文的良苦用心和不懈的努力。

原文："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蒸蒸艾宁。"

这是对复修后的褒斜道的赞美。说整修之后的褒斜道，高敞、明亮而平坦，过往行旅感到清爽宜人，行走安全方便，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原文："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汉中太守犍为武阳王升字稚纪，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

这段文字介绍了王升撰写《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这篇文章并镌之于山石的用意。

后面一段，纯系对杨孟文其人歌功颂德的文字，训诂亦从略。

由以上的训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杨孟文上疏是在"元二"之乱以后了，其时距明帝"诏书开斜，凿通石门"和鄐君承修褒斜道已有数十年之久，怎么能说是杨孟文开石门呢？况且，王升所表彰的是杨孟文疏请复修褒斜道一事，通篇以此为中心，至于"杨孟文开石门之说"这只能是他人的臆造和曲解。石刻原文中只字未见，并无此意。

二、《石门颂》这个名称也简化不当

《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是东汉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撰写的颂词。王升和杨孟文同是犍为武阳人(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杨孟文出仕比王升为早，当王升任汉中太守时杨孟文已去世。王升于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勳。"所以用"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作题额，亦即名称，其中的"故"字，表示已去世的人，"杨君"是对杨孟文的尊称。

石门汉代摩崖，繁名简化者颇多，如《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简称《鄐君碑》，又称《大开通》；《杨淮、杨弼表记摩崖》简称《杨淮表》；《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简称《李君表》等等，皆不违原义而又去繁就简，未尝不可，惟《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简化为《石门颂》，显然与原义不合。追根溯源，这与"杨孟文开石门"之说仍有密切之关系，

正如《隶序》所云："集古、金石二录与郑樵金石略，俱作杨厥开石门颂"。这大概就是《石门颂》这一名称的来源了。此外，在石门东壁又有王远《石门铭》摩崖，后之识者疏于深考，遂以为在石门东西两壁，一边是《石门铭》，一边是《石门颂》，似乎是一种巧意安排，时日久之，更无所疑。于是，这个简化不当的名称，便为世代名家所公认了。不过，名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个代号而已，既然沿袭已久，约定俗成，似无必要且无此宏力把它改正过来，笔者虽陈其弊端而只得仍随大流，继续沿用《石门颂》这个名称。

三、各版本录文错、缺字的校正及补遗

历代金石著录和今人发表的文章中所载《石门颂》录文，几乎都有错、缺字。如《金石萃编》将"㢈弘"之"弘"误作"讳"；《金石文考》将"复循"的"循"误作"修"；《三省边防备览》和《褒谷古蹟辑略》都将"川泽股躬"的"股"误作"服"；《褒谷古蹟辑略》还将"文宝"下一"主"字缺漏。一九六一年《文物》四、五期合刊陈明达《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一文中，载有《石门颂》录文一段，有错字数处，如"股"作"服"，"焉"作"安"，"复循"作"复修"，"蒸蒸"作"蒸庶"，"循礼"作"修礼"。类似情况颇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也是导致曲解《石门颂》原义的原因之一。

所幸《石门颂》摩崖迄今保存完好，这是校错补缺的可靠依据。现将《石门颂》摩崖全文照录于后：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

惟川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

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隔尤艰。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

书开斜，凿通石门。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上则悬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倾泻输渊。平阿淖泥，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临危枪碭，履尾心寒。空舆轻骑，遰碍弗前。恶虫蔽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残。终年不登，匱馁之患。卑者楚恶，尊者弗安。愁苦之难，焉可具言？于是明知故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蒸蒸艾宁。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王升字稚纪，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勳。其辞曰：

君德明明，炳焕彌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绥亿衙彊。春宣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宁静烝庶，政与乾通。辅主匡君，循礼有常。咸晓地理，知世纪纲。言必忠义，匪石厥章。恢弘大节，谠而益明。揆往卓今，谋合朝情。醳艰即安，有勋有荣。禹凿龙门，君其继踪。上顺斗极，下答坤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农夫永同。春秋纪异，今而纪功。垂流亿载，世世叹诵。

序曰：明哉仁知，豫识难易，原度天道，安危所归。勤勤竭诚，荣名休丽。

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彊字产伯，书佐西城王戎字文宝主。

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韩朖字显公，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

四、诸家考释的贡献和漏误

诸家考释中诚有见地者为数不少。宋赵明诚《金石录》释“元二”为《后汉书·邓骘传》所云的“元二之灾”，其释文曰：“余尝读《后汉书·邓骘传》有云，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章怀太子注以谓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下为小二字，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今此碑曰‘中遭元二，西夷虐残’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书注（即章怀太子李贤所注）未必然也。”宋洪适《隶释》也认为：“中遭元二，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理”，并引《论衡》所云：“元二者盖即位之元年、二年也。”又引《邓骘传》所云：“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诏骘将羽林军五校士击之……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盗贼群起，四夷侵畔……则此传所云元二者，亦谓元年、二年也”。再如宋欧阳修《集古录》释“巛”为“坤”，“余”为“斜”。《隶释》释“充”为“衝”，“盐”为“溢”，“荫”为“阴”，“遼”为“僚”，“衙”为“御”，“憘”为“喜”，“績”为“積”，“壁”即“涂”，“成”即“城”，“鬲”即“隔”，“磐”即“磐”，“惡”即“恶”，“痰”即“恢”，“醳”即“释”，“繼”即“继”，“遰导”即“滞碍”。赵一清《水经注释》释“安危所归”即“安危所系”。《金石记》释“犍”即“犍”。《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释“枪碭”犹是“枪唐”（即利器），“垓鬲”即“阂隔”。《金石萃编》释“蛭”即“跌”，“毒蝮”谓毒长也。《石索》亦释“蛭”即“跌”，并释“頋”即“倾”，“遼”即“僚”，“艾”即“乂”，“炳”即“炳”，“衙彊”即“御强”，“韩朖”即“韩朗”。《褒谷古蹟辑略》释“什”即“斗”的篆体。凡此，皆前人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诸家著録中，有一些争议，疏漏和舛误，亦分别列后，并陈述拙见。

《隶释》释“祇”为“抵”。《金石记》释“祇”为“氏”，而非“抵”。《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亦释“祇”为

"氏"，谓高帝兴于汉中，故定天下之号为汉，因曰"以汉诋焉。"拙见亦以释"氏"为宜，而非"抵"也。

《隶释》释"縱"为"缕"。原文是"君其继縱"，此"縱"当为今之"踪"字。

"𤔲狩"《隶释》释作"尧獸"，"尧"字似误。赵一清《水经注释》释"𤔲狩"即"𢿱獸"。《金石萃编》亦释"𤔲"即"㪍"，亦即"憝"，恶也。"𤔲狩"即指凶恶的猛兽。

"股躬"《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疑即"股肱"，原文是"川泽股躬"，"股躬"二字是用作形容川泽的，川如股，泽似躬；股者肢也，躬者体也。所谓"坤灵定位，川泽股躬"，言主管大地的神灵，安排山河的部位，使山川的形势如同人的身体和四肢那样。这自然是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古人对大地上的山河外貌所作的一种近乎幼稚的描述。

"常荫"，《褒谷古蹟辑略》释为"棠阴"，棠字不妥。"常荫鲜晏"，常对鲜是适宜的。

"道由子午，出散入秦"，诸家未释。子午在长安以南，刘邦受封汉王，由"杜南入蚀中"，就是走的子午道。散关在古陈仓即今宝鸡之南。一在东，一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是不能出散入秦的，出散入秦，当时只能走故道（一名陈仓道），根本不经子午道。就文义论，疑原文有误。而有今之善训诂者，将"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解释为高祖受命为汉王，由子午道来汉中，在汉中发迹，出散关，定三秦，进而定天下，遂以汉为其国号。为自圆其说，乃在原文"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之后加上一分号（；）。但就《石门颂》全文的音韵，语气推敲，这个分号显然是强加的。

"更随围谷，复通堂光"亦为诸家所未释。文中"更随围谷，复通堂光"是紧接"后以子午，途路澁难"之句的，谓子午道难走，而辟新道以代之。据《陕西南山谷口考》所云："骆

谷西二十五里为韦谷，今讹作泥谷，在周至县西南，为周至、鄠县连界处。有韦谷水，北入渭谷，南有路通佛坪”，此韦谷，即《石门颂》中之围谷。“有路通佛坪”。这条路即古时由骆谷经佛坪，交洋县灙谷的灙骆道。此道在东汉时始见于史，其时间恰好晚于子午道。一俟灙骆道修成，当时由关中到汉中，共有四条栈道，即褒斜道，最初称斜谷道，文中的“斜谷之川”是也；子午道，即文中“道由子午”是也；陈仓道，即文中“出散入秦”所经过的道路；再就是灙骆道。“凡此四道，阂隔尤艰”，说明这四条道路都不好走。《关中金石记》认为：“更随围谷，复通堂光”之说，与《郙阁颂》中“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云云相合。按：高帝所开之石门，尚难肯定是褒谷中的石门。高帝为汉王时曾由陈仓道进军北定三秦，后来也是由于子午道难走，除新开灙骆道之外，又对原有的陈仓道加以修复，文中“复通堂光”似乎是这个意思。由于堂光不详所在，还有待于进一步予以证实。

在《石门颂》中还记述了褒斜道在东汉期间的几次通塞和修治等情况，这是研究我国古代栈道史的重要资料。诸家或考或释，亦未涉及，今予补之。石刻原文有："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之句，说明在永平四年前道路已不通或遭到毁坏，而且在道路南端，七盘山所在地，因山石突兀于褒水之中，栈道经此最为险峻，来往车辆很难通过，基于此因，汉明帝刘庄乃下诏重开褒斜道，并在七盘山下开筑穿山隧道——石门。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受明帝诏遣，承办此事，到永平九年竣工。之后，到安帝永初元年和二年，因战争破坏，道路中断，如石刻文字所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顺帝延光四年，杨孟文上疏请复修褒斜道，顺帝从其所请，遂诏益州刺史承修之。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又曾对这条路进行过一次修葺，即石刻文字所云：“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城韩朗字

显公，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籍，万世之基，或解高阁，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看来，这次修葺，不是由于道路不通，而是对原有道路加以养护，使之经久耐用。

五、《石门颂》摩崖研究中的教训

《石门颂》摩崖镌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首见于史的识者当是北魏的郦道元，而郦氏生存的时代距东汉建和二年已有四百余年。前人也说他“详于北而疏于南”，其于北地也未必一一亲历。他对《石门颂》的记述，所谓“杨孟文开石门”之说，很可能是因袭旧说的。不过，古今著书立说，但凭旁徵博引，不体察实情者又何止郦氏一人呢？作为今人既无须苛求于郦氏，又不必据此而贬低郦氏之成就。实际上郦氏的《水经注》仍是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

正因为《水经注》这个权威著作定下了调子，后之学者趋于郦氏的名望，从不深究，致使谬误流传。这是在古今《石门颂》研究中的教训。

此外，大凡古代刻石，皆有一些冷僻的文字，加之传世拓本字迹不清，流行的各类版本録文又多错讹，这给研究工作本身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困难。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确有人对其采取轻率态度，不从正字、正义入手，而是囫囵吞枣，观其大略就为文立说，就中多数人专以成说为本，丝毫不作新的探索，至于“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发前人之所未发，那就更谈不上了。这是《石门颂》研究中的又一教训。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浅识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通高三十六厘米，宽二十四厘米，文六行，行十～十三字，字径约3～4厘米，隶书，原址在石门西壁“石门”二大字摩崖之南。镌之于何时，书者和刻石者姓名俱不详。原刻无题，《石索》称其为《汉永寿石门残刻》，《金石续编》称其为《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褒谷古蹟辑略》称其为《汉扶风丞李君表》。原刻于一九七一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因石质剥落，笔画残泐，几不能识，欧、赵、洪、娄诸家俱未采录。近拓仅有五十字，兹照录如后：

“右扶風丞□□武陽李君諱禹字季杰，以永寿元年中□解大臺政，由其□□□□□□懽喜，行人蒙福，君□□州從事，再举孝廉尚□□□□郡朐忍令，换汉□□□□宜禾都尉。”

《金石续编》有此录文，共七十字，详如后：

“右扶風丞犍为武陽李君諱禹字季杰，以永寿元年始解大臺政，由其　　　安平之處，万民懽喜，行人蒙福，君故授　　　益州從事，再举孝廉尚苻璽郎　　　巴郡朐忍令，换汉中成固令，迁宜禾都尉。”

《褒谷古蹟辑略》所载此刻录文共六十八字，亦详如后：

"右扶風丞楗为武陽李君諱壽字季休，以永寿元年中始解大臺長，由其修阁道燹勤，民懽喜，行人蒙福，君故益州從事，再举孝廉尚書，改授云安郡朐忍令，换漢中郡□□宜禾都尉。"

上列录文差别较大，其中必有错讹，由于原刻缺残甚多，无从一一校正，仅能以原刻现有的字为蓝本，部分勘误如后：

"李君諱禹字季杰"《褒谷古蹟辑略》作諱壽字季休"，"壽"、"休"二字皆误。《金石续编》虽与原刻相合，然"杰"字各类字书无载，恐非原字，剔其泐痕，疑即"士"字。"大臺政"的"政"字，原刻亦有残泐，但仍可辨识，《褒谷古蹟辑略》以"政"为"長"，显误。至于其它诸字，已无从核对。

考此残刻，略记李君姓名、爵里、仕迹及修阁道之事。陆增祥《金石续编》谓永寿元年者，是追记李君历官之年，而非刻石之年。李君于永寿元年始解大台政，即在此年修阁道，民受其惠。此后，李君历官巴益汉中，俟迁宜禾都尉时，人感其德，乃为之记，此即刻石之年。

考之栈道史，继明帝永平中鄐君修道之后，到顺帝延光四年（公元一二五年），诏益州刺史复通褒斜，再到永寿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几三十年，李君又承修阁道，这可能是局部修葺，史所未书。盖在汉时栈道尚无一套完善的养护办法，每遇路阻，或由朝廷下诏维修，或由地方自行发动，每次较大的工程皆勒石记其事。如《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门颂》等，李君修阁道自无例外。

文中"楗为"即益州之犍为，汉时以"楗"为"犍"，与《石门颂》、《冯绲碑》、《杨淮、杨弼表记》皆同。

"右扶风丞"《汉书·百官公卿表》释曰："右扶风治内

史，右地与左冯翊、京兆尹为三辅，皆有两丞，右扶风二千石，丞六百石。”

朐忍属巴郡，汉置朐忍县，故城在今四川省东部云阳县西（今万县市以东）。成固属汉中郡，汉置成固县，南朝宋改曰城固，故城在今陕西城固西北十八里。宜禾都尉属敦煌郡，《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五。县六：敦煌、冥安、效穀、渊泉、广至、尤勒。”其中的广至即宜禾都尉治崑崙障。崐崙障本为地名，后汉敦煌郡仍有广至县，但《后汉书·郡国志》未述及宜禾都尉治崙崐障事。石刻文字云李君既在桓帝永寿年间迁宜禾都尉，是时必有此建制，《后汉书·郡国志》可能漏记。宜禾都尉故城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地，约在敦煌东北的百里之内，其地距汉中有千里之遥，李君迁宜禾都尉，必当远行，汉郡邑人因勒石以怀其德。

《杨淮、杨弼表记摩崖》补释

《杨淮、杨弼表记摩崖》，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一七三年）黄门卞玉为文，镌于汉中褒谷石门西壁《石门颂》摩崖之南侧，通高二一六厘米，上沿宽六十七厘米，下沿宽五十厘米，文七行，行二十四至二十六字，字径五～七厘米，隶书。一九七一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近拓除个别字漫漶外，余皆清晰可见，且保存完好。全文一七三字，兹照录如后：

> "故司隶校尉杨君厥諱淮字伯邳，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雒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御史中丞，三为尚书、尚书令，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河南尹。伯邳从弟諱弼字颖伯，举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復举孝廉，尚书侍郎，迁左丞、冀州刺史、太医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廉，约身自守，俱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
>
> "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賍表记。"

此摩崖宋欧、赵未见，洪适《隶续》始录，其后释者颇多，然各执一说，亦有应释而未释或释之未详者，今一并补释如后：

一、关于题释

宋洪适谓此摩崖系黄门卞玉于灵帝熹平二年过杨淮之墓所勒，故称其为《司隶校尉杨淮碑》。《两汉金石记》称此为褒谷摩崖，不得谓之碑，并云"黄门同郡卞玉谒归过此，追述勒名者，当是过石门之地，见楊氏开通石路之刻有感而详述其门

阙，非过墓之谓也。”

按：洪适谓黄门同郡卞玉过墓之说确误，当以《两汉金石记》所见为宜。摩崖的文字内容，备述杨淮及其从弟杨弼之仕迹并称美其作为，当为表记无疑。《褒谷古蹟辑略》称其为《汉司隶校尉杨淮与从弟杨弼生平碑》，虽合于文义，但碑与摩崖有别，二者不宜混为一谈。至于《涵真阁汉碑文字跋》称其为《卞玉摩崖》，洪适《隶续》称其为《杨淮碑》者，皆非。

二、关于字释

洪适《隶续》称："碑云'厥讳淮字伯邳'，盖以厥为语助，大司隶有石门碑亦云'杨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为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这里所说的"今古"指宋欧阳修和赵明诚及北魏郦道元，他们都曾以为杨孟文名厥。自洪适据"厥讳淮字伯邳"之词辨明厥为语助之后，此字之误释方得正之，此为洪氏之贡献。

洪氏又云："凡称元妃、元子、元兄、元舅之类，皆以长言之，二杨俱曰元孙犹元士然，以元为美称也。"《金石补录》按："淮称弼为从弟，弼又字颖伯，以其祖视之，俱为诸子之长孙，非美称也。至独悼颖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称元帝以美之。"考之《华阳国志》，杨孟文名涣，官至秀颖司隶校尉，杨涣子文方曾为汉中太守，文方子颖伯曾为冀州刺史，颖伯即杨弼，是杨孟文的嫡孙。杨淮是文方兄之子，曾为政事司隶校尉。《华阳国志》载，杨淮系汉安县人，而杨孟文祖籍犍为武阳，是否文方兄携家另居或文方兄非胞兄？不得而知，因此，元孙之义亦难确知。若文方兄为其胞兄，则元孙当系美称无疑；如不是胞兄，则可能指诸子之长孙而言，即使如此，元孙作为美称也是说得通的。

《两汉金石记》谓"洪氏所录中丞下阙一字，今骄石本是'三'字。迁下是'左'字，洪讹作"注"。其表记上一字洪录作"财"，今验石本下多一点（即貯字）或是"财"字偶多

一笔耳，财即‘纔’、‘裁’通用之字，谓至是始为之表记也。”观此摩崖，近拓尚能成诵，宋时想必还清晰异常。洪适所录或因拓本低劣而致错讹，《两汉金石记》予以补正是必要的。然文尾“故账表记”之“賍”字，实系“赋”字。赋者，铺陈其事也。《隶续》和《两汉金石记》释“赋”为“财”，皆误。

三、关于文释

石门西壁原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世称《石门颂》。镌于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杨君即杨涣，字孟文，官至司隶校尉，犍为武阳人。杨孟文之孙辈杨淮、杨弼，亦曾为司隶校尉。时有一黄门卞玉，与杨氏同郡，熹平二年二月廿日，谒归过石门，见《石门颂》摩崖，念杨氏祖孙两辈同为司隶校尉，且为官清廉，颇有建树，乃撰杨淮、杨弼二人之表记，镌之于《石门颂》摩崖之侧，以怀杨氏之功德，所以文中尊杨孟文为大司隶，杨淮、杨弼为大司隶之元孙。

《华阳国志》有《杨淮传》，称其累世忠直，曾奏治汝南太守曹麻，颍州太守曹腾，济南太守孙训等子弟，依势淫纵，徵廷尉治罪……。桓帝即位，拜河南尹，迁司隶校尉。杨弼无传，而摩崖文字中备述杨淮、杨弼生平之历官，并称二君清廉，约身自守等语，以褒其功德。

杨淮、杨弼兄弟生卒未详，但由桓帝即位拜杨淮为司隶校尉推之，杨淮去世必在桓帝之后。熹平二年同郡卞玉所撰的《表记》中，有“兄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州里失覆”之句，说明在此以前杨氏兄弟已去世。

杨孟文生卒亦未详，据《石门颂》所记，自永平四年明帝下诏开通褒斜道并凿通石门之后，到安帝永初元年和二年，西方少数民族进犯汉中，桥梁断绝，道路遭到破坏，时称“元二之灾”。人们南北往来只好行经子午道，而子午道十分难走，“空舆轻骑，滞碍弗前”，给行旅造成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

况下，杨孟文“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子午道）由斯（指褒斜道）”，使被战争破坏的褒斜道得以复通。《后汉书·顺帝纪》载，顺帝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这是“元二”之乱以后褒斜道的首次复通，正是杨孟文上疏所致。据此可知杨孟文当是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孟文之孙杨淮是桓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弼既为杨淮从弟，或与淮同时，或稍晚于淮。在熹平二年前，他们都相继去世。同郡黄门卞玉，熟知杨氏家世，乃为之记。

“黄门”其义甚杂。一为官署名，《汉书·霍光传》：“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霍光）。”颜师古注：“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一为官名，指散骑之官，晋潘岳为散骑侍郎，《三国志注》引《岳别传》则云为黄门侍郎，即其证也。世因称为潘黄门。江淹《杂体》诗有“拟潘黄门岳悼亡”之句。一为宦官之通称，汉代给事内廷有黄门侍郎、小黄门、黄门令、中黄门诸官，皆以宦者充任，世因称宦者为黄门。杜甫诗：“黄门飞鞚（音控，马勒）不动尘”。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岂可见黄门而贞哉！”其云黄门者，皆此义也。卞玉其人，史所未载，东汉后期，黄门势重，特别在灵帝执政时，宦官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卞玉自称黄门者似以为荣。至于卞玉本人的作为如何，因无记载可循，不能妄加褒贬。

在卞玉为杨氏兄弟所撰的表记中，备述杨淮、杨弼历任之官职。其本义虽有谄谀之嫌，但就中可窥见东汉之吏制。前人未释，亦有必要予以补之。

“举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之一，《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见《汉书》新版二五二五页）武帝之后，举孝廉之制，历代因之。州举秀子，郡举孝廉，

以为定例。凡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仕进者必由之路。

"尚书侍郎"：少府属官尚书或尚书令之部掾，秩四百石，主行文、起草和书写等事。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古今注》曰："永元（东汉和帝刘肇年号）三年（公元九一年）七月，增尚书令史员。功满未犯禁者，以补小县，墨绶。《决录注》曰："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光武帝）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中诏遣出，竟不为郎。邯字叔春，京兆阳陵人也。有高节，正直不挠，后拜汾阴令，治有名迹，迁汉中太守。"这段故事说明，当时的孝廉辈似不屑于为郎的。但传至后世，以为定例，孝廉辈之为郎也便习以为常了。

"尚书"、"尚书令"、"左丞"：尚书为秦时少府属官，因掌章奏文书，故名尚书。汉置上书令，秩千石，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尚书令下设尚书六人，秩六百石。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见《后汉书·百官表三·少府》条）。

"上蔡、雒阳令"：上蔡，故蔡国，叔庭所封。十八世平侯徙新蔡，遂以此为上蔡邑，后属楚。《左传》："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蔡，使公子弃疾为蔡公"是也。汉为侯国，寻置县，故城在河南上蔡县西。雒阳本为秦之洛阳县，汉改雒阳

县。其位置在今河南省西部，陇海、焦枝两条铁路在此交会。古时有事中原者，多以此为枢纽。所云“上蔡、雒阳令”者，指此二县的行政长官。《汉书·百官表》有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将军长史”：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汉代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临时出征的统帅有别加称号者，如楼船将军、材官将军、度遼将军等（新版《辞海》八八四页）。《后汉书·百官一》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在将军以下置长史、司马皆一人，秩千石。所云“将军长史”者即此。

“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太守即秦之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任城在今山东省济宁县，金城在今甘肃省皋兰县西北，河东在今山西省夏县北，山阳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皆为汉时郡治所在地。杨㢸曾先后充任这四郡之太守。

“御史中丞”：《后汉书·百官三》记曰：少府置“御史中丞一人，秩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旧别监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后又属少府。”《辞海》（新版八〇五页）谓御史中丞即汉代御史大夫之佐，亦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监察郡国行政；内领侍御史，考察四方文书计簿，劾按公卿章奏。西汉末，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遂为御史台长官。东汉其间，中丞的权威颇重。蔡质《汉仪》曰：“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僚，出为二千石。”上述记

载略有小异，一曰千石，一曰二千石。摩崖文字称：杨淮"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雒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御史中丞……"此处的御史中丞系继太守之后而为之，必为二千石无疑。

"司隶校尉"：本周官，师古曰："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司隶。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汉书·百官公卿表》）。"巫蛊"指弄神鬼而蛊惑人心者。"大奸猾"似指奸诈、邪恶之徒。以此义推之，司隶校尉当是主管社会治安，察问和缉捕作恶者的官员。《后汉书·百官四》谓司隶校尉比二千石，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郊犯法者。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考《石门颂》摩崖石刻，司隶校尉杨孟文："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绥亿衙彊。春宣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此虽属颂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司隶校尉的职能。《汉书·百官表》："凡八校尉……秩皆二千石"。其品级与郡太守相当，但所辖范围是不同的。

"将作大将"：始为秦官，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将，二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丞一人，六百石。下设左校令、右校令各一人，皆六百石，分掌左、右工徒。（见《后汉书·百官四》）东汉因之。

"河南尹"：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见《后汉书·百官四》）。尹者，本为官名，商、西周时为辅弼之官。春秋时楚国长官多称尹。汉代始以都城的行政长官称尹，有京兆尹、河南尹。所云"河南尹"者即此义也。

“冀州刺史”：冀州为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辽河以西之地，谓之冀州。自西汉武帝时，又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以六条（一、豪强估势，二、侵渔百姓；三、刑赏猥滥；四、阿私蔽贤；五、子弟请托；六、飢法纳赇）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品级低于郡守。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时又改归旧制，后复称州牧。东汉初仍称刺史，灵帝时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军政大权。所云“冀州刺史”，约在东汉桓帝到灵帝期间，正逢刺史权重之时。东汉初冀州刺史治鄗，故城在今河北柏乡县北。汉末治邺，故城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南。

“太医令”：秦时主医药之官，西汉太常、少府皆有之。属太常者为百官治病，属少府者为宫廷治病。有经验良方颁行各郡国。（见新版《辞海》六四一页“太医令”条）东汉少府中设有太医令一人，秩六百石，掌诸医，下设药丞、方丞各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见《后汉书·百官三》）世俗又例称皇室之医为太医，亦曰御医。

“下邳相”：东汉分全国为十二州（京兆尹除外），九十八郡、国。凡郡有太守，秩二千石；国有相，属王国相者，其秩与郡守同，侯国相者，其秩与县令（或长）同。下邳，初为县名，秦置。汉武帝置为临淮郡。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七二年）改临淮郡置国，治下邳，从此遂有下邳国之称。其辖境北至江苏新沂、邳县，南至盱眙和安徽嘉山，东至江苏涟水、淮安和清江市。《后汉书·郡国三》记载，东海郡有下邳国，位于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万一千八十三。《后汉书·百官五》记曰：“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所云“下邳相”者，与郡守相当。

杨淮、杨弼兄弟皆由举孝廉，入尚书台而致仕，这反映了

东汉后期读书人登入仕途的一般模式。卞玉勒石称："元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三事者指三公而言。历代三公有不同的解释：周代三公有二说，一说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一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称三公，又称三司。为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卞玉所指者即此。看来卞玉对杨弼未登三公之位颇有惋惜之情。可惜杨弼之政绩无载，不似杨淮尚有奏治汝南、颍川、济南三太守纵子横行之事。历史上常有官高爵显而碌碌无为者，杨弼其人不知是否属于此类？杨弼，青史无名，卞玉对他的称颂，是否基于同里之私，亦未可知。愚以为但凭致仕有方以致官运亨通而实则无所建树者，似不应随意褒扬的。

“石虎”、钓台、郑子真

褒谷古石门隧道之东，有一山峰曰“石虎峰”，隔褒河与石门相望，俗云“石门对石虎”者即此。石虎峰远看如下山猛虎，作弓腰欲扑之状。古老相传西汉隐士郑子真隐居于褒谷常见此峰，乃大书“石虎”二字以喻之。此二字镌之于石虎峰下的山崖间，字径三十厘米，隶书，落款署名“郑子真”。《陕西金石志》、《褒谷古迹辑略》皆录此二字于汉刻之列，并为之记。

据朱剑心《金石学·说石》篇所记，见于诸家著录的两汉刻石，或存，或亡，或残泐，约计三百余品。其中一百四十品不注年代者，大抵皆源于一定的传闻轶事，“石虎”摩崖之列为汉刻者，亦当属此例。

在“石虎”摩崖之后，虽有郑子真的署名，但细察“郑子真”三小字，较之“石虎”二大字，笔法和书意不尽一致；况汉刻多不署名，郑氏既隐于褒谷，似无须开此先例，疑此三小字为后人所加。后人何以有此一举呢？自然是出于对郑氏的仰慕而为之。这就有必要探讨一下郑氏其人及其风尚。

郑子真名樸，子真为其字，褒中县人，祖居褒谷箕山，迄今在褒谷犹有“汉隐士郑子真先生故里”石刻一通，可为佐证。相传郑子真躬耕于褒谷之中，修身自保，名动京师，成帝和平年间，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而不就，终志于家乡。《三辅决录》、《褒中县志》皆曾记其事。

郑子真常于暇日垂钓于褒水之上。在褒谷口西岸十二连峰下，有一断崖，背山面水，高数尺，上部平展，宛如一天然平

台，相传即为郑子真当年垂钓处。

史志和传说一向对郑子真称颂不已，明人崔应科有诗云：“游观褒谷寻贤豪，郑子当年在此韬，王凤权奸难币聘，江龙濑石比醇醪，功名富贵弗庸数，道德清贞谁可挠？试想古今穷达客，将台岂似钓台高？”诗中“江龙濑石”语出《后汉书·严光传》，谓严光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帝位，严光乃隐而不见，帝思其贤，寻之。后齐国上书，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严光号），不可相助为理耶！”后引入论道故旧，与帝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帝命其为谏议大夫，不屈，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在此借以褒扬隐士之高风。

明人崔应科在诗中对郑子真与严光同有崇敬之情，一经考究，始知此二人之隐并不完全相同。后汉赵岐《三辅决录》记曰：“郑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杨雄盛称其德……名振京师。冯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绝。”张澍按：“《云阳宫记》：郑子真名樸，隐于谷口，高节不屈，耕于崖石之下，名振京师。”不难看出，郑子真隐于褒谷，早已抛却仕途之念，他既有高名而又固却王凤之聘，绝于仕途。王凤之妹王政君，为元帝之后，王凤凭藉这个得力的裙带关系，专断朝政，内外官吏皆出其门下。在一般势利者眼中，王凤其人实属高不可攀又求之不得的显赫人物，而郑子真却鄙其为人，不与苟合。他安于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所以“世服其清高”，并称颂他“高节不屈”。远在关中的冯翊人尚且为之立祠，何况郑氏之故里又怎不对他世代传颂呢？郑子真当年垂钓之处，后称为“隐士钓台”，被誉为褒谷二十四景之一。传为郑子真所书的“石虎”二字摩崖，亦为世代游客视如珍宝。

一个“隐士钓台”，一个“严陵濑”，都是隐士垂钓之

处。前者是郑子真隐逸生活中的寻乐之所，郑子真在耕读之余，寄情于钓，以钓为乐，别无所求；后者是严光的故作之态，严光着羊裘，钓泽中，意在引人注目。他深知光武帝即位后，念及旧交必欲追寻他，他的装束在一般垂钓者中是反常的，所以为人所注意。使者奉命聘之，他不象郑子真那样断然拒绝，却也不即刻应聘，而是三反而后至。待车驾幸其馆又卧床不起，致使光武帝抚其腹推诚以告。如此推而再三，最终还是随光武帝而去并与之论道故旧，入夜又与光武帝共偃卧，还以足加帝腹。作为光武帝，贵不忘旧极已哉。严光之垂钓，不过是内狂外敛的一种做作而已，论清高，论气节，比之郑子真皆有逊色。这也是郑子真之为高隐的可贵所在。

郑子真绝于仕途高节不屈的精神诚为可贵，而但求洁身自保，则未必宜也。号称唐代诗仙的李白就有这种看法。他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曾云："谷口郑子真，躬耕在崖石。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云卧所从适，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李白批评郑子真独善其身无济于国家。他认为有志之士应以治国为己任，一旦国家治理好了，即刻勇退，毫不留连，所以他以"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之句抒怀，并以此与韦子春共勉。李白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作为隐士这类人物的是非标准问题。

所谓隐士，通常指退居乡野而绝于仕途之人。《论语》："隐居以求其志"，《周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荀子·正论》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如《晋书·王嘉传》："隐于东阳谷，凿岩穴居"，历来以隐者为贤，几无例外，所以《后汉书·岑彭传》有"招聘隐逸，与参政事"的记载，其实类似招聘之举，史不绝书，又何止于此呢？自古至今，究竟有几多隐士，实难计数，但以其行径，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类，绝于仕途，终志于乡野，如郑子真者流；

第二类，以隐博名，如严光者流；

第三类，隐以待时，如姜尚（又名吕尚）者流；

第四类，隐以绝世，如汉初的秦朝遗老“商山四皓”者流；

第五类，功成身退，如范蠡、张良者流，

在上述五类中，李白是赞成第五类的，他也曾拟以功成身退为归宿，但是他的夙愿未了，只得含恨九泉。他有卓越的才能，又有远大的抱负，他面对唐玄宗老年昏瞶所酿成的奸佞当道、政治腐败的现实，胸中的郁闷、烦恼、愤怒，无可抑制，只好借酒和吟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他那种傲岸不群的性格，就连赫赫大唐天子也不放在眼内，更何况那些朱门肉食的无能鼠辈？李白的言行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为统治者所不取，人民欢迎他，统治阶级却对他恨之入骨。这就是李白一生不曾得遇的原由所在，不过，他尽管宿愿未果，而他主张功成身退的一番见解还是感人肺腑的。他对郑子真的批评也是中肯的。

李白所倡导的功成身退，首先是功成，其次才是敛迹五湖的隐退。李白一生没有正式做过官，也没有做出一番兴国利民的事业来，所以功成这一条，他是未曾做到的。功既未成，也就无退可言了。他自己遗憾终身，同时也不赞成郑子真那样寂然隐去。他把功成身退作为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标准，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据载，尧、舜两代帝王是择贤禅位的，汉献帝为大势所趋，让位于曹魏，司马炎又采用曹氏的手段，迫使陈留王禅让于西晋。除此而外，历代帝王都是清一色的家天下。随着家天下而流行的世袭制，也是代代如此。自古将相公侯多不胜举，而功业卓著、名垂青史者能有几多？至于功成之后乐于隐退者实在屈指可数。春秋时与越王勾践为谋，使其雪会稽之耻重振霸业的范蠡；汉初，辅佐汉高帝刘邦成就帝业的张良，皆以其功成身退之高风而被世

代传颂。在今陕西省留坝县紫柏山的留侯祠，传为张良辟穀之处。徵之于史，张良确曾有过辟穀之念，但刘邦死后在吕后的劝慰下此念未遂(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所谓张良辟穀于紫柏山，本无其事，而远近游客却纷至沓来，竞相题刻留名，寄以思慕凭吊之情。其如“报韩志决能潜迹，佐汉功成善退身”之句，最能概括张良精神，也如实反映了人民对这位千古人物的公允评价。游人千千万万，岂有不知张良晚年的行迹的？而古今名流并不苛求于史实，而重在张良精神。这是位于紫柏山的留侯祠深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李白的见解，也正是张良精神的再现。

以张良精神为镜子，郑子真之所为自然相形见绌了。但从后世人们对隐士钓台的缅怀之情，说明像郑子真这类隐逸者的高尚情操，仍然受到人民的同情和爱戴；至于李白的抱负和张良不留连于功名，勇于隐退的精神，更是深得人们景仰的。

“玉盆”摩崖及其题刻浅识

在石门南三里许，河中有一巨石，色白似玉，中凹似盆，河水至此，异常澄静，清澈见底，相传汉时有人见此，遂书“玉盆”二字以喻之。此二字被镌之于河中巨石之上，隶书，字径三十～三五厘米，平日露于水面，遇雨则为洪浪所淹，年代久远，字迹刻痕受流水冲蚀，仅隐隐可见。其苍劲古横，堪称汉刻中之佳品。可惜原石磨损殊甚，南宋时游人恐其真迹为流水泯灭，乃于原石上部另镌小隶书“玉盆”二字，字径一八～二三厘米。原刻为横列，新刻为竖列，盖因地制宜之故。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实五斗。”《汉中府志》亦云：“褒水东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洁如玉。”《褒谷古蹟辑略》又称：“石虎峰南溪中有大石，白凹如盆，汉人书‘玉盆’二字于上。”汉中古老相传有“褒谷二十四景”之说，所谓“浮浪玉盆”者即此。

据清人罗秀书所识：“玉盆（指横列）二字笔力殊是东汉体，惜无名姓，然旁有石孔四，昔覆亭于上，必非常人也。余始至褒闻老生云玉盆旧有留侯书，今无矣。”（见《褒谷古蹟辑略》）罗氏所云“石孔四”者，系覆亭立柱之迹，“玉盆”二字曾覆亭其上于此可徵。至于传云“玉盆旧有留侯书”，尚待考证。史载，汉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张良辞归韩，刘邦送良至褒中，良献策烧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以防诸侯盗兵袭之，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命张良在归途中尽烧所过栈道。张良所烧的栈道即由汉中褒谷到郿县斜谷的褒斜道，张良

在烧栈道过程中，必然经过“玉盆”所在地，传说玉盆旧有留侯书，也是说之有因的。但张良忙于烧栈道，未必有兴致游览褒谷山水；最重要的是所云留侯书，不知书迹何在？如其书即指“玉盆”二字而言，则历代论书者皆不以为然。根据书体的时代风貌，通常论书者皆认为“玉盆”原刻似为东汉人手迹，因此，谓“玉盆”二字为留侯书迹，似难肯定。

因玉盆素为褒谷之胜，故为游人所注目，凡游褒谷者必玩玉盆。《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所载《玉盆题名》十二段，多为宋代游人观赏玉盆所题。兹依时代顺序

备録于后：

1.“崇宁□元□（北宋徽宋赵佶崇宁元年，公元一一〇二年），二十有□，□台张元翊，法□袁武震，岐下□师敏同游。穷谿壑之胜，刻玉盆之阳”。

2.“河南李□彦粹游石门，登玉盆。预行者定武□□子实，开封王师彦希贤、徐师民叔瞻、秦亭李师古□从，冯翊傅汝砺彦正、洛阳□中直子正，建炎巳酉岁（南宋高宋建炎三年，公元一一二九年）清明前一日行记。男松年侍。”

3.“晏德广、段□□…师命祷雨、升潭…而去□。□(淳)熙甲辰（南宋孝宋淳熙十一年，公元一一八四年）……

4.“石邵，段雄飞、晏袤寿旹（前时）以祷雨舟檥舟玉盆侧，岁月而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复来同登，汛舟纵观，方羊久之。”

按：本段题名中所称石邵、段雄飞二人无考，晏袤系绍熙前后的南郑县令，曾数至褒谷，累有题刻见于褒谷崖壁中。所云“乙巳”者，当在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公元一一八五年），其时恰在绍熙前四年。题名中又云“方羊”者，据王昶所释，此二字见于《左传》，他书多作“彷徉”。《史记·吴王鼻传》又作“仿佯”。《淮南子·原道训》又作“方洋”，皆即逍遥徙倚之意，字异义同。

5.“闾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楙庆元二年（公元一一九六年）一月壬申因视堰来。”

6.“郭嗣卿、陈季时、程清叔元戊……”

按：经查中国历史年代表，南宋宁宋庆元自乙卯到庚申共六年，其间有戊午，即庆元四年（公元一一九八年），据此可知上文中“戊”后所缺者为“午”字。

7.“开禧二年（公元一二〇六年），人日（即正月初七），牟节甫、刘叔静来”。

8.“畠然安丙子文，抱孙、明孙与李□贵同来，嘉定己巳（嘉定二年，公元一二〇九年）闰月清明日。”

9.“李□熊来，嘉定瑞午。”

10.“邑令何武仲拉、资中黄元英、广汉沈德明、普慈周伯光、黄养源来同二子禄孙和孙侍行。嘉定辛未（嘉定四年，公元一二一一年）中秋后十日。

11.“曹济之，庞公巽、曹璋、李禀绍定己丑（公元一二二九年）清明日识。”等等。

12.“石盆应有意，要洗贪者廉。前郡□李一鳌。”

这些题名率多缺泐，其游者姓名可见者得三十九人，惟安丙一人史有传。安丙字子文，号畠然，著有《畠然集》，广安人，淳熙间进士。开禧二年（公元一二〇六年），边事方兴，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丙为随军转运司，居河池（一名仇池），十一月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县西河入成州。十二月金人持诏至，曦受诏称蜀王。三年（开禧）正月，曦僭号建官称臣于金，以丙为中大夫丞相史，权行郎省事。丙阳与而阴图之，遂谋诛曦。三月，函曦首附驿，朝廷上下动色交庆，加丙端明学士中大夫知兴州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此题嘉定己巳，吴曦伏诛，安丙知兴州之时也。三年有误。

上述题名，虽大多比较平淡，唯李一鳌题名含义清新，其文曰：“石盆应有意，要洗贪者廉”。他赋予玉盆的新义是要

洗去贪者之污，而就廉者之洁。此固非玉盆之原义，然古人常喻教于物借物言志，给人以启迪，此番用心亦堪为后世所赞赏。李一鳌系南郑人，明万历时进士。

“衮雪”摩崖与“魏武精神”

隶书“衮雪”二大字摩崖，原在汉中褒谷古石门隧道以南的激流中，褒水经此，上下落差较大，水流急湍，加之受乱石遏阻，喷沫飞溅如滚雪之状。相传曹操见此胜迹，乃书“衮雪”二字以喻之。《陕西金石志》与《褒谷古蹟辑略》皆曾记此。后人慕曹操之名，遂于“衮雪”二大字下侧，镌刻小隶书“魏王”二字并覆亭其上。世代更迭，亭不知毁于何时，“衮雪”二字刻石，虽因锤拓日久，略有泐痕，但却幸存至今。此刻石已于一九七一年前迁至汉中市博物馆，其通高六十七厘米，宽一四八厘米，“衮雪”二大字系横列，字径三五～四六厘米。“衮”字原义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在此当与“滚”通。杜甫诗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之句，诗中的“衮”亦与滚通用。魏王之称出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夏五月（建安二十一年），天子进公爵魏王”的记载。后人追书此王号，以示崇敬。

据《褒谷古蹟辑略》所载，在褒谷中“衮雪刻石有三处，二刻石崖间，宋白巨济与国朝（指清代）张令书，惟浪中石尖所刻似魏王手笔。”细加审视，宋白巨济与张令所书“衮雪”二字，皆系仿魏武之笔。张令姑且不论，白巨济系南宋宝庆时人，有《宝庆题名》可证。由是推之，浪中石尖所镌“衮雪”二字，至晚也在宋以前即已存在，传说系曹操手笔亦不无道理。考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在建安二十年

七月征张鲁至汉中，当年十二月离去。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闻知夏侯渊被斩，阳平有失，又一次率军至汉中，因攻不能克，相持两月，于五月退还长安。曹操先后两次来汉中，有机会登临褒谷故地，涉足于褒谷山水，见幽谷中石多浪激，因书“衮雪”二字以抒怀。且褒谷中已有“石门”、“玉盆”、“石虎”等题刻，皆属写景之妙笔，曹操素有“登高必赋”之雅兴，触景生情，遂踵古人之迹，题衮雪二字于河中巨石之上，亦在情理之中。又据清人罗秀书所云：“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之好动也，今观其书，如见其人矣”罗氏把“衮雪”二字的书姿同曹操的性格联系起来，可谓别有见地。《褒谷古蹟辑略》记有前人咏“衮雪”诗一首：“滚滚飞涛雪作窝，势如天上泻银河；浪花并作笔花舞，魏武精神万顷波。”这首诗进一步把“衮雪”二字的风韵和曹操好动的神态加以传神般地描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数，而任侠放荡。”其后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于嵩（曹操的父亲）。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这是曹操幼年的一桩趣事，由此可见曹操性之好动原是说之有据的。细观“衮雪”二字，其笔近篆而体近真，当为隶之风范，但行笔纵放不羁，确有波涛澎湃之势，方信罗氏所云似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一个人的书姿与性格毕竟难以等同，大凡书者皆有其书之功力，而久习不辍才会有风韵。由记载中得知，曹操是善草书的。《三国志注》引《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崔瑗著有《赋碑箴草书势》凡七十五篇，张芝时称草圣，皆汉末

名流，曹操的草书能与之相提并论，自然也有一定的造诣。然“衮雪”二字之为隶不为草，似又表明曹操对于隶也是颇为擅长的。可惜曹操遗墨几无所存，“衮雪”摩崖传为曹操手笔之遗刻，也近乎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对于探索曹操的书法艺术是极为难得的了。不过，曹操并非以善书而得名，陈寿称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无论用兵、治政，乃至安邦、定国，皆有其独到之作为。更难得的是他勤奋好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且才华出众，于诗、于文、于书、于音律无所不通。人们观“衮雪”摩崖，赞“魏武精神”，绝非赞之无因。而且这里的“魏武精神”，也绝不限于曹操在书法上的成就。

据南宋《宝庆题名》所记：“衮雪旧有亭，须复规度。”可见建亭必在南宋宝庆以前了。又据罗秀书所云：“衮雪二字本魏武手书，后人追书王号，以亭覆之。”追述王号，又为之建亭，说明“衮雪”摩崖与“魏武精神”是深受人民喜爱的。即使在南宋以后，随着《三国演义》的问世，曹操遭到贬抑，但凡游褒谷者还必凭吊“衮雪”摩崖，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曹操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磨灭不了的。

“石门”摩崖刻字年代考辨

“石门”二大字摩崖，原址在石门北口西壁，一九七一年前从山石中凿出迁至汉中市博物馆，其通高八十二厘米，宽五十厘米，字径三十五厘米，二字竖列，间距十六厘米。字迹笔划十分清晰，为整个石门摩崖中保存之最完好者。

古褒斜栈道南出褒谷，为七盘山所阻（其山又称鸡头关），行旅苦于攀援者久之。东汉永平中汉明帝刘庄下诏凿通石门，即意欲在七盘山下开凿穿山隧道。汉中郡太守鄐君奉诏承办此事，自永平六年（公元六三年）兴工，至永平九年完成。隧道呈南北向，其走向与褒谷谷道平行，底部高度与栈道在同一水平线上，其东西两壁的长度不一，总长约在十五米以上；高、宽也不尽一致，大约在四米左右。这段隧道就叫做石门。其时尚无隧道之名，乃以石门喻之。《水经注》：“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蜀都赋》：“阻以石门”，斯之谓也。

《陕西金石志》称“石门”二字各方二尺，隶书，浑朴沉雄，无书者姓名，相传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时也。这个记述很不确当，关于“石门”二字的刻石年代，自有考辨之必要。

“石门”二字刻石本身未注年代，《陕西金石志》云：“相传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时也”。此说源于《石门颂》中“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之句，殊不知

永平四年仅是下诏之时，汉中郡太守鄐君奉诏行动乃在永平六年，到永平九年竣工之后，时人勒石记其事，此刻石镌于石门南半里许的山崖间，金石家称其为《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看来永平四年镌“石门”二字绝不可能。况《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虽为隶而篆意犹存，论书者皆称其有秦隶之特色，向以古恒而称著于世。“石门”二大字隶法较晚，两者绝非同代书迹，这也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

今谛审原石，感到“石门”二大字摩崖与《石门颂》中“凿通石门”之句中的“石门”二小字颇为相似，特别是门字左右两笔八向分开几同出一辙，石字的结体亦十分相近，两者的气势皆纵放不拘，挺劲多姿。据此，初疑“石门”二大字似出自《石门颂》的书者之手；然细相对照，又觉得两者之间亦有区别。如门字左右两笔的上部，大字较小字略为出头。石字的横笔——大字落笔圆浑，小字有挑法，其它笔划的起落，似有圆方之别。凡此，可证两者非一人之手笔。

又由情理推之，在石门隧道内壁，共有摩崖石刻三十余种，以其注明年代者，《石门颂》当为最早。且在《石门颂》中首次记载了明帝“诏书开斜，凿通石门”之事，后之言石门者盖源于此。加之，《石门颂》作为汉隶真迹，为后之书者所师法亦不鲜见。由于这些原因，在《石门颂》摩崖镌石之后，有人感念于石门隧道之胜迹，又受《石门颂》文字和书法之启示，遂踵其迹并仿其笔意而镌“石门”二大字。所以“石门”二大字与《石门颂》中“石门”二小字，形似意近，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谓大同小异。大同者在于摹仿之成功，小异者盖出于不同人之手迹。

“石门”二小字镌于桓帝建和二年，大字“石门”摩崖必在此之后。而历代论书者皆谓此二字为汉人所书的隶书，而非后人所临摹的。至于书者何人，尚无从稽考，不敢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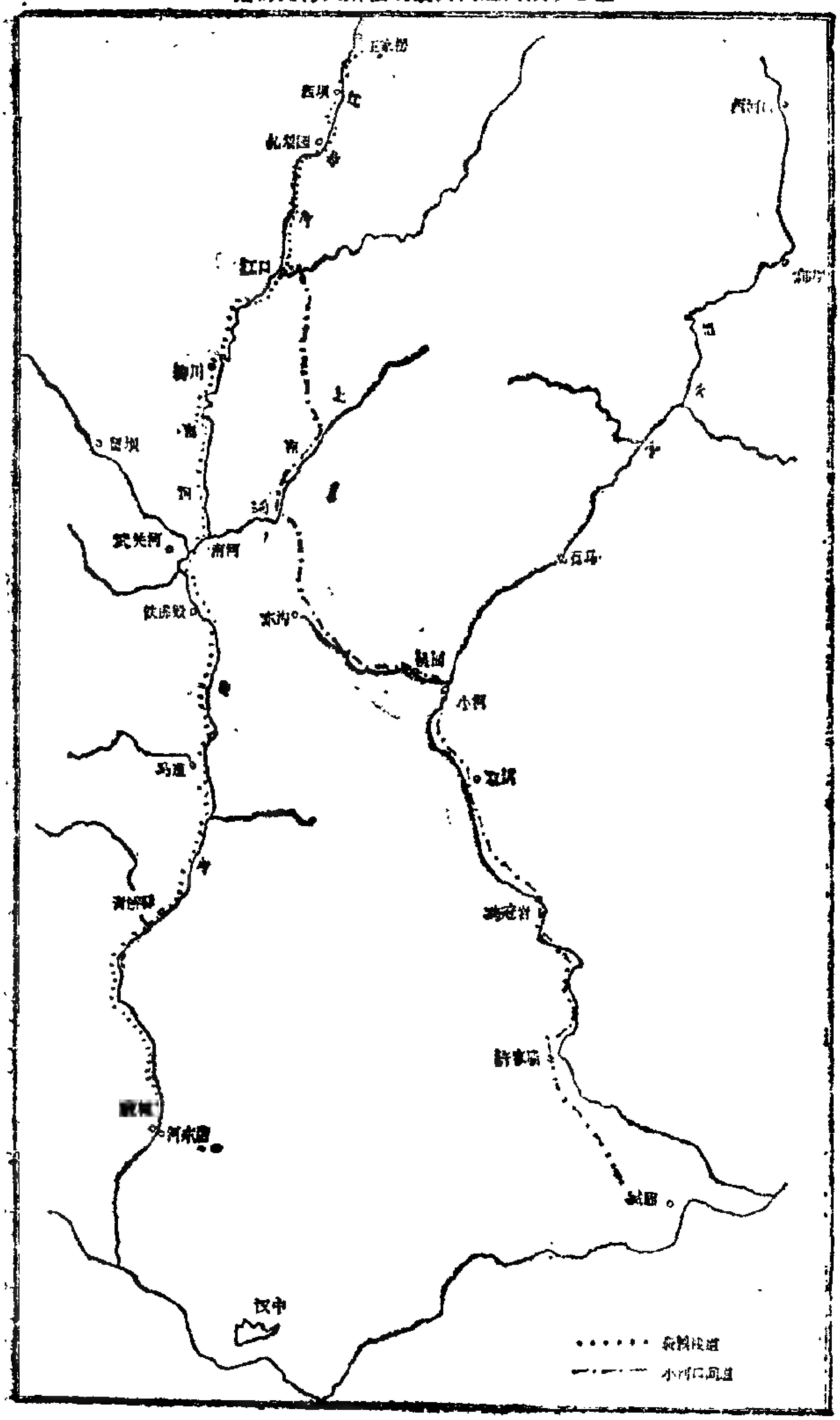
魏《李苞通阁道题名》与三国时的褒斜栈道

《李苞通阁道题名》述及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荡寇将军浮亭侯李苞修褒斜道事。摩崖原在石门以南的峭壁中，不知何时由于山石崩塌而断裂，其残刻于清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为罗秀书所发现，仅有遗文二行，可见者十六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隶书，字径二～三厘米，字迹漫漶，笔势松散，似随意而作，不事雕饰。一九七一年前，已将此摩崖由山石中凿出，迁至汉中市博物馆。被凿出的摩崖，通高三十六厘米，宽二十四厘米。

在石门南侧山崖间另有一《李苞通阁道题名》刻石，共三十八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谯国李苞字孝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在此摩崖右侧，另有《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记晋泰始六年修栈道事。这两段不同时代的摩崖，却出于同一人之手笔，皆为楷书，字径四厘米左右，笔力遒劲，是楷书中之佳品。据清人罗秀书所识，这两段楷书摩崖似为隋唐人之手迹，盖魏晋原刻在隋唐时已残泐，时人恐其泯灭，乃重刻之。隋唐之际，楷书盛行，罗氏工书，其说当有据依。

南宋庆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南郑县令晏袤，于石门南见到这两段楷书摩崖，竟误以为是魏晋原刻，备录全文并

诸葛亮行兵所出的褒斜栈道南段示意图



撰写释文，镌之于这两段摩崖之左侧。晏袤之录文较前清晰，堪补现存的原刻之缺字，此为晏袤之贡献。但晏袤将这两种不同时期的摩崖混为一谈；释文又多舛误，后人疏于深考，常以晏说为据，以致以讹传讹。若非清人罗秀书辨明真相，这种因误识而形成的混乱，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对晏袤释文之舛误，将详述于另纸。要恰当估量李苞通阁道的规模及其作用，必然要追溯到三国期间栈道通塞的一段历史，此为晏袤所未述及，今据史料略陈于后。

张鲁断道的创伤

早在东汉末，张鲁驻汉中，断谷道，以利割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云："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杀害汉使"。《华阳国志·汉中志》亦云："初平（汉献帝年号）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其所断的谷道即为褒斜道。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由故道出攻阳平，是时褒斜不通，于此可徵。至建安二十四年，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指魏王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①。"遮要"二字，胡三省注曰："斜谷道险，操恐为备所邀截，先以军遮要害之处，乃进临汉中。或云遮要，地名②。皆非也。《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记曰："昔武皇帝征南郑，'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盖栈道本缘崖凿石架木而成，"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③若阁梁或破损或无存，必然石穴外露，恰如曹操所见。所云遮要者，是对险绝处的临时遮护之意。既是临时遮护，张鲁"断绝谷阁"的创伤是不会康复的。

见之于记载的三国时期的褒斜栈道

建兴六年（公元二二八年），诸葛亮扬声取郿，遣赵云、邓芝为疑兵，据箕谷，自率大军攻祁山。后因街亭之役失利，战局逆转，诸葛亮拔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千余家还于汉中④。赵云、邓芝以烧赤崖以北之栈道而拒敌⑤。诸葛亮这次攻祁山，距张鲁断谷道已为时九年，在此期间栈道是否有所修复，不得而知。但在赵云烧栈道之后，诸葛亮确曾有过修栈道之举。在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中，有“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之句，当为明证。在诸葛亮《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中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可见赤崖南北两面的栈道都被毁坏。赤崖今名红崖，在留坝县柘梨园公社以北十五里处。笔者曾履其地，见山石皆红，方知所称赤崖者，实因其红色而得名，就连缘崖而流的一条河也叫红崖河。赵云、邓芝既由箕谷退军方得到赤崖，说明箕谷还在赤崖以北。由箕谷而北必向郿县，否则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何疑之有？魏明帝“遣曹真督军军郿”⑥以拒之，亦无从得解。历来注者但称箕谷在褒城西北；或陈仓之南，汉中之北；或在郿邬等⑦，皆误。再由实际勘查中得知，自赤崖向北，至红崖河上源之衙岭山（今名五里坡）百余里中，沿途尚有栈道遗迹多处，迄今石窾仍存；自赤崖而南约行四十余里即到达江口镇，沿途也有栈道遗迹。诸葛亮在修赤崖以北之栈道的同时，也必曾将赤崖南这段栈道予以修治。

建兴七年（公元二二九年）冬，诸葛亮“徙府营于南山原上，筑汉、乐二城。”⑧今考其地，“南山”二字出自陈寿之笔，陈寿奉西晋朝廷之命编纂志书，身在洛阳，依随时俗，所云南山，必指秦岭，对汉中而言，“南山”实为北山。南山原

上，即指靠近汉中北山南坡之地。汉城在沔阳，当故道之南口，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即由此入汉中，实为汉中西边的门户。乐城在城固，志云在今城固之西十八里，以地望观之，当在今城固之西沙河营所在地，此处地势较高，且城址犹存，又与北山南麓之丘陵地带相距较近，似合于“北山原上”之说。由此入北山，经小河口有小径可通江口，再由江口溯红崖河而上，沿褒斜道北段出斜谷。此道素通，诸葛亮之治乐城，便于阨守其口，又便于由此出兵向魏。诸葛亮修治赤崖南北的栈道，正是他日后出斜谷攻魏的必由之道。此道在蜀、魏交兵中亦曾屡见于史：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四年（公元二三〇年）“秋七月……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三国志·魏书·曹真传》：“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斜谷阻险，难以进退……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

上述记载称曹真入蜀，或由斜谷，或由子午，说法不一，但魏军数道并入，似无可疑。至于《曹真传》称“诸军…………或从武威入”者，其武威之地疑误。胡三省注曰：“武威”恐当作“武都”，否则“建威”也⑨，亦非。今度其势，魏发兵于长安，不可能一军迂廻至武都或建威。就蜀国之防御而言，“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是肯定无误的。

赤阪在何处？胡三省注曰："赤阪在今洋州东二十里龙亭山，阪色正赤。"⑩清光绪二十四年编修的《洋县志·古蹟志》记曰："赤阪，县东三十里，司马懿寇蜀，武侯出次赤阪禦之即此。在龙亭山。"此二说仅里数略有小异，方位、地名则是一致的。今洋县在龙亭山设置龙亭公社，其地古时是子午和谠骆二道的交会处，又南濒汉江，为水陆交通之要口。当时魏军数道并入，诸葛亮拒之于赤阪，可遏制由西城（安康）和子午而进之敌。至于待之于城固，既可扼斜谷之守，又可作为东方之屏障，不失为兵家万全之计。就魏军之入斜谷，诸葛亮不设防于褒谷而待之于城固而论，其时褒谷受阻，城固为必经之道，似于此可徵。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云："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此虽未详所自，但其出必由城固。当初，诸葛亮之治乐城，目的就在此一举。诸葛亮死后，蜀国一旦有事仍据守乐城。延熙七年（公元二四四年），魏大将军曹爽率十余万众伐蜀，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议者或谓但可固守汉、乐二城，惟王平、刘敏力主据兴势。⑪由议者所言，犹可见汉、乐二城之战略地位。蜀景曜二年（公元二五九年），姜维议令诸围皆敛兵，退就汉、乐二城，随即令监军王含守乐城。⑫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钟会、邓艾奉诏伐蜀，"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⑬。"钟会平蜀后欲谋叛，司马昭即"遣中护军贾充将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⑭"凡此，皆可作为由斜谷入汉中或由汉中出斜谷必取道城固之佐证。

三国时期褒斜栈道的路线

《汉南续修府志》卷之一，《栈道图考》称："诸葛武侯

行兵所由斜谷……即小河口趋斜峪路。”小河口在城固之北，斜峪在郿县之南，所云“小河口趋斜峪路”正指此道而言。该书并述及由城固出斜谷沿途的地名和里程，兹予照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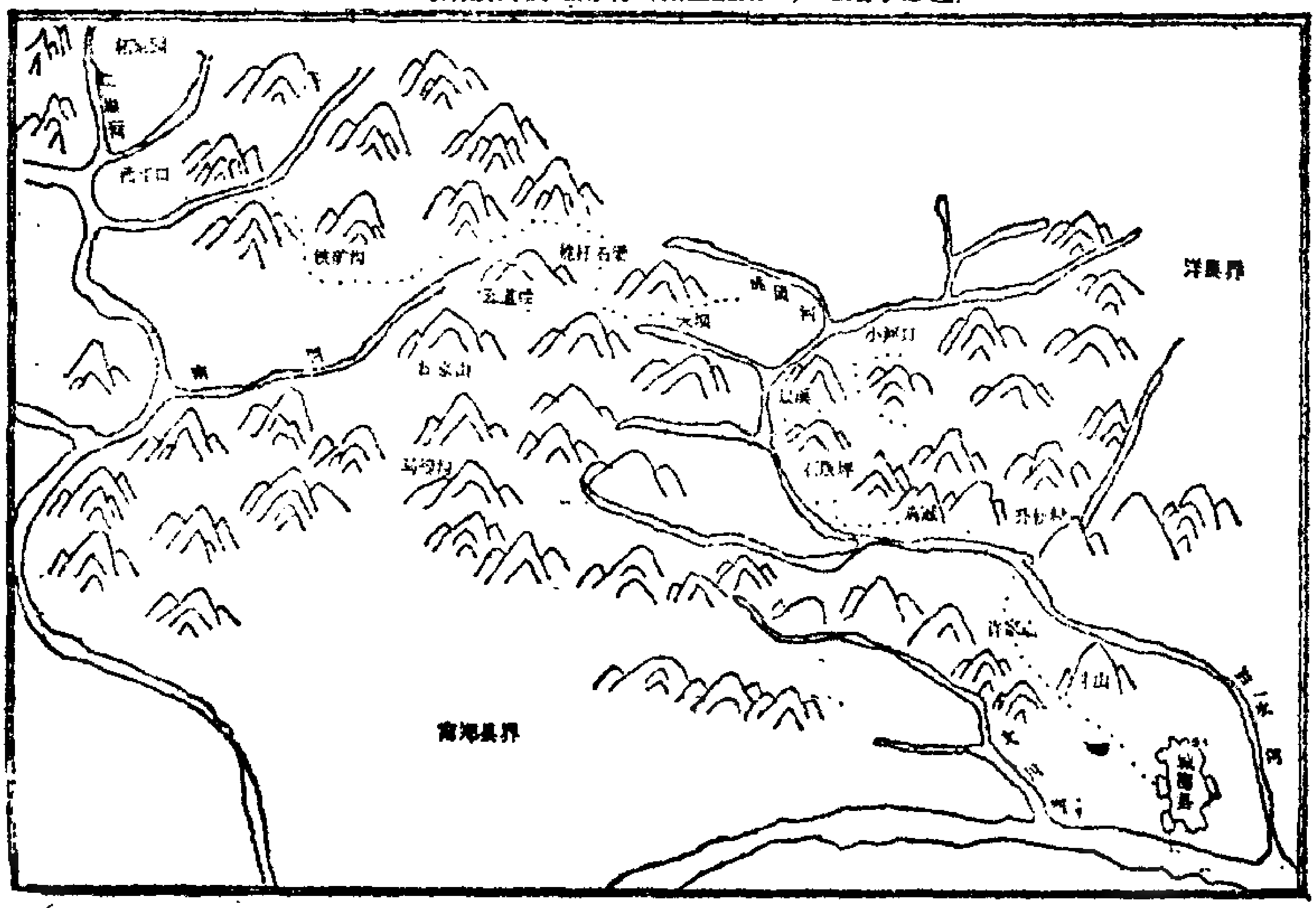
“城固三十里平至许家庙，二十里半险鸡冠梁，三十里险途石堰坪，三十里半险双溪，三十里半险小河口，六十里险桅杆石梁，六十里险西江口（属留坝厅），三十里险柘梨园，三十里平王家塄，三十里半险苦竹街，二十里平寇家关，三十里险进口关（属凤县），三十里平上白云，四十里半险方柴关（属宝鸡县），十五里平虢川，十五里半险杜家庄（属岐山县），二十里平桃川，二十里半险鹦哥嘴，四十里险斜峪关。”

《汉南续修府志》系承清嘉庆十八年严如熤所撰《汉中府志》而重辑的。严如熤还著有《三省边防备览》一书，其书卷十二，《策略》一节云：“小河口一路，史称武侯于汉中筑汉、乐二城，乐城今城固，当亦师行之道。北为斜谷，但在南者为湑水河口，非褒谷也。”这里所说的“小河口一路”，即《汉南续修府志》所称的小河口出斜峪之路。

上述记载所述的由城固出斜谷的路线，可分为两段来加以探讨：自江口而北至斜峪关，此为北段，本属褒斜旧道，向无争议，姑且不论。自江口而南至城固为南段，此道自古有之。今由城固到小河口有班车可通，小河口至江口徒步可达。现据《汉南续修府志》卷之一所载《城固县疆域图》和《留坝县疆域图》绘制了《三国时期褒斜栈道南段城固至江口路线示意图》，另据一九七三年版《汉中地区地图》绘制了《诸葛亮行兵所由褒斜栈道南段示意图》，一并附后，供参阅。这两图虽所据不同，有些地名也不尽一致，但所表示的山河大势是相同的。凡古今山道，皆因水而成，几无水不成道。褒斜二谷源远流长，缘此二谷所成之道为褒斜之正道，自江口至城固者为其支道。此支道自城固而北，基本上沿湑水而成，由湑水至褒水，其间有一分水岭，图中的桅杆石梁就是分水岭的一座山

峰，上下各六十里，就在这一百二十里中也是沿着褒、斜二水的支流进行的。在图中不难看清，这是辨别山地道路是否可通的一个重要因素。说明江口至城固的道路是合于一般山道的自然规律的。记载中所云系武侯行兵所由，当时必定曾对此道有所开拓。

三国时期褒斜栈道南端（城固至江口）路线示意图



三国时期褒斜栈道的通塞概况

三国时期的褒斜栈道，在蜀、魏争雄其间，屡为兵家所注目。其修护事，亦由兵家自理。三国期间见于记载的共有四次修葺：第一次，大约在建兴六年（公元二二八年）赵云、邓芝烧赤崖栈道之后，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这里的赤崖以北阁道，即为诸葛亮后来所修之道。该书又云：“缘谷百余里，其

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此指栈道原貌，即所谓“标准式”。“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意谓修治之后的栈道不再有水中柱了。第二次，魏太和四年（公元二三〇年），曹真伐蜀，数道并入。《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论之曰：“深入险阻，凿路而前……治道功夫，战士悉作。”其数道并入，自应包括褒斜在内，治道亦不例外。第三次，建兴十一年（公元二三三年）“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⑮所称“邸阁”一词，见于《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新版七五二页）：“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可知邸阁是屯粮之所。诸葛亮所修的斜谷邸阁，自然也是屯粮的。斜谷距蜀境远而距魏土近，此必在蜀国兵力所及且粮运得以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实际的效益。“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⑯至此，出斜谷之道已全线畅通，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惜在这年八月，亮卒于军中，遗令杨仪等作退军节度，使魏延断后，魏延素与杨仪不睦，拒不从命，及探知诸营已相次引还，乃“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⑰虽“仪等槎山通道”，亦无可挽回栈阁被毁的局面。此后，蜀国是否有过修道之举，已无从稽考；估计诸葛亮死后，国力日衰，数百里栈道是难以修复的。至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钟会伐蜀，“分从骆谷、斜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⑱许仪治道之艰难可想而知。许仪所治者虽未详何道，但既从斜谷入，必有褒斜无疑。第四次，便是李苞修阁道事。

在先后四次修治中，第一次蜀人为医治战争和洪水的创伤而修；第二，三两次，皆为魏人在伐蜀过程中随军治道；第四次是魏人于战争平息之后所修。前三次修治者皆为取道城固出斜谷之道，最后一次乃是复通故褒谷栈道。《李苞通阁道题名》是这次褒谷栈道复通的依据。李苞复通阁道在魏元帝景元四年

十二月，时值平蜀之初，名为曹魏而实为司马氏执政的封建朝廷，为了扩充疆土，维护南北统一的新局面，急待致力于蜀道的建设，这是李苞通道的先决条件，也是褒斜栈道本身的重要所在。

自张鲁断绝谷阁到钟会平蜀之前，褒谷栈道久经湮塞，因此，在《李苞通阁道题名》中，有“始通此阁道”之句，其中的“始”字，当指道路长久不通，而今又得复通之义。

注：

①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2158页

③、⑤见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1974年中华书局编印的《诸葛亮集》卷一，25页）

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⑥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⑦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2240页，《胡注》；《通鉴纲目》卷十五，《集览》和《质实》；《地名大辞典》1116页，《箕谷》条

⑧⑮⑯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⑨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2261页，《胡注》

⑩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2262页，《胡注》

⑪见《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见⑫《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⑬⑭⑮见《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⑰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考《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

——兼评晏袤释文

《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记晋泰始六年修褒斜栈道事。最初不知镌于何处，后被重刻于石门南的山崖间。其左侧为《李苞通阁道题名》，前有题款。全文皆为工整之楷书，字径四厘米左右，字迹漫漶，现将可辨认者照录于后：

题款一行，十字，可辨者六字："潘宗伯、韩仲元□□□□"

正文两段，首段一行，十九字，可辨者十四字："□□伯、韩仲元以泰□六年五月十日造此□□。"

次段三行，三十八字，可辨者二十四字："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将军浮□□□□李苞□□□□□□□□□木工二千人，始□□阁道"

上列刻字同为楷书，且出自一人之手笔，显然是将魏、晋两个不同时代的两段摩崖并录重刻而成。

其后，即南宋庆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南郑县令晏袤之释文，通篇为隶书，字径3～4厘米，残泐殊甚，几不成诵。兹据近拓，参照《金石萃编》和《褒谷古蹟辑略》所记，将全文附录于后：

魏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褒斜阁道碑陰

潘宗伯、韩仲元记造桥阁十九字，绍熙甲寅（即绍熙

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始见于石门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显，止有六年以下字（止字《褒谷古蹟辑略》误作只）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识，微有偏旁。汉魏两晋以泰纪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晋武帝有泰康十年，余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四三，《褒谷古蹟辑略》误为三四），则知此为泰和六年明矣。是岁，蜀建兴十年。先是太和四年，魏司马懿伐蜀。五年，诸葛亮围祁山，魏诏司马懿拒之。秋七月，亮复军。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马，故魏人得入褒中治桥阁矣。后题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陈留王年号。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则此二号皆魏之纪年无疑。其书盪寇将军云者，蜀张嶷亦有此将军号。盪寇将军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复通此阁道于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冬十一月，魏锺会、邓艾率众伐蜀，至江油降马邈，至绵竹斩诸葛瞻，刘禅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为梁州，褒斜阁道于是乎通矣。庆元元年中秋日南郑令临淄晏袤书”。

（以上，是释文全文——笔者注）

晏袤释文与后人重刻的“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同在一面崖壁上，它们虽镌于不同的时期，但作为摩崖却合为一体。《金石萃编》谓“高五尺九寸，广五尺六寸”即指此摩崖而言。但云“《李苞通阁道题名》二行”有误，实际应为三行。正文前之题款：“潘宗伯、韩仲元云云”《金石萃编》亦未录。此摩崖已在一九七一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

上列两段重刻之摩崖，始为晏袤所释，而晏袤释文谬误百出，后人或附和晏说，或持异议，众说纷纭，令人无从得解。今谛审原石，寻迹求源，乃就一些有争议或前人有疏漏的问题，试陈拙见如后：

一、关于题识

《李苞通阁道题名》原刻无题，想必《潘宗伯、韩仲元题名》也不会有题。大凡题名之类，皆简述其事并署以名讳，是无须拟题的，这在石门摩崖石刻中不乏其例。如《石门题名十八段》、《玉盆题名十二段》等，皆属无题之作，而经后人重刻于石门之南的两段题名却是有题的。《金石萃编》依循惯例，将题删掉。晏袤录文称该两段题名为《魏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褒斜阁道碑》，今原石残泐，但见"潘宗伯、韩仲元……"数字，前面的"魏"字似无痕迹。晏袤所录的"魏"字，或在宋时有之。若果有此字，则不合情理，疑为后之重刻者臆断之误；否则，当系晏袤所错录。至于《褒谷古蹟辑略》所录《魏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通阁道碑》者，显系源于晏袤之录文，自不足为奇。拙见以为，既原刻无题，重刻时就不应擅加，至于冠以"魏"字，有损原义，且易导致混乱，自有澄清之必要。

二、关于两段题名重刻的时代

由石门以北悬崖间《李苞通阁道题名》原刻的发现，可断定石门南这两段题名为重刻无疑。再由晏袤的录文和释文又可断定，重刻的时代必在南宋以前。而晏袤录《潘宗伯、韩仲元题名》中，其泰字下一字和最后三字已不可识，就其当时的漫漶程度，可推知刻石之日亦距南宋甚远。清人罗秀书，依书体而论，断为隋唐人手迹，是有一定道理的。据《文物》1964年11期所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一文中记载，在石门南二十余米的悬崖上，有一尊立式石雕菩萨像，就其衣着纹饰判断，当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所营造。是否在隋唐早期，有人在石门南山崖上雕凿菩萨像的同时又重刻了上列两段题名，也未可知。退一步说，既然在隋唐早期有人在石门南雕刻菩萨像，说明石门南在当时仍是人迹常至之地，这就为重刻上列两段题名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恰好造像和题名都具有隋唐的特色，这就进一步提供了断代的依

据。考我国文字演变源流，两晋南北朝，虽诸体皆备，但主流当属由隶到楷的变化阶段，众所周知的魏书，便是楷隶结合的产物，是这种变化的标志。迨隋唐之际，楷书便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规范化文字，因其便于书写和辨认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楷书又称真书，随着真书的风行，真、草、隶、篆在我国书坛并茂。作为书法艺术的延续和发展，隋唐刻石以楷书为多，自有其时代特徵。对此，罗秀书所见甚明，似无须赘述。

三、关于晏袤的释文

晏袤释文称潘宗伯、韩仲元造桥阁事，在魏太和六年，"先是太和四年，魏司马懿伐蜀。五年，诸葛亮围祁山，魏诏司马懿拒之。秋七月，亮复军。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马，故魏人得入褒中治桥阁矣。"按：诸葛亮在蜀建兴九年，即魏太和五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蜀建兴十二年春，亮率军出斜谷，以流马运（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木牛在前，流马在后，晏袤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了。此尚为小误，就晏氏所云魏太和六年魏人入褒中治桥阁者，则实为大误，若依此说，将有两个疑问无从得解：

1．蜀建兴六年，蜀将赵云、邓芝由箕谷退军，烧毁赤崖以北缘谷栈道百余里，被烧毁的栈道虽经诸葛亮修竣，但只限于褒谷上游这一段，褒谷中、下游的栈阁毁于张鲁，在李苞通道以前并未修复，魏人何以得入褒中？

2、蜀建兴十年，诸葛亮休士卒，劝农于黄沙（今汉中勉县东），又习兵演武，制作流马，只待出兵伐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蜀人怎能坐视魏人入褒中治桥阁呢？

《两汉金石记》亦曾对晏袤释文有所议驳，其文曰："诸葛武侯以建兴九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大破司马懿，射杀张郃，其时武侯屡修斜谷之道，岂有魏人得大书年号于石门者？况魏明帝太和，晋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今谛审此石，本隐隐有画痕可辨，确是"始"字（指泰字后一

字），非和字也。晋武帝泰始六年，则西路通辟已久，治此石道为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舆地碑目》有太康元年《兴元新路记》，其时亦去此不远，皆可以补史传所未及也。盖崖上先有景元之题，而潘、韩复题其右耳，晏记以为皆魏刻，非也。”

《两汉金石记》所云足证晏袤释文之误，但称“崖上先有景元之题，而潘、韩复题于后”者，则与此重刻摩崖之实情不符。盖景元之题与潘、韩之题，在重刻摩崖上，皆出自一人之手笔；加之泰字后一字漫漶不清，在景元题名未发现前，是难于辨别清楚的，这也是导致晏袤误释的原因之一。《两汉金石记》既证泰字之后为一始字，则潘、韩所题当在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二七〇年）。其时距李苞通阁道仅只七年。潘、韩二人生卒、仕迹皆无考，刻石但举名讳而不称职衔，其治道之绩，比之李苞似有逊色。至于王象之《舆地碑目》有太康元年《兴元新路记》，系指褒中典阁主簿王颙、汉中郡道阁县掾马甫、汉中郡北部督邮廻通等修道路事，《晋太康修栈道石刻》为之记，此石刻原在今留坝县东北二十四孔阁处，现已毁，唐孙樵《兴元新路记》有此录文。

综上所述，自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到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记有三次修褒斜栈道事，其间隔最长者十年，就修治之频繁，为汉魏所不及，就兴工之规模，比之汉魏，则大有逊色。

北魏《石门铭》考

《石门铭》是北魏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年)镌刻在古褒斜栈道石门东壁的摩崖石刻。通高一七五厘米，宽二一五厘米，文二十七行，行二十二字，字径五～六厘米，楷书，北魏梁秦典籤王远撰文并书写，石师武阿仁凿字。

紧接《石门铭》右下方，另有一段摩崖，通高九十八厘米，宽二十八厘米，文七行，行七至九字不等，字径同前，仍为楷书，后有“贾哲字三德”题名。与铭文同时镌刻，前人称其为《石门铭小记》。从内容上看，当与铭文同为一体，因此历代识者论及《石门铭》，多包括这个部分在内。

《石门铭》是北魏著名石刻之一，它记载了我国最早的穿山隧道——褒谷石门的通塞、复开和被誉为栈道之始的褒斜道改道的经过情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的书法又富有典型的魏碑特色．是研究我国书体演变的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它的文笔精练，叙事真切，是一篇难得的文学佳作，向为金石界、书法界、文史界所推崇，自宋以来，相继有名家著录可考。但由于交通闭塞，研究者很难亲睹原刻，加之传世拓本，字迹残缺不全，因此，各家著录中疏漏和舛误较多。今据原刻，由校字、考释、训诂诸方面试述拙见。

一、校 字

《石门铭》的文字，宋时欧、赵、洪诸家未录，其录文见于《金石萃编》和《褒谷古蹟辑略》两书，但缺字、错字甚多，几不成文。前者计缺三十八字，错八字(其中三字缺笔)；

后者计错14字，并有一错句（详见附表）。石门铭原刻现存汉中市博物馆，其近拓首行缺一“此”字，二行“晋、迁”二字，三行“阁、堙、数”三字，五行“峭、磐、折、巨”四字，六行“贤、朝、简”三字，七行“诏、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十二字，八行“社、建、旗、抚、边、盖、焉、难”八字，九行“输、开、旧、路、释、负、担、之、劳”九字，十行“领、徒、一、万、人、石、师、百、共”九字，十一行“发、精、解、冥、衡、之”六字，十二行“蹑、毕”二字，十三行“填、磎、栈、壑、砰、险、梁、危、迴、车、至、谷”十二字，十四行“礐、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十三字，十五行“焉、履、临、叹、存、幸”六字，十六行“劳、于、畜、产、盐、利、纨、锦、罽、毦、之、绕、充、仞”十四字，二十三行“夕、凝、晓、露、昼、曙、秋、风、鸟、隆、高、阁”十二字，二十四行“辚、辚、绝、百、辆”五字，二十五行“以、纪”二字，二十六行“巳、丑、卯、朔、卅、日”六字，二十七行“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洛、阳、武、阿、仁、字”十四字皆漫漶不清，但经观察和摩挲，原刻仍能辨认。盖此摩崖表面凹凸不平，拓印十分困难，按一般传统拓印之法，有些字是无从拓出的，这是导致拓本字迹残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幸此石刻目前保存完好，兹据原刻将其全文照录于后：

石门铭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迴，戎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崖崩沦，硐阁堙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蘿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

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廻车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礭栈壑，砰险梁危，自廻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罽毦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巖迺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汧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汉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壃。永怀古烈，迹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隆高阁，有车辚辚。咸夷石道，驷牧其驷。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敢刊巖曲，以纪鸿塵。

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二月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籤太原郡王远书　石师河南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铭文右下方有一段摩崖刻字，即谓《石门铭小记》，亦据原刻照录如后：

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年正月，讫乎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门□矣哉！后之君子异事同闻焉。

贾哲字三德

附《金石萃编》、《褒谷古蹟辑略》所载《石门铭》录文

缺、误字对照表

书名＼项目	错字				缺字和错句
	正	误	正	误	
金石萃编	滄 撫 绥 南 释 自 宣	掄 扌 糸 难 采 及 奠	無	前	峭、盤、以、负担、徒一万、石、百、填、磥、壑、砰、险梁危、车至谷口、何、以、黄、汉、古烈、迹、眺、畠、林、望、悠、咸、更、鸿、河、本
褒谷古迹辑略	祉 经 舊 惟 咸 石 壇	公 径 道 为 成 古 断	右 精 深 师 本 無 極	将 情 渊 帅 此 不 朽	石刻原文中“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误作“今大魏正始五年改为永平元年”

注：本表是以石刻文字先后顺序排列的

二、考　　释

历代学者对《石门铭》作过一些考释：

宋欧阳修《集古录》云：“右魏石门铭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遂开。假节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开创舊路，诏遣左校令贾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正始）十月，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其余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门在汉中，所谓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详。正始永平皆后魏宣武年号也。”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石门铭盖述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开石门之功。魏书宣武纪正始四年九月甲子

开斜谷旧道，即其事也。碑云起四年十月十日，至永平二年正月毕功，而史书于四年九月者，据奉诏之日言之耳。北史羊祉传不书开斜谷道事，此史之阙漏，当据石刻辅之。碑云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即梁天监三年也。是岁夏侯道迁背梁归魏，梁史书魏陷梁州于二月，当得其实。魏收史书于闰十二月，温公通鉴据长历梁置闰在次年正月，后遂移于后一年，非也。”

《关中金石记》云："远（王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又自欧赵以来不著録，尤可贵也。序文有云此门为汉永平中所开，即指鄐君事言之，鄐君为汉中太守，甚有功于民，而史志家皆不载其人，碑又遗其名字，余甚惜之。”

《金石萃编》云："按铭序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是指汉明帝永平六年癸亥岁汉中太守鄐君所开石门也。自汉永平癸亥至宣武帝永平二年己丑，实四百四十七年，云将五百载者，约略之词也，《集古录》云汉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者。杨孟文所开者事在桓帝建和二年，洪氏《隶释》中有其文，非明帝永平中事，欧公盖误记耳。魏书世宗纪正始元年闰十二月癸卯朔，萧衍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即序所云正始元年汉中献地事。铭后别有摩崖一段，不著记者姓名，盖以前后开石门皆在永平年为异事而记之也。”

上列诸家考释，既多有见地，亦屡有舛误。有的问题前人之误虽得后人正之，而后又有新误；从整体上讲，还有一些重要的疏漏。现一并陈述于后：

（一）关于石门的开凿时间

宋欧阳修《集古录》云："石门在汉中，所谓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详。”这是个错误的说法。清代王昶《金石萃编》针对这一点明确指出："《集古录》云汉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者，杨孟文所开者事在桓帝建和二年，洪氏《隶释》中有

其文，非明帝永平中事，欧公盖误记耳。”王昶虽然指出了《集古录》上的错误，但云“杨孟文所开者事在桓帝建和二年”也是不确的。考之《石门颂》石刻文字，知杨孟文并未开石门，他曾向顺帝上疏，请修褒斜道，几经周折，顺帝终于从其所请，于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见拙作《石门颂》小考，刊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四期）。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为杨孟文勒石颂德，而并非杨孟文在这一年修石门。毕沅《关中金石记》所云：“此门为汉永平中所开，即指鄐君事言之。”所谓鄐君事，是指东汉永平六年到永平九年汉中太守鄐君以明帝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之事。毕氏认为鄐君在这次开道过程中完成了凿通石门的任务。此说有《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为据，又合于《石门铭》中“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之记载，是可信的。

（二）关于石门的通塞和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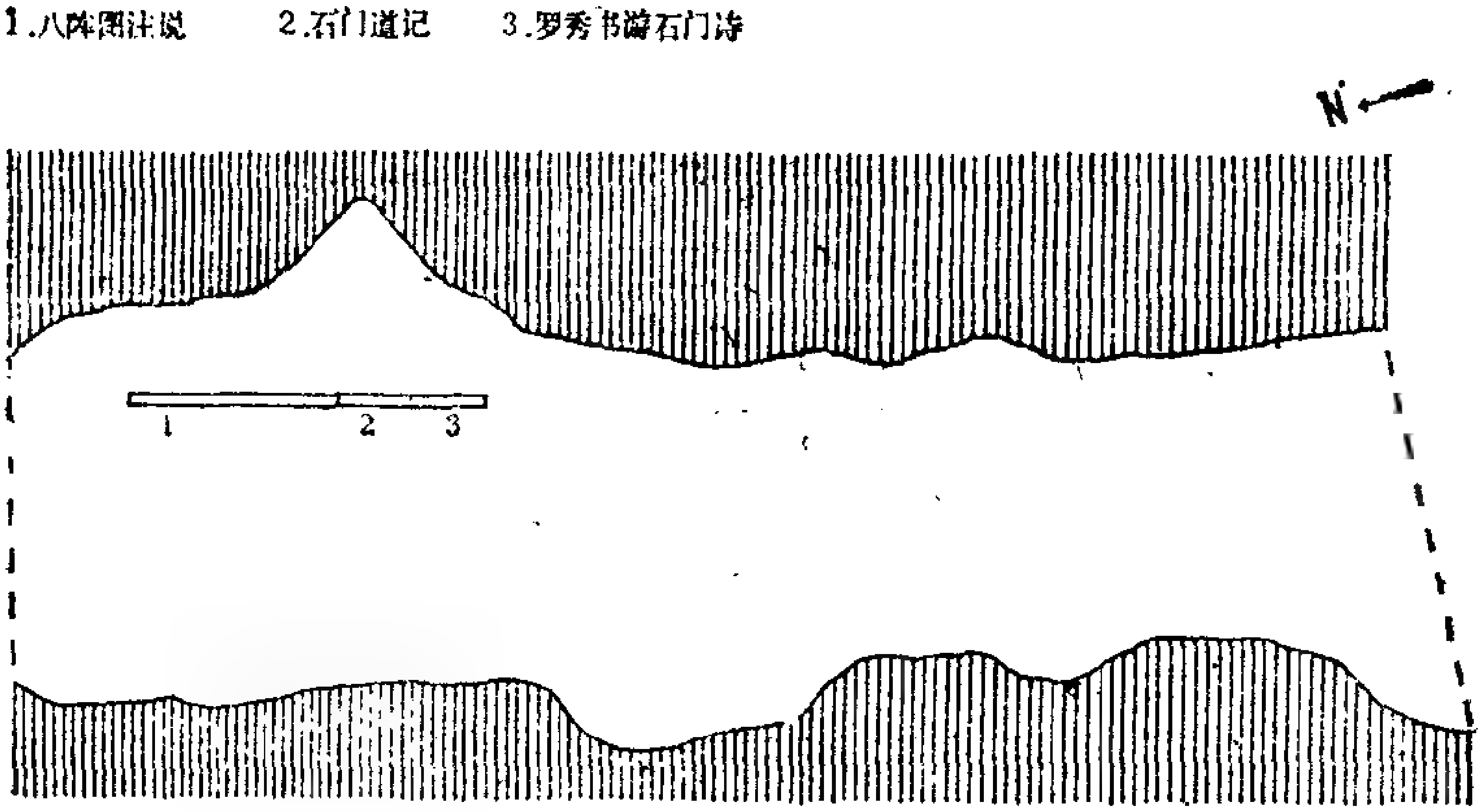
石门自东汉永平中所穿，到北魏正始元年，先后历经四百四十多年，这段时期褒斜道有过四次通塞。自鄐君承修褒斜道之后，至安帝永初元年和二年，由于西方少数民族进犯汉中，桥梁断绝，道路遭到破坏。顺帝延光四年（公元一二五年）诏益州刺史修褒斜道（见《安帝纪》和《顺帝纪》），这是第一次；桓帝永寿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又因道路阻塞，右扶风丞李君承修之（见《汉李君修阁道摩崖》），这是第二次；三国时诸葛亮出兵五丈原，必先修治斜谷邸阁，魏军进攻汉中也要先整修道路，不过限于两军对垒的局面，多是小修小补而已。迨锺会、邓艾率军平蜀之后，魏荡寇将军李苞于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十二月“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修阁道（见《李苞修阁道摩崖》），这算是第三次；晋武伐吴之前，这条道路又被阻塞，遂于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予以复修（见《晋太康修栈道碑》），这便是第四次。随着道路的几废几修，石门

自然“通塞不恒”。自晋南渡之后，褒斜道便遭冷落，先后有百余年无人问津，诚如铭文中所述：“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门南北车马不通者久之。”道路的不通，势必导致石门的湮塞。至北魏正始元年（公元五〇四年），虽褒斜复通，但石门并未修复。如铭文所记：“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自北魏正始四年到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年），在重修褒斜道的过程中石门又被开通。石门自东汉永平中所开，几经湮塞，到北魏永平又得以复开。时人感慨于这种历史的巧合，乃为之记，其文曰：“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年正月，讫乎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矣哉！”这段文字中“本西壁文”的“本”是指石门而言，“西壁文”是指《石门颂》而言。因《石门颂》镌于石门西壁，《石门铭》镌于石门东壁，《石门颂》中又首次记载了汉永平中开石门之事，所以才有“本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的叙述。“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年正月，”乃指北魏永平中复开石门之事。“今古同□□矣哉”内有两字刻痕和泐痕难辨，紧接“同”后的疑似“無”或“迹”字，再后又疑似“極”字，以文义论，“同迹極矣哉”似能讲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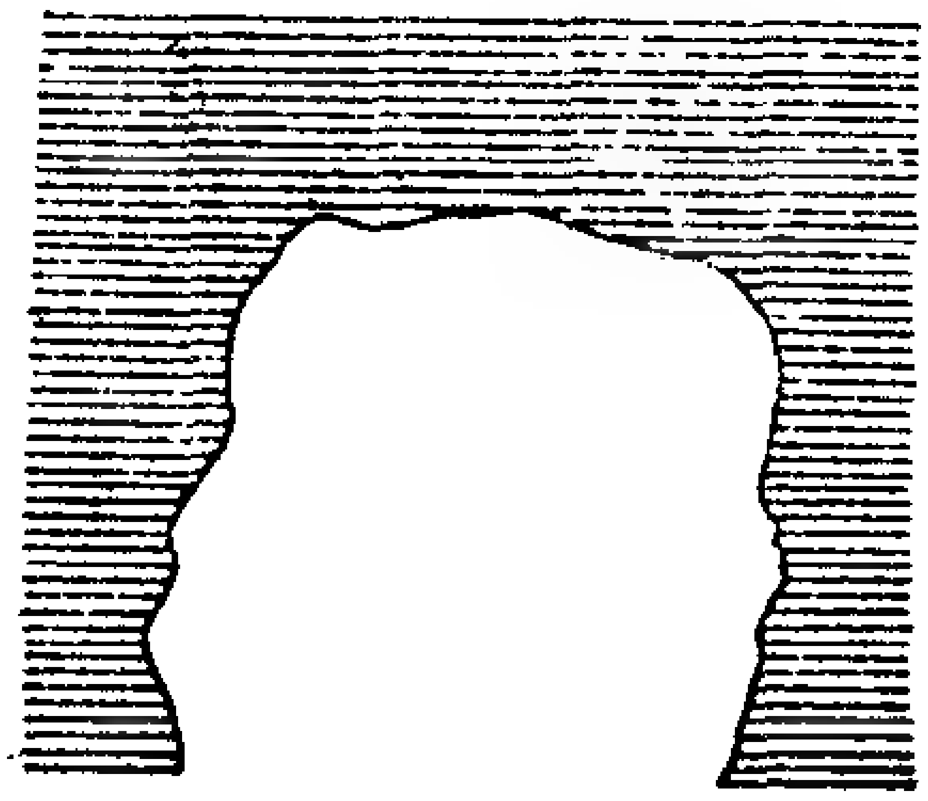
（三）关于石门的形制及其开凿方法

石门的形制及其开凿方法，在《石门铭》及各家著录中皆未述及，今予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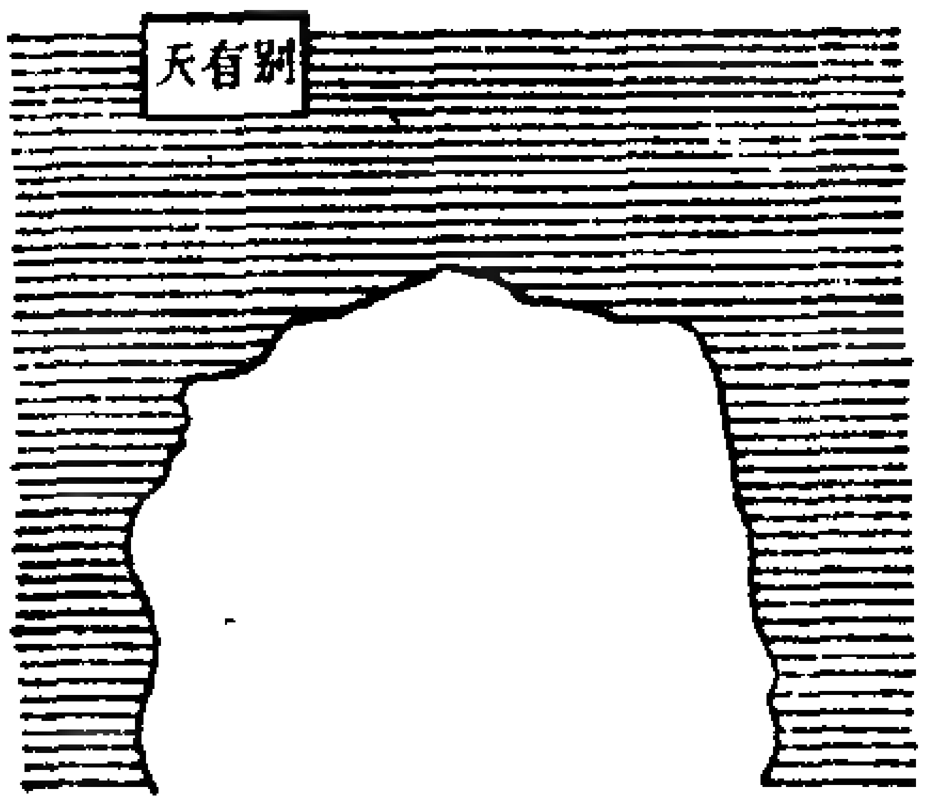
石门是褒斜栈道的重要遗迹，褒斜栈道南出褒谷，穿行于七盘山下的隧道之中，这段隧道就是东汉永平中凿通的石门。它位于褒谷西岸，与谷道平行，大体为南北向。据《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一文所称：“隧道南北长十四米，东西宽三·九五～四·二五米，高四～四·七五米”。又据已上报国务院备案的“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石门平面图



石门北口正视图



石门南口正视图

比例 1:100

单位之一）的档案中记载："石门隧道东壁长一六·五米，西壁长十五米；北道口高三·七五米，宽四·一米，南道口高三·四五米，宽四·二米；南北高度不等，由南向北高差三〇～五〇厘米。"这两种数据，都是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实地勘查中得来的，因所取的部位不同，故略有差异。今一并志此，供后之研究者参考。

石门作为一千九百年前的穿山隧道，其开凿方法是值得研究的。据实际观察，在石门内壁并无斧、凿、钻之类的工具所留下的痕迹。又据清代罗秀书等人所见，石门似为火烧、水激或醋激后敲击而成，又云醋激犹不及黄豆烧石之速。《褒谷古蹟辑略》所载梁清宽书贾汉复《栈道歌》中就有"积薪一炬石为圻，锤凿既加如削腐"的诗句，也反映了这种说法。其实此说早在《后汉书》中已有记载。《后汉书》卷五十六，《虞诩传》曾载："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李贤注引《续汉书》云："下辨东三十里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镌去石，遂无汜溺之患。"由此可知，石门的开凿，正是采用了这种破石之法，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

（四）石门在历史上的作用

《石门铭》中记述："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这段文字描写了石门湮塞之后的困难景象。由此可联想到石门开凿之前栈道的艰险情况。汉明帝刘庄诏令凿通石门正是基于此因。石门位于七盘山下，其山突兀于褒谷上空，褒水几为所断，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激流。此处很难架设栈道，行旅苦于攀援之险，朝廷苦于运输之难，乃有开石门之壮举。

以石门的规模而论，它不单是人们徒步往来的通道。汉时一轨之宽约为一·五米，车辆可在石门内并行无阻，加之石门底部与其南北的栈道相接，坡度平缓，也是宜于行车的。《石门铭》中有"穹隆高阁，有车辚辚"之记载，便是褒斜栈道及石门通行车辆的佐据。

考之于史，早在公元前七百多年前，郑莊公因其母姜氏憎

恶自己而宠爱其弟共叔段，后共叔段作乱，为莊公所平，在莊公盛怒之下，竟置其母于城颖（郑地），且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时有颖考叔其人闻知此事，乃献计掘地及泉，使母子重逢于地下的隧道之中（见《十三经注疏》一千七百一十五～一千七百一十七页，《春秋左传正义》卷二第十三页至十五页）。这里所说的隧道，可能是我国最早的隧道了，但是它的用途及开凿方法，皆远逊于褒谷中的石门隧道。另据《史记·河渠书》所载，汉武帝时，曾"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澄城）引洛水至商颜山（在大荔县境，今名铁镰山）下，岸善崩（言商颜山崖岸，土性疏，易崩毁），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下流曰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这里所称的穿山隧洞，有十余里长，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但记载中未详其形制，就其通水而言，它的规模较之车辆畅通的褒谷石门隧道犹有逊色。

石门作为褒斜栈道南段的通道，持续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有人据《石门铭》中："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的记载，判断石门在北魏正始元年被废弃。这显然是误解。在《石门铭》后别有摩崖一段，已经清楚地记述了北魏永平二年重开石门之事，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有人说石门及其附近栈道，皆废于唐代，其依据是唐代栈道的部位升高了。在唐孙樵《出蜀记》中，确实记载了这个情况。但这在历史上仅是一个暂短的插曲，《出蜀记》中所记述的是唐代的七盘道，这条道路很不好走，一俟石门复通便被废弃。在今石门上方穿行于云雾之中的一山蝙路，约有二米宽，是明清时连云栈的路基，在宝汉公路之前，这条山路蝙曾是由汉中去宝鸡的大道。这条道路始通于明代洪武年间，拙见以为石门当废于此时，理由如下：

1．石门所在地岩石裸露，峭壁直立，石门南北的栈道，皆有立柱作为支撑，由石门往上的悬崖上，已为立柱所不及，是不会轻易架设栈道的。《石门铭》所说的“西上凿山为道”这个道至今还隐约可见，其坡度很陡，加之荆棘丛生，又常为石尖碎屑所填塞。一旦石门受阻这就是唯一的通道了。但是，在这样一个狭窄险峻的通道上，是无从架设栈道的。因此说，北魏永平二年复通的石门，到兴修连云栈之前，在通常情况下，石门仍应是褒斜栈道南端的必经之地。

2．在石门内和石门南北的山崖上，有历代的石刻和造像，其中汉魏和宋代较多，而隋唐绝少。在石门南口之外的山崖间有一段楷书摩崖，文云：“潘宗伯、韩仲元以泰□六年五月十日造此”。又云：“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其后有南宋晏袤的释文。据清人罗秀书所识，这段楷书摩崖是隋唐人的手迹（见《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摩崖》）。又据《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所刊陕西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一文记载：“在石门洞南二十余米的难以攀登的悬崖上，发现一尊立式石雕菩萨象，距昔日栈道面约二米多。先凿一龛，龛下部宽〇．三四米，高〇．三九米、深〇．〇二米，上部呈火焰形。从其衣着纹饰判断，当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作品。”此二例说明，在隋唐期间，石门并非冷落。但就各代石刻分布及其数量而言，隋唐比较稀少，也是事实。这是由隋唐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与石门存在与否本无关系。隋朝短短三十余年中，栈道上不可能有较多的石刻。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穿过秦岭的各条栈道并通，特别是最西的故道，与嘉陵江的漕运相互配合，成为唐代入蜀的要道。在太白山以东沿灙骆二水所修的灙骆道，也比过去兴旺起来，唐德宗避乱就曾由灙骆道幸兴元（汉中）。唐代晚期，战乱常祸及褒斜道。光启二年，为遏制僖宗出奔，先是李昌符烧栈道，接着又是石君涉烧栈道，前者所烧乃褒斜道

北段，后者所烧乃褒斜道南段（见《新唐书·僖宗本纪》、《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栈道既毁，行人断绝，自然也不会再有石刻的。迨至宋代，情况变化很大，石门石刻猛增，仅王昶《金石萃编》所录就有《石门题名十八段》，又有《玉盆题名十二段》，石门道路之通于此可徵。明代，石门内外几无石刻，但在石门上方山岭间却有几通明朝的石刻，其位置恰在连云栈之近旁，这是栈道路基升高的确证。清代晚期，石门及其附近的栈道，皆曾修葺，供人凭吊，于是又有石刻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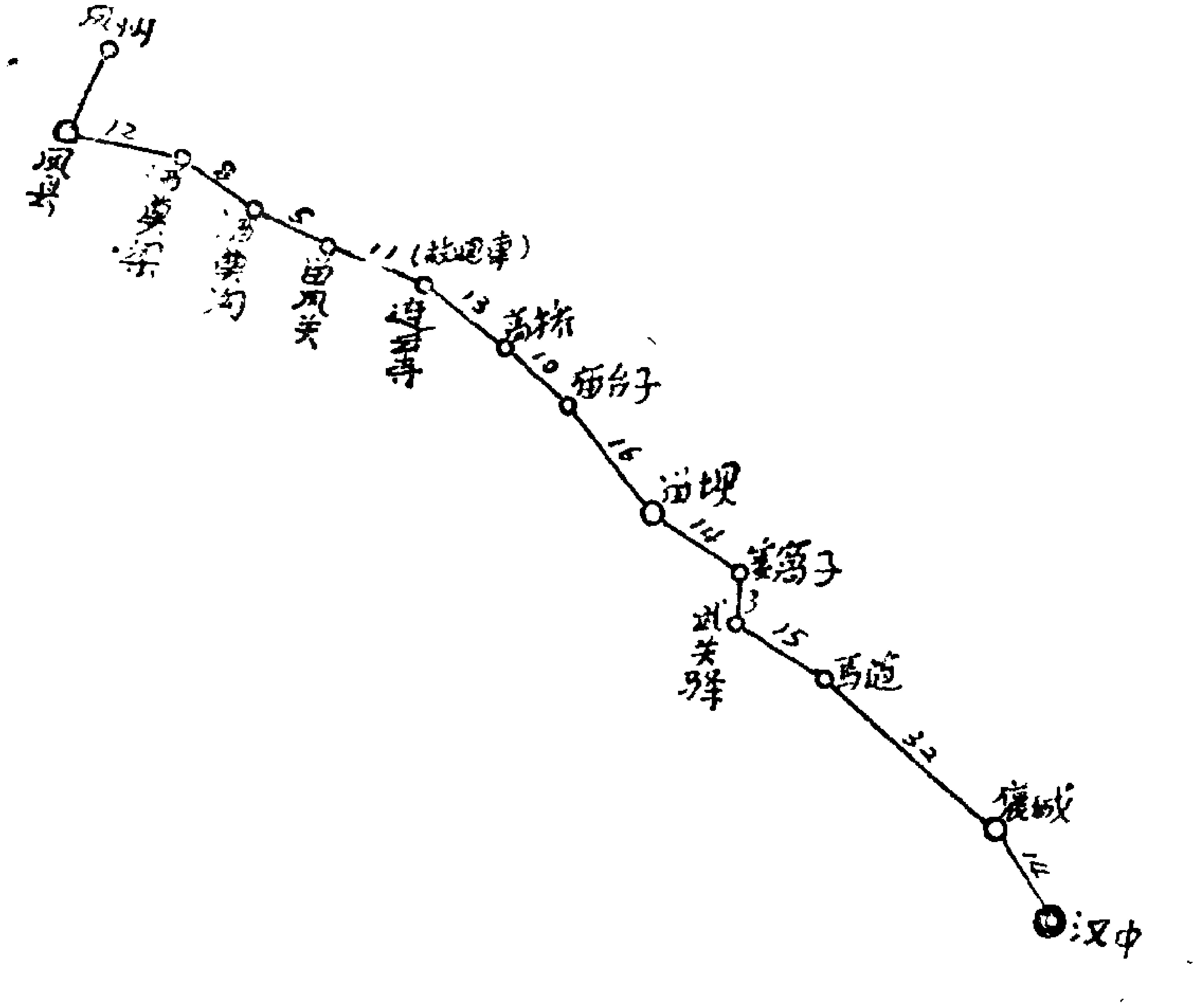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似可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门作为褒斜栈道南段的通道，自汉魏到唐宋，历经一千二百余年，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褒斜栈道的首次改道

由汉中褒谷到郿县斜谷的褒斜栈道，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史籍上有过多次通塞的记载，这条栈道的局部地带也可能有过一些变化，但就整体而言，由褒谷到斜谷这个路线是未变的。而北魏永平中，经羊祉、贾三德改道后的褒斜道，情况就不同了。它的南段仍由褒谷上溯，但不沿着褒水正源至衙岭山（今名五里坡）入斜谷，却由褒谷上源的另一支流今北栈河到紫柏山麓，再越紫柏山、柴关岭到廻车。历史上把这条道路叫廻车路，由褒谷到廻车，较之以前到斜谷，是整个路线上的改变，这是褒斜道的首次改道。《石门铭》详细记述了这次改道的经过，这是研究褒斜栈道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料。

《石门铭》云："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以天险难升，表求自廻长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起四年（正始）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溪栈壑，砰险梁危，自廻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

辀并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迴车即今凤县南星公社连云寺大队所在地，其地有陈仓沟，为古陈仓道所经。羊祉请修迴车道，其目地就是与穿过迴车的古陈仓道相接。此道修通之后，北魏朝庭在此置迴车戍以屯兵。《魏书·世宗纪》称正始四年九月“甲子，开斜谷旧道”，实指羊祉、贾三德所开的迴车道，此道并不完全在斜谷旧道上，所云“斜谷旧道”者欠妥。《太平寰宇记》一百三十四和《读史方舆纪要》五十六皆曾记述，迴车戍在凤州梁泉县南一百六十里，《太平寰宇记》并述，自兴元（汉中）至凤州（梁泉县为州治）三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志》所记亦然，减去褒城至兴元三十里，再减去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则迴车距凤州约一百五十里，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略同。参看今之公路里程图，可进一步明确迴车的地理位置。



上图所示，自汉中至留坝七十八公里，加上留坝至连云寺三十九公里，共一百一十五公里，再减去汉中至褒城十四公里，应为一百零一公里，与《石门铭》所云二百余里大体相合。于此可证今之连云寺，即故迴车无疑。连云寺其地有陈仓沟，即《水经注》所称“东狼谷”，自古有道可通沔县。《读史方舆纪要》五十六，《沔县·白崖》条云：“百丈坡在县东北二十里。舆程记：由凤县南百里桑平铺而入，至此而出，路长二百里，为古陈仓道，汉高帝出故道袭陈仓盖由此……”。可见迴车亦即桑平铺，后又称桑林铺。自通迴车道之后，迴车遂成为自褒凤入陈仓和自沔凤入陈仓两路的交会点。北魏朝廷在此置迴车戍，唐以后五代期间又在此置桑林戍，皆视此处为屯兵要地。

《石门铭》所述“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其“旧”字何义？考之迴车道的路线，其南自褒谷上溯到留坝武关驿即今江窝子这一段，与原褒斜道同迹，此即旧道之一义；至于武关驿到迴车这一段，原本无道（举世所知的大道），但此段沿今北栈河河谷而行至紫柏山，越柴关岭到达凤县南星公社连云寺，沿途地势比较平缓，并无难以逾越的悬崖绝壁，今天公路畅通无阻，疑在修迴车道前已有小道可通，此即旧道之另一义。北魏朝廷初据汉中，进一步向巴蜀扩充，急于修通道路，鉴于原褒斜道荒废日久，栈阁一空，又全长五百余里，而迴车道既近便又易通，加之其北有故陈仓道可以利用，乃修迴车道以应急。古今学者常论及故陈仓道及褒斜道改经迴车的路线问题，但多有歧见，各执一说，争议不休。想必《石门铭》关于迴车道的记述，应是辨明是非的重要依据。

三、训诂

训诂，就是用今天的话解释古代的文字，也就是过文字关。汉《石门颂》一向被认为是颂扬杨孟文开石门的，只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了《石门颂》的文字。北

魏《石门铭》虽不似《石门颂》那样艰深，但其中某些词、字也比较冷避，有训诂之必要。然而，训诂毕竟非本文份内之事，在此仅述及与考古有关者，以区别于一般文学范畴的训诂。兹分段试述于后：

第一段“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乃作铭曰”此段着重介绍石门通塞和褒斜道改道的经过情形，同时颂扬羊祉、贾三德的为人及其改道的成功。其今意如下：

这座石门开凿于东汉永平年间，将近五百年了。世代更迭，西方少数民族相继侵占内地，战争频仍，在战乱中石门时开时闭，通塞无定。自晋朝迁都江南之后，这条道路也被废弃。山石崩塌，涧溪被堵塞，桥梁、栈阁悉被毁坏，石门南北各数里，车马早已不能通行，只有单人徒步，攀援着萝蔓和葛藤，才能免强行进。北魏正始元年，汉中归附于北魏政权，这时褒斜栈道才得以复通。但因石门堵塞，行人要由门北一里西上，沿着盘旋九折的石道通过，行走十分困难，叫苦之声，遍于山野。这时，北魏朝廷初据汉中，要选择有才能的官员总揽各项大事。正始三年，乃委任龙骧将军泰山人羊祉为梁秦二州刺史，执掌军政大权。羊祉颇有晋朝羊叔子之风度，他看到天险难越，运输受阻，疏请开创迴车以南的道路，以通行车辆，解除负担的劳苦。朝廷同意羊祉的疏请，并派遣左校令贾三德率刑徒万人、石师百人，共同承修道路。三德精巧聪慧，深明事理，又通晓技术知识，虽西晋杜元凯（杜预）曾架设过黄河桥，三国马德衡（马钧）改进过织绫机，亦不足与之媲美。从正始四年十月开工，到永平二年正月结束。新开的道路，路宽六丈，阁宽四丈，凡遇，裂隙皆予填平，凡遇大的壑口或山崖，皆架设桥梁和栈阁。迴车至褒谷口二百余里，可容两车并行，以往的贤哲之士所未做到的，甚至难以想象的事，今天都实现了。过去的崎岖小道，今天没有不夷通的。假如诸葛亮健在，其木牛流马可以代之以大车而不必劳苦了。东汉时曾畏途而返的

王生（名王阳，除益州刺史，去益州赴任，行至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遂引疾去）若还再来，也不会有临深之叹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牲畜、盐铁、呢绒绸缎和各类毛织品，皆得以畅销，经济繁荣，各地人民都比较殷富。往返于这条路上的行旅，从此免去负重跋涉之劳。此情此景，十分壮丽！若不是有鲁班、王尔那样的巧思，张衡、蔡伦那样的筹算，再加上秉公尽职，无私献身的精神，怎能有此壮举？乃作铭表彰其事。

第二段“乃作铭曰……敢刊巖曲，以纪鸿塵”。这一段着重描述石门和道路复通之后的情景，全部是四言韵文，内容多为上文所述及，其训诂从略。

第三段是落款，亦从略，第四段“后记”又称“石门铭小记”，与复通石门最为密切，兹训诂如下：

今北魏朝廷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复开石门之工役于永平二年结束。石门始开于东汉永平，又复开于北魏永平，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巧合，莫过于此。

其后署名“贾哲字三德”，如贾三德名哲，则系本人手笔；如“哲”是“先哲”、“往哲”之类美称者，则系他人手笔。因贾三德其人史书无传，生平无考，故存二说以待考。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与山河堰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在石门南数十步褒河西侧的山崖间，通高二二六厘米，上沿宽五一〇厘米，下沿宽五〇六厘米，四周有鼓出的边子，边宽约十五厘米，崖面两端内收，中部外鼓，随山势而略呈曲形，雕凿精细，字迹清晰，更以其材巨形丰为整个摩崖之冠。《金石萃编》记此摩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广一丈九尺八寸四分，文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径六寸许，隶书。《褒谷古蹟辑略》称此摩崖字大于碗，生动可观。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一年，在修建石门水库期间，乃将此摩崖由山石中凿出，其重量达十五吨，在施工过程中倍加珍重，于摩崖本身无任何损伤，安全迁移到汉中市博物馆。此摩崖共一百三十五字，兹照录于后：

□□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戍帅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徕劳工徒。堰别为六，凡九百三十三丈，釃渠四百一十丈。木以工计，七十二万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计，一十五万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尽决。秋，使者被旨兼守事，会凡役，慨念民输当四倍于每岁之常，迺官出钱万缗，为民助。查沆、贾嗣祖、晏袤、张丙實董其事。（标点系笔者所加）

此摩崖前有“绍熙”二字，原本不缺，清嘉庆间有一廖姓

石匠取石时不慎伤此二字，此事被县主闻知，县主盛怒之下，几将该工匠毙于杖下，然已无可补救，此后遂缺此二字。时隔数十年之后，同治十二年罗秀书访此摩崖，追忆故旧，乃为之记。可惜县主大名未曾记载下来，他的政绩如何，也未可知，单就他看重古物，保护先辈的文化遗存之心，同后世那些滥用职权以毁坏古代文化为能事的不肖子孙相比，是很值得赞许的。

此摩崖原无题，因其文字记述绍熙间修堰之事，又镌于山河堰落成之时，故《金石萃编》称之为《山河堰落成记》。实际上山河堰屡经修治，称落成记虽不甚妥，姑沿用之。《褒谷古蹟辑略》称此为《晏袤修堰碑》，似与文意不合。晏袤时为南郑县令，于修堰事，本责无旁贷；然常平使者范中艺"被旨兼守事"，董事者又有查沆、贾嗣祖、晏袤、张丙实多人，自非晏袤一人所为。晏袤工书，前《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摩崖释文》皆出自晏袤之手，此摩崖虽未注明书者，但观其笔意仍为晏袤手笔。

摩崖刻字称"山河堰"者，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云："褒水又名山河水"，引山河水灌田所修之堰，故名山河堰。古老相传，此堰系汉丞相萧何所创，曹参落成之。此虽史所未书，但有《宋山河堰赋》等石碑为证。后人为怀萧曹之德，又称山河堰为"萧何堰"或"萧曹堰"。

山河堰既肇自汉时，历代增损不定，屡废屡修，亦为常理。但在宋以前无记载可循，宋以后，见于志乘和碑刻者甚多。《宋史·河渠志》曾记述，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年），吴珙发卒助役修堰之事。在石门以南褒水东岸俗称"婆婆炕"，这个地方的崖壁间有《杨绛山河堰记略》摩崖，亦曾记载乾道间修堰之事，其文颇长，恕不照录。迨绍熙间，又历经二十余年，因夏秋涨水，六堰尽决，遂有绍熙五年修堰之举。记载这次修堰经过并为之颂功的，除《山河堰落成记》摩崖之外，另

有一通《宋山河堰赋》的石碑，嵌之于褒谷口河东店山河庙内的墙壁中，亦为晏袤之手笔，也是绍熙五年镌刻的。其文云："山河堰盖汉相国赞侯、懿侯之所肇创……自汉迄今，民赖其赐。"此文盛赞绍熙间修堰之举，颇有溢美之词，无须备录。世代变迁，动乱不息，唯《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幽居于褒谷深处，得以保全，余皆泯灭无存。

关于山河堰的修造，石刻和文献皆载，先围之以木，聚之以石，筑坝拦水，再开渠引水灌田。历代修堰大抵如此。何以有六堰之说呢？这是由于古时的条件所限，用以拦水的堰坝不可能很高，也不可能将水流全部拦住，因此，每筑一堰灌溉效力极为有限。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乃自上游往下，每隔一定距离增筑一堰，除首堰之外，又有二堰、三堰直至六堰之说。据《汉中府志》所记，六堰中二堰为其正身，俗称官堰，即由官方集资鸠工，负责修葺并进行管理的堰，余皆为民营之堰，这种堰多在每岁孟陬，着手准备，予以修缮，夏秋雨季，即为洪浪所毁，次年又重修之。官堰则每修一次，耗费甚巨，工程比较坚固，不遇特大洪水，是不易被毁坏的。

记载中的山河堰，大体如上所述，但涉及到各堰的位置及其遗迹的现状，就要从实际勘查中去探索。为此，汉中市博物馆曾于一九八〇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以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对山河堰一至四堰的位置及其遗迹，还有部分灌溉渠道作了调查，肖思枳、马仲全、何新成、白日旭连同笔者共五人，参加了这项工作。详情见调查报告。笔者作为目击者之一，仅将自己所见到的某些片断概述于后：

进入褒谷口，向北远眺，有一拦河大坝，高丈余，长约二百米，横截于褒水之中，褒水越坝直泻，甚为壮观。在大坝之下，距大坝约半里处，有许多浑圆的白色巨石，堆于清澈的激流之中，相传这些巨石可以镇水，所谓"褒谷二十景"之一的"堰口镇珠"，即指此而言。找到了"堰口镇珠"，山河一堰故址

就在眼前了。但是这里并无古堰遗迹，所有的就是那个拦河大坝，此坝即为一九四〇年修建的褒惠渠。为了探寻究竟，我们访问了当时修坝的技术员今汉中地区水电局吴金凯同志，据他说山河一堰的堰头就在现褒惠渠大坝处，其根据如下：

1.在修褒惠渠大坝时，于坝基所在地挖出了木桩千余根，有柏木和青钢木两种，高皆丈余。围绕木桩，砌以巨石，就是当初的堰坝，坝高约2米。

2.此坝与河水流向垂直，这可由挖出的木桩所排列的走向予以证明，可见此坝是用作拦水，提高水位以利灌溉的古堰设施。

3.在此坝以北四十余米处的褒水东岸，俗称婆婆坑处的崖壁间，镌有宋代的摩崖石刻，通高1米，宽约1.5米，这正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宋《杨绛山河堰记略》摩崖，其内容记载宋乾道间修堰之事，此坝是宋乾道间所修。

吴金凯同志的叙述是可信的，山河一堰故址即在今褒惠渠大坝所在地。一堰的灌溉渠道分为东西两支，正如《杨绛山河堰记略》摩崖所述：其“自北而西者注于褒城之野，行于东南者悉归南郑之区。”如今，东渠已为褒惠渠所取代，西渠湮没无存。

清严如煜所修的《汉中府志》称二堰为山河堰之正身，疑是明清之状况，宋代则另当别论。明清时二堰被称为官堰，宋时的一堰又何尝不能是官堰呢？《杨绛山河堰记略》摩崖记述颇详，似无可疑。

二堰既为明清时的官堰，人们对它记忆犹新，在今褒河大桥以南四四一米处褒河东岸，有一段残留的堤坝，这段堤坝是由一些经过雕凿的长形石条砌成的，石条两端有榫头，相互衔接很紧，堤坝的走向是指向河心的，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山河二堰的堰头。其地距一堰堰址即今褒惠渠大坝一四二九米，距河东店小学即古山河庙西南角三十米，距附近的一片竹林二四米。

据当地（红旗大队一队）一位六十余的农民陆永丰讲，由堰头斜插褒河西岸，就是二堰拦河大坝所在地，有一年涨大水之后，曾在这个部位发现了一些木桩。顺着陆永丰指引的方位，我们测量了河宽有二三〇米，这可能是当初大坝的长度。这个大坝不是像一堰那样同河水流向垂直，而是略呈倾斜，大坝同流向的交角，在东岸小于90°，在西岸则大于90°，其原因据说是有利于东岸的用水。接着陆永丰介绍了东岸水渠的情况，他说，由大坝到水渠有四个进水口，每口之间有石条砌成的柱子，见方一米，高约二米，每口的距离约一点五米，柱与柱之间都有石条相连。由这个宏伟的水渠，可以推想大坝的规模，自不愧称为官堰了。

由二堰沿褒水东岸顺流而下，走过一〇六九米到夹漕河即三堰所在地。再往下走一七八六米到中滩，即为四堰所在地。三堰、四堰，皆系民营，每年春修秋废，其规模和效益，比起官堰，自有逊色。

由山河堰到褒惠渠，再到今天的石门水库是历史的三个阶梯。石门水库坝高九〇余米，由灌溉和发电两方面造福于汉中人民，这是古人所望尘莫及的。但是，山河堰在历史上的功绩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后 记

笔者从事石门摩崖之研究，最初大多以旧说为宗，考《石门颂》摩崖刻字时，因正“杨孟文开石门”之误，始疑及旧说之讹。但，旧说有其糟粕，亦有其精华；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排斥。这就要逐一探索，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而，以笔者之浅陋，每前进一步则困难重重，甚而一字之昧竟至数月或经年不得其解。常不远千里外出求师，遥居省城的贺梓诚、王翰章、王毅才、高峰诸君，皆曾不吝赐教，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省博物馆图书室慨然提供书籍、资料，尤其两位革命老前辈、当代考古和历史学家王脩和武伯纶师长，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热情的帮助，王脩师长几每问必答，其诲人不倦之高风感人至深。

拙稿最初出手于一九八一年秋冬季节，再稿成于一九八三年盛暑。承省文物局领导推荐出版。

此外，在拙稿撰写过程中，汉中地、市有关领导关心备至，汉中市博物馆的同志们又在各方面给予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

“石门十三品”是清代观石门摩崖者从中精选了十三种佳品而成说的，始自何人，已无从稽考。由于欣赏的角度不同，还有另一种“十三品”之说，即认为现有十三品中，《山河堰落成记》和《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应予剔除，而代之以《宝庆题名》和《巖然题名》。这两种说法的实际争议在于两品宋代的摩崖上，对于其它十一品则是一致

的。拙见以为，这有争议的两品宋代摩崖，皆在石门摩崖之列，无论哪两品，均无冒名充数之嫌；它们的科学、艺术价值也各有千秋。《宝庆题名》记赵彦呐视堰修契事和龙隆之、刘炳、耿巽、彭顺成、白巨济同游石门事。《巖然题名》实际是一首游石门的题诗：“凌晨走马过花村，先玩玉盆到石门。细想张良烧断处，崖前伫立欲销魂”。署名巖然，明嘉庆时的《汉中府志》和清同治时的《褒谷古蹟辑略》谓此为宋文同游石门诗。考文同其人，曾于北宋皇祐间（公元一〇四九～一〇五四年）知洋州事，洋州距褒谷仅百里之遥，说他游石门是有可能的。但，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又称石室先生，锦江道人，而从无“巖然”之别号，况此题咏落款之年号已不可识辨，不知《褒谷古蹟辑略》等书有何依据，姑存待考。

浩翰的石门摩崖刻石，向人们展现了古代书法艺术的杰出创造，书法研究者对此寄以深情是可想而知的，拙稿对此仅涉及皮毛；而着重在文字考释，但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资料的缺乏，考释亦难详尽。疏漏、错误定然很多，敬希读者诸君教正！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于西安

装帧：阿　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
作者= 郭荣章著
页数= 1 0 9
SS 号= 1 0 3 2 8 8 8 4
出版日期= 1 9 8 5 年1 0 月第1 版

前言
目录
石门摩崖刻石由来之概说
栈道之悠久与古堰之兴废同石门摩崖的关系
古老的石门隧道与石门摩崖的关系
褒谷风景及其名人轶闻与石门摩崖的关系
多彩的汉隶
书中仙品《石门铭》
石门摩崖中的宋人法书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补正
《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识评
汉《石门颂》新证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浅识
《杨淮、杨弼表记摩崖》补释
《石虎》· 钓台· 郑子真
《玉盆》摩崖及其题刻浅识
《衮雪》摩崖与“ 魏武精神”
《石门》摩崖刻字年代考辨
魏《李苞通阁道题名》与三国时的褒斜栈道
考《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 - 兼评晏袤释文
北魏《石门铭》考
《山河堰落成记摩崖》与山河堰
后记